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JOURNAL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社会科学版（季刊）

Social Sciences (Quarterly)

2020年第1期（总第143期）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主办单位：西北工业大学

编辑出版：《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编辑部

发行单位：本刊编辑部

编辑部电话：029-88493140

电子邮箱：shekexuebao@nwpu.edu.cn

地址：西安市友谊西路127号

邮编：710072

印刷：陕西天丰印务有限公司

国内发行：中国邮政集团公司陕西省报刊发行局

邮发代号：52-187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9-2447

国内统一刊号：CN 61-1352/C

定价：8.00元

编辑委员会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战军 邬大光 刘献君
杨叔子 潘懋元

主任 杨益新

副主任 尹晓煌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社教 万小朋 车阿大
尹晓煌 边燕杰 任宗哲
刘晨光 刘第红 李 辉
杨云霞 杨益新 张艳宁

主编 李 辉

责任编辑 杨丹 陆风 刘怡
田锦 王鹏 程凯丽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年3月

目 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

/ 陈曙光

1

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论述探析

/ 杨志和 倪茂晋 黄 越

10

爱国主义教育研究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时代蕴含

/ 冯 刚 高会燕

16

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经验、影响与启示

/ 杨 威 陈 穗

24

论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 王永友 耿春晓

34

高等教育研究

文化转型与学科发展取向

/ 刘亚敏 夏施思

43

一流课程建设和教学的关键在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

/ 史仪凯

50

“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新思潮

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

——据作者多次讲演整理

/ 葛剑雄

58

中餐西渐：中华饮食的美国故事

/ 陈 勇

66

布雷蒙的叙事逻辑理论

/ 张新木

76

述过往以鉴未来：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综述与反思

/ 冯正斌

83

法律与经济前沿论坛

论数据权利归属与取得

/ 李爱君

89

我国数据立法的GDPR启示

——对欧洲数据治理模式的反思

/ 栾 群

99

军民融合研究

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研究

/ 田庆锋 苗朵朵 张 硕 张 添 万海东 109

CONTENTS

A Discussion of Several Issues on Communist Ideology / Chen Shuguang	1
Research 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Cad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 Yang Zhihe Ni Maojin Huang Yue	10
Implications of Patriotism in the New Era / Feng Gang Gao Huiyan	16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fluence and Indication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 Yang Wei Chen Yi	24
Integration of the Love for the Party, the Nation and Socialism in the New Era / Wang Yongyou Geng Chunxiao	34
Culture Transformation and Disciplinary-Developing Orientation / Liu Yamin Xia Shisi	43
The Core of First-clas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Is to Improve Instructors' Teaching Skills / Shi Yikai	50
A Discourse of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Background of the Silk Road —— Based on the Author's Lectures / Ge Jianxiong	58
The Spread of Chinese Food to the West: Story of Chinese Catering in US / Chen Yong	66
Bremond's Theory of Narrative Logic / Zhang Xinmu	76
On Domestic Studie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 Feng Zhengbin	83
On the Attribution and Acquisition of Data Rights / Li Aijun	89
Inspiration of GDPR on China's Data Legislation —— Reflection on European Data Governance Model / Luan Qun	99
Research on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Tian Qingfeng Miao Duoduo Zhang Shuo Zhang Tian Wan Haidong	109

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几个问题

陈曙光

摘要：共产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作为学说，具有真理性；作为运动，具有现实性；作为制度，具有必然性。共产主义社会，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学说占据了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共产主义运动铸就了伟大的历史丰碑，高举共产主义旗帜，我们有底气、不输理。迈向共产主义的征程不是“走红毯”，“苏东”的失败不意味着共产主义事业的失败，理想与现实的间距不能成为抛弃共产主义理想的理由，西方的遏制围堵不会改变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我们有定力、不动摇。共产主义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今天，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才能把握现在，拥有未来。14亿中国人都做好自己，拼起来就是伟大祖国，接力下去就是共产主义。

关键词：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渺茫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20）01-0001-09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高举共产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依然需要共产主义，因为我们的事业不能没有方向。共产主义，作为中华民族的远大目标，什么时候都不能变；作为当代中国的思想旗帜，什么时候都不能丢；作为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什么时候都不能缺。没有共产主义的原则和信条，中国不可能铸就如此辉煌的历史成就，不可能书写如此动人的中国故事，也不可能走向民族复兴的美好明天。

一、共产主义是一个总体范畴

共产主义是一个“总体性”的范畴，共产主义学说、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制度，是完整理解

共产主义科学内涵的三个维度。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具有真理性。为了适应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吸收前人的思想成果，特别是批判地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总结国际工人运动的斗争经验，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学说。科学共产主义学说阐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共产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描绘了共产主义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历史趋势。共产主义学说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它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就在于，它不是如同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仅仅基于人性的角度对资本主义展开道德批判，仅仅从抽象的伦理原则出发去构想未来社会的理想蓝图，而是从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确切分析中，从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法论思想研究”（15ZDA003）；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改革方法论研究”（15AKS004）

作者简介：陈曙光，男，湖南浏阳人，教育部首届青年长江学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人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对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确切分析中，合乎规律地得出了“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共产主义学说的真理性已经为过去一百多年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证明、所检验。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运动，具有现实性。马克思恩格斯说过：“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1]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说得好，消灭私有制度的思想，有共产主义思想就完全够了；但是要消灭现实的私有制度，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干出来的，共产主义也是干出来的，没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什么都是浮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早在马克思恩格斯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俄国的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及社会主义实践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继续和深化；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经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今天，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发展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历史新阶段，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中国社会的每一点发展进步都是向着共产主义这一终极目标的靠拢，共产主义的因素早已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包含着共产主义，都离不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一切行动都服务于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的”。

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具有必然性。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直至最终进入共产主义，这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需要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需要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需要精神境界的极大提高。这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持续奋斗。今天，虽然这个目标还在远方，但是共产主义必将实现，这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结论。马克思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运动，揭

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揭示了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揭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揭示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与趋势，最终得出结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是其制度本身所无法解决的，随着矛盾的运动发展，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胜利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这本身就是共产主义可以实现的证明。当然，这种证明还是不完全的，是尚未完成的，但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深入发展，随着社会主义中国的成功崛起，必将为实现共产主义提供更加有力的实践证明。

共产主义学说、运动、制度三位一体。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运动是不可分的，没有“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便不可能造成共产主义的理论，更无法发展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反之，离开了共产主义理论的指导，“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就会因为缺乏行动纲领、远大理想和组织纪律而停留于自发的阶段，不可能上升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制度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结果和终极目标。没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便不可能累积起现实中的共产主义因素，便不可能建成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所以，对于共产主义，仅仅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未能看到它还是一种思想体系，一种现实运动，这是片面的；将社会主义事业和共产主义制度简单割裂开来，看不到我们今天的事业就是共产主义事业的一部分，是向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的前进，这也是片面的。

总之，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学说，它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思想武器；作为一种制度，它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进步、最美好的理想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作为一种运动，它“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世界的东方。

二、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是最美好、最理想的社会形态。人们基于对美好社会的无限憧憬，也基于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总

是热切地想知道未来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究竟好在哪里？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给出了原则性的回答。

共产主义社会是什么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大致勾勒了如下基本特征：生产力高度发达，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关系高度和谐，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消费资料按需分配，阶级消灭，国家消亡等。现在，印刻在人们脑海中的往往是这些具体的条款，今天我们应该准确理解这些条款，不宜做出不着边际的发挥。比如，有人将“按需分配”解读为“要啥有啥”“共产共妻”，其实，这种发挥要么是主观臆断，要么是用心不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的描绘当然是对的，但这还只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表层特征，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表层背后的实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现象，亦有其本质。认识事物，关键是透过现象把握本质。认识共产主义，关键是穿越表层抓住深层的本质，如果仅仅顾及表层，这是舍本逐末的表现。

那么，共产主义的深层本质究竟是什么？根据经典作家的描述，共产主义社会，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就是“自由个性”的实现。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用文学的语言，比拟的手法，富有诗意地描绘了未来社会的面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2]透过这些感性的文字，深层寓意显而易见，这就是：在未来社会中，消除了“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个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个人变交易所投机者的分工^[3]，每个人都可以摆脱单一工种的局限性，摆脱强制性的旧式分工，都可以自由地、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才能。这难道不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吗？

在《共产党宣言》中，共产主义的本质意涵被经典作家提纲挈领地概括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这是关于未来社会的一个核心命题，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核心要义。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以“自由个性”来描述未来社会。“自由个性”几乎可以理解为“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同义语。

“自由个性”所标示的是人的个性发展的最高境界。在这一境界中，个人不仅摆脱了“人的依赖关系”，而且也最终超越了“物的依赖性”，人的体力、智力、才能、兴趣等都能得到全面自由的发展。“自由个性”的实现，意味着每个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身的主人”^[5]，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真正的和解。

概言之，“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是未来社会的身份标签和基因密码，正是这一点将共产主义社会同一切旧社会从根本上区别开来，除了以这一点来界定未来社会的身份，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身份标识。今天，我们理解共产主义，关键是抓住这一本质，“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6]。看当代中国是不是向着共产主义的方向迈进，关键也是看每个人发展的自由度和全面度是不是越来越高，是不是比过去能够更自由、更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才能。

三、“共产主义渺茫论”为什么是错的

自共产主义学说诞生以来，“共产主义渺茫论”就一直挥之不去。质疑共产主义的奇谈怪论很多，概括起来，比较有市场的无外乎以下两种论调：

第一种论调：共产主义太远了，远得叫人望眼欲穿。最常见的说法是，共产主义是遥远未来的事，需要几十代人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与我们这代人无关，与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也无关，这不摆明了在忽悠人吗？

共产主义是一个过程，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接力奋斗，这是事实。但据此认

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则是错误的。有的人嘲笑共产主义太遥远，远若银河；太崇高，高若繁星；虽能望得见，却遥不可及，好比“手摘星辰”——想得美，办不到！他们宁愿相信天国的存在，也不愿相信共产主义的实在。

然而，他们不知道，完全的共产主义还很远，但不完全的共产主义已经诞生。“渺茫论者”只看到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看不到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已经是一个事实，这是片面的。20世纪出现的社会主义社会，它不是一个独立于共产主义之外的社会形态，它仍然属于共产主义的范畴，只不过“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而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或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中国这样的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国家进入共产主义的一个必经阶段，是向着完全的共产主义慢慢接近的一个特定阶段，也属于共产主义的范畴。鉴于社会主义在我国已经是活生生的事实，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们已经生活在共产主义之中了。至于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还需要经过长期的努力，不能急于求成，因为共产主义决不是“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的事，不可能唾手可得、一蹴而就。但共产主义再远，也远不过他们的天国，如果籍此认为共产主义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那就是肤浅的了。

他们不知道，作为理想社会的共产主义还很远，但作为运动的共产主义早已存在。“渺茫论者”看不到现实的社会主义事业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看不到社会主义事业向前推进的每一步都是向着共产主义最终目标的靠近，这也是片面的。今天，我们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战略，推进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等等，这些都是在社会主义的母体中植入共产主义的因子。我们致力于完成现阶段的历史任务，正是为了向着未来的理想社会挺进，为了给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积蓄能量、开辟道路。共产主义再难，只要不犯颠覆性、方向性的错误，就会不断接近。胡乔木同志曾经以“登泰山”为例来说明。他说：“我们已经走到上泰山的中途，当然可以证明这泰山是确实存在的，因而泰山顶也可以预料是确实存在的；尽管没有到泰山顶，

还不能预先测定它的具体形状，但是绝不能说它是虚无缥缈的。”^[7]今天，我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已经进行了90多年，共产主义事业已经推进到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新阶段，这是对“共产主义渺茫论”的一个最有力的驳斥。

第二种论调：共产主义太好了，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比如，有人说，共产主义社会要什么有什么，按需分配；有人说，共产主义社会人们的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只有好人没有坏人；还有人说，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没有固定的职业，上午打猎，下午捕鱼，晚饭后从事批判，等等，这确实太好了，令人羡慕，但问题是人性能达到吗？

共产主义确实是人类迄今所能预测到的最美好的社会，但也必须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是遥远未来的事，没必要也不可能作出具体的描绘。马克思主义不是占卜学，共产党人不是算命先生，无法一板一眼地预测遥远未来社会面貌。未来的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未来的某个时刻应当做些什么，应当用什么办法，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对于这样的提问方式，马克思认为，“提得不正确”“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这只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8]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展望未来社会时，仅仅限于指出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原则和本质特征，而未来社会的具体情形、具体细节则留给未来的实践、未来的人们去回答。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对遥远未来的事，设想得越具体，越容易陷入空想。

“渺茫论”者以夸张的手法，戏谑的态度，极尽反讽之能事，沉溺于对未来社会具体细节的主观臆想和过度演绎，这完全是别有用心。他们扬言世上的资源有限，而人的欲望难填，人人都需要山珍海味，穿金戴银，别墅豪宅，宝马奔驰，万贯家财，高官厚禄，黄袍加身，美女在侧……这难道不是乌托邦吗？当然，“渺茫论者”在这里预设的价值立场就是，他们所念兹在兹的“山珍海味”“穿金戴银”“万贯家财”……是永远值得追求的，永远不会沦为人们所鄙夷的对象。至于这一价值预设是否正确，这里不予以置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看事物关键是抓住本质、把握趋势，而抛开本质而不

顾，虚构细节大做文章，将共产主义庸俗化、科幻化，其手法是低级的，其方法是错误的。

历史主义方法告诉我们，以今天的人和物为标准，来衡量遥远未来的人和事，这是错误的。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我们对未来发展可以做出方向上的预见，但未来的社会具体呈现出何种面貌，生产力水平究竟达到何种高度，人的精神境界究竟提高到何种程度，社会产品在何种程度上实现“按需分配”，社会将以什么样的速度打破旧式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劳动将在何时变成“生活的第一需要”，列宁认为，“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这些问题都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9]

四、作为信仰的共产主义何以可能

高举共产主义旗帜，我们有底气、不输理。当然，这种底气不是无条件的，也不会凭空产生，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和理由。

共产主义学说占据了真理的制高点，我们的底气来自于共产主义学说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不容置疑的逻辑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为全人类的解放，指明了正确的方向，第一次破解了“历史之谜”，奠定了一座人类思想史上难以超越的思想高峰。正如海德格尔所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座不可逾越的思想高峰。”今天的世界没有偏离马克思所描述的发展轨道，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全球化的新进展，正在继续为马克思主义作“注脚”；今天的中国依然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精神，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解释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工具，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正在继续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作“担保”。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形态的演变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随着人类实践的长期发展，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并向着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过渡，这是铁的必然性，这是历史的大逻辑。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这是我们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最大理由、最大底气，任何时候都不

输理。

共产主义制度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我们的底气来自于共产主义承诺的美好愿景。马克思毕其一生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矢志不移地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目的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马克思主义自一开始就将“全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这也是共产主义的承诺。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不断摆脱自然的枷锁、权力的枷锁、资本的枷锁而走向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前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的依赖关系”阶段，人没法摆脱人身依附而获得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是“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人获得了人身的自由，却又受制于资本的奴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是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这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在这里，既没有了人身依附，又摆脱了物的奴役；在这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里，劳动不再是单纯的谋生手段，而上升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在这里，“迫使个人奴隶般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成为现实；在这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社会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因此，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美好、最符合人性的社会，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它呢？只要这个世界上还存在剥削、压迫和不平等，共产主义就始终是人们追求解放和正义的一面旗帜，我们有什么理由抛弃它呢？没有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追求苦难，物质丰富、社会和谐、天下大同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为什么要逃避呢？

共产主义运动铸就了伟大的历史丰碑，我们的底气来自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巨大成功。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中华民族有过灿烂的历史，以致于今天我们才有资格以“复兴”这个深具历史感的词汇来描绘我们的目标。但是，近代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1921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我们为什么叫共产党？因为我们的行动纲领就是共产主

义，我们奋斗的最终目标就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干的就是共产主义运动，指导我们运动的思想武器就是共产主义学说。近百年来，共产主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主旋律；在共产主义这面旗帜下，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28年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这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极大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极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极大增强社会发展活力，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地位显著提高”^[10]。这三大历史性贡献，都离不开共产主义的正确指引，都归因于共产主义的光辉旗帜，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成果。试问，如果这样的历史贡献都不足以支撑起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底气和自信，还有哪面思想旗帜有底气、有理由自信？

五、共产主义美好理想如何直面骨感的现实

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今天，试图扰乱中国心智的大有人在，“共产主义”这面光辉旗帜也遭到了国内外某些势力的恶意歪曲、攻击和诋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我们有定力，不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谷所惧，不为眼前的困难所惑，不为西方的忽悠所扰，矢志不渝朝着崇高理想奋进。

第一，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挫折，我们有定力，不动摇。“苏东”剧变标志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并陷入空前低潮。目前随着中国的崛起，呈现出反弹和复苏的迹象，但总体上仍未摆脱低谷的窘境。导致挫折的原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内因主要在于，共产主义运动是人类历史上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远不像“走红毯”那么风光，也不像“土豆烧牛肉”那么简单，人们对它的认识必然经过一个凤凰涅槃、化蛹成蝶的过程，因而出现偏差、挫折甚至暂时倒退是不可避免的。外因则在于，共产主义运动所挑战的正是西方几百年来所形成的利益堡垒、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念，因而必将遭到一切反动势力的极端仇恨和竭力攻击，妄图将共产主义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列宁指出，“历史通常是循着曲折的道路发展的”^[11]。有高潮有低谷，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正是任何一种社会形态演进的路线图，人类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也不例外。更何况，这些挫折不是共产主义“惹的祸”，而是背叛共产主义学说导致的恶果，不要认为社会主义没有了，共产主义失败了，哪有这回事。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位掌门人所说：“东欧剧变和苏联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失败的只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即官僚社会主义。在21世纪，社会主义仍然有着广阔前景。”他的这一判断已经为今天的事事实所证明。

第二，面对共产主义理想与社会主义现实之间的间距和落差，我们有定力，不动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尽管属于同一社会形态，但这两个阶段在发展程度和成熟程度上存在着重大差别。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间距和落差就更大了。比如，在今天的中国，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远没有上升为“生活的第一需要”；人的全面发展也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远未达到那一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承诺的“自由个性”也依然是令人“高山仰止”的神圣境界；旧式分工还没法超越，三大差别还依然存在；经济领域还只能实行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分配制度，甚至还不得不学习借鉴西方的有益经验和做法。再比如，中国面临的区域发展不平衡、消极腐败、贫富悬殊、环境污染、践踏公平正义等问题还存在，有的还很严重，这些都与共产主义理想相距甚远。如何看待这些现象？一是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一口吃不成胖子，一天建不成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不完美到完美的发展过程，不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无法终结初级阶段，不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无法接近大同理想。二是要用辩证的方法看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成功的一面，也有问题的一面。这“两面”有主次，其中成绩是主要的，问题是次要的，看问题要看主流、抓主要的一面，不能因为问题而否定成绩，不能因为理想还在远方就抛弃理想。三是要从本质的高度看问题，中国向西方开放，向西方讨教治世方剂，全面深化改革，但中国并没有丢失自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别的主义，它首先是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丢，共产主义的思想旗帜没有丢。四是要从历史的趋势看问题，中国面临的问题属于成长中的烦恼，通过各方面体制机制的改革，社会主义制度必将不断地走向自我完善，社会主义现实必将不断地趋向于理想，这是当代中国的大趋势。

第三，面对西方的价值观围堵和质疑，我们有定力，不动摇。在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共产主义”是一个完全被排斥和否定的概念。西方秉持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习惯于扮演“上帝的选民”和“救世主”的角色，向全世界传经布道，宣传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反共先锋尼克松一生致力于颠覆共产主义，祈望西方世界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战场上“不战而胜”。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公开宣称，我们“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其目标就是西方价值观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西方“和平演变”的策略在“苏东”国家取得了成功，下一个目标对准了共产主义的重镇——中国。进入21世纪，西方对中国的价值观围堵，从“价值观外交”，到“C型包围圈”，再到“亚洲繁荣之弧”，尽管花样迭出，然收效甚微。这是因为，我们清醒地知道，中国的成功归因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归因于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归因于共产主义旗帜的引领；我们清醒地知道，社会主义的有些东西永远不能丢，资本主义的有些东西永远不能学；我们清醒地知道，“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12]。我们对于自己选择的发展道路有信心，对于自己坚守的文化精神和价值体系有信仰，对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有主张，对于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有定力，不会盲目地与“国际惯

例接轨”，不会盲目地接受西方无偿提供的方案，不会抛弃共产主义来迎合西方的口味。

六、沿着中国道路能否通往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作为人类发展史上最伟大的运动，是历史地发展起来的，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在这个总的过程中，又包括许多个具体的发展阶段，各个阶段又各有其特点和具体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既不能落后于时代的发展，把现在要做的事放到将来去做；也不能超越时代的要求，把将来才能做的事拿到今天来做。

实现共产主义不能绕过社会主义阶段。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列宁则把这两个阶段分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今天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一般指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总体上属于同一类型的社会形态，是同一社会形态的两个发展阶段，而不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这两个阶段在发展水平、成熟程度上有重大差别，但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社会主义虽然还是“不完全的共产主义”，但它是通往共产主义的第一步，是实现共产主义无法绕开的必经阶段。没有低级阶段的积累，就不会向着高级阶段飞跃。试图跳过社会主义阶段，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是天真烂漫的想法。我们不会再刮什么“共产风”，人为地缩短社会主义时期，急于迈向共产主义，过去我们有这方面的教训，那种失败的苦头我们已经尝够了，今天我们已经学习得聪明多了，决不会再干过去曾经干过的那些蠢事。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决不允许采取任何超越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观主义、空想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策，如果那样做，那就只能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破坏我们的共产主义事业，从而必然招致失败。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增添共产主义因素，随着实践的发展，这种共产主义因素只会愈来愈多、愈发鲜明，最终累积起实现共产主义的巨大能量，完成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最动人心弦的一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通向共产主义

的必经之路。各个国家，由于文化传统不同，历史命运不同，现实国情不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也会有所不同，每个国家都应该以具有自身特点的方式建设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在中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实现共产主义，我们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也没有简单重复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而是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一条以“社会主义”为底色、以“中国国情”为基点、以“中国特色”为标志、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的接力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8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命运相连，本质相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13]，是中华民族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鞋子合不合脚，穿了才知道。中国道路是不是好，只能拿事实来说话，由人民来裁判，而不必顾及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在一边信口雌黄、说三道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都实现了历史性跨越，中国崛起已经成为21世纪最为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实践雄辩地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富民强国的正确道路，是一条走得通、走得快、走得稳的道路，只有这条道路能够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这条道路能够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我们已经沿着这条道路走了几十年，今后还将继续走下去。

今天，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坚持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共产主义理想是高大上的，但绝不是假大空的。不积极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达到共产主义，失掉了现在也就没有了未来。14亿中国人，每个人都做好自己，拼起来就是伟大祖国，接力下去就是共产主义。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66.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165.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308.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647.
-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566.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1182.
- [7] 胡乔木. 关于共产主义思想的实践[N]. 人民日报, 1984-09-24.
- [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541.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92.
- [10]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3.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715.
- [12] 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6:14.
- [13]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7:36.

A Discussion of Several Issues on Communist Ideology

Chen Shuguang

Abstract: Communist ideology is a holistic idea. As a political doctrine, it reveals the truth; as a social movement, it reflects reality; and as a sociopolitical system, it represents inevitable trends. Communist society, to simply put, is "a social form based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free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individuals." Communist ideal holds the commanding height of truth and morality while Communist movement represents a great historical monument. Holding the banner of Communism, we have confidence and justice. The journey to Communist society is not like "walking the red carpet" glamorously. The "failur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does not mean the failure of Communism. The gap between ideal and reality does not provide an excuse for abandoning Communist ideal. The "containment" of the West cannot weaken the original aspirations of the Communists, who are determined and unwavering to carry out their founding mission. Communism is a historical product. Under the current circumstances, to adhere to the common ideal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o hold the lofty ideal of Communism. Only by engaging in the great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an we grasp the present and embrace the future. By taking our responsibilities together, we are confident that the 1.4 billion Chinese people can develop China into a great nation and realize the ideal of Communism.

Key words: communist ideology; ideal of communism; elusive theory of communism

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论述探析

杨志和 倪茂晋 黄 越

摘要:习近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干部教育思想、总结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实践经验和长期领导干部教育工作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干部教育理论的重大发展。他明确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新定位、赋予了干部教育培训目标新内涵、构建了干部教育培训内容新体系、拓展了干部教育培训方法新载体。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具有推陈出新的嬗变性、缜密严谨的逻辑性、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性、务实管用的实效性等鲜明特征。

关键词:干部教育培训;生成逻辑;理论创新;理论特征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0)01-0010-06

干部教育培训事关干部成长进步,事关党和国家事业长足发展。习近平对此高度重视,并立足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新环境、新目标、新任务,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指明了方向。深刻把握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理论创新和理论特征,对于建设一支满足新时代发展需求的干部队伍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

任何一种科学理念的产生必然有其支撑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论述来源于马克思主义干部教育培训思想,吸取了中国共产党多年来干部教育培训理念和实践精髓。

(一) 理论根基: 马克思主义干部教育培训思想

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通过深刻洞察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认识到干部教育培训对无产阶级事业的积极意义和重要作用,并多次投身到对工人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在马克思看来,教育可以使半开化和未开化的工人掌握先进的思想武器,帮助他们在工作斗争中取得最终胜利。马克思提出,“教育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1]。可以说,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为习近平要求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为全党的一项重要事业提供了重要借鉴。

由于受到时代条件限制,马克思并未对干部教育培训的主体、内容、过程等做出明确阐述。马克思主义政党早期干部教育培训思想比较集中体现在列宁的建党思想上。^[2]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基础上提出了“灌输论”,阐述了“应该把马克思

基金项目: 中共中央组织部课题项目“党性教育基地建设规范化研究”(ZYKP17002); 西北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基金项目“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SKJJZ2020002); 西北工业大学党建研究基金项目“高校教师党员教育的机制构建与路径创新研究”(DJZ201901)

作者简介: 杨志和,男,陕西泾阳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原教务部主任,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干部教育; 倪茂晋,男,四川自贡人,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干部教育; 黄越,女,陕西西安人,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院党委副书记,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理论通俗化，把它灌输给工人，并帮助工人领会它”^[3]“为了向工人灌输政治知识，社会民主党人应当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应当派出自己的队伍分赴各个方面”^[4]等思想，得出了“灌输”是对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最有效的方法。列宁的“灌输”思想为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方面重要论述的形成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引领。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涵盖了大量干部教育培训理论。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5]。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干部教育培训的目标是要实现干部队伍“四化”^[6]，并要求“大多数干部还要着重抓紧三个方面学习：一个是学经济学，一个是学科学技术，一个是学管理”^[7]。江泽民结合新形势、新任务，作出了“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的论断，要求把干部教育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基础工程来抓。^[8]胡锦涛非常注重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体系的构建，强调“党校教育是全国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培训轮训的主渠道”^[9]，要求“不断探索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不断增强教育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10]。上述有关干部教育培训的思想是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的理论基础。

（二）实践基础：中国共产党90多年干部教育培训实践经验

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论述，既受马克思主义干部教育思想启迪，也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耕耘了90多年的干部教育培训肥沃土壤。以党的一大做出“举办工人学校”决定^[11]为标志，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探索实践。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党的第一所干部学校“湖南自修大学”^[12]，陈独秀、李达在上海创办了第一所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上海平民女校^[13]，蔡和森、恽代英、林育南在安源指导成立了第一所正规党校——中共安源地委党校。^[14]随后，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延安时期建立的干部培训院校就达到30多所。为了更好统筹开展干部教育培训工作，1939年，党中央专门成立了由张

闻天兼任部长、李维汉任副部长的干部教育部，各个地方设置了干部教育领导机构，从组织上确保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具体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注重从制度建设上保障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作出了明确规定，党中央先后8次出台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规划》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或“政治理论教育”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基本任务或首要任务。党员干部轮训制度、公务员培训制度、中心组理论学习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规范的建立，为规范、有序、高效推进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提供了重要保障。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实践为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搭建了一个基础性实践平台。

（三）亲力亲为：习近平长期从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体会感悟

习近平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深入思考并作出的重要论述，与习近平多年从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实践经历密切相关。早在河北正定，习近平就提出：“只有搞好党员教育，努力提高党员队伍的政治素质，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党的战斗力。”^[15]他牵头制定的《中共正定县委1984年工作大纲》就号召全县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福建宁德时期，习近平提出要培养干部“弱鸟先飞”的进取意识和“滴水穿石”的坚韧精神。^[16]在浙江工作后，习近平又提出“不能在‘温室’里培养干部”“理论学习要有三种境界”“为政者需要学与思”^[17]等教育培训干部的重要观点。2007年，习近平调任中央工作并担任中央党校校长。职务的转变使他开始站在全局高度系统思考干部教育培训问题。2008年，我国第一个全面部署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的规划性文件——《2010—2020年干部教育培训改革纲要》出台，拉开了干部教育培训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幕。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习近平在准确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以及党的建设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新时代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性，指出当前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存在的“不适宜”问题，进一步系统阐释了“党校姓党”的深刻内涵^[18]，构建了适应形势任务

变化需求的教育培训内容体系。可见，多年的领导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实践与感悟，使得习近平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思考不断深化，并逐步形成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干部教育培训理论体系。

二、习近平对马克思主义干部教育培训思想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涵盖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战略地位、目标内容、方式方法、体制机制、学风建设、措施保障等诸多方面。其精髓要义主要表现为：坚持以“两个维护”为统领，加强党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建设学习型政党、学习强国为使命，谋划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坚持以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打赢“三大攻坚战”等为需求，教育培养具有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的“好干部”；坚持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中心，尤其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为主线，构建干部教育培训内容新体系；坚持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激发干部教育培训活力；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尊重不同类别干部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干部教育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坚持以党校教育为主渠道，构建完备的干部教育培训机构体系；坚持以教师队伍建设为保障，充实干部教育培训力量^[19-22]，等等。不难发现，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能够完全与马克思主义干部教育思想对接耦合，而且在继承科学内容基础上，结合现实需要，进行了创新，有效拓展了党的干部教育培训思想新内涵，是马克思主义干部教育培训思想与新时代中国国情相结合的又一次新飞跃。其创新之处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明确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新定位

受益于长期干部教育培训实践经验，以及党执政地位和执政环境的深刻变化，习近平更加重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不仅肯定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23]这一战略定位，更是把时代需求与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把党、国家、民族

的发展和前途与干部教育培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24]“没有全党大学习，没有干部大培训，就没有事业大发展”^[25]。可见，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上升到事关党和国家发展的战略地位，是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的出发点。

（二）赋予干部教育培训目标新内涵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核心目标是培养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好干部标准是具体的、历史的，不同时期有不同体现。习近平在系统梳理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初期等不同历史时期好干部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新时代发展需要，将好干部标准概括为“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26]“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27]“信念过硬、政治过硬、责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28]。然而，在习近平看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目标不仅仅限于培养干部方面，还包括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本身实现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多次指出，要不断增强干部素质培养的系统性、持续性、针对性、有效性，建设特色鲜明、优势互补、功能完备的培训格局，使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形成一条有机联系的“培训链”。^[29]这既对培训对象提出殷切期望，又对培训本体提出目标要求，体现了习近平对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整体性思考，同时也赋予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目标的新内涵。

（三）构建干部教育培训内容新体系

干部教育培训内容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重要组成要素，是干部教育培训中教育培训主体欲向教育培训对象传递的观念。习近平牢牢把握干部教育培训内容的政治性、思想性、针对性与系统性，提出要从理论素养、党性修养、知识涵养、业务技能等方面加强干部教育培训。习近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是领导干部的必备素质”^[30]，应常态化开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培训；“坚强的党性是成为高素质

领导干部的首要条件”^[31]，是一门必修课，并要求通过加强宗旨意识、党章党规党纪、红色文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来加强干部党性修养，提升政治素质和领导水平。此外，习近平还非常重视知识教育和能力教育，多次表示“决不意味着知识教育、领导能力教育不重要了”，并希望广大干部掌握做好领导工作、履行岗位职责所必备的各种知识和本领，努力成为行家里手、内行领导。^[32]这些观点充分表明，习近平清晰构建了以理论教育为根本、以党性教育为核心、以知识和能力教育为基础的干部教育培训内容新体系。

（四）拓展干部教育培训方法新载体

教育培训方法是干部教育培训实施手段的具体体现，影响着教育培训工作的质量和目的。习近平一再强调，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既要坚持运用行之有效的传统方式，又要通过改革创造新的方法，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科学化水平”^[33]。一方面，他要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应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锻炼相结合、分类培训与按需培训相结合、组织调训与自主选学相结合、课堂讲授与现场教学相结合，并表示“这些经验来之不易、弥足珍贵，是做好今后工作的重要遵循”。另一方面，在敏锐把握信息时代到来给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基础上，习近平指出，“信息化为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34]“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35]“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36]。习近平主张用现代科学技术丰富干部教育培训方法，对于提升干部教育培训实效性、实现教育培训目的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彰显的鲜明特征

（一）推陈出新的嬗变性

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历经考验磨难，无往而不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正如前文分析，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干部教育培训思想，以及被实践证明切实管用的中国共产党长期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好经验好做

法的继承和坚持。同时，习近平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相结合，提出“要积极推进教育培训改革创新，不断提高教育培训科学化水平”^[37]。并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定位、目标内涵、培训内容、方法载体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要求，赋予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新功能。这种推陈出新的嬗变性无疑是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的鲜明特征。

（二）缜密严谨的逻辑性

一个理论是否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取决于该理论能否回答这个理论范畴内的所有问题、每一个论点是否都能围绕主题展开论述、论点之间是否具有层次性。^[38]对照发现，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具备这三条特征。其一，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干部为什么学、学什么、谁来学、怎么学、达到什么效果、怎么保障学习效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二，习近平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的目标维度就是“培养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这一目标贯穿了习近平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的任一重要观点。比如，《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等文件，其目的均在于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培养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其三，习近平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具有清晰的层次性。比如，就如何提高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实效性问题上，习近平分别从国家层面推进干部教育培训改革创新、培训机构层面坚持正确办学方向、干部个体层面靠自身努力注重“自我革命”以及坚持学以致用等方面做了系统论述。综上，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是一个具有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体系。

（三）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性

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体现到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在教育培训主体上，习近平要求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他一再强调，党校姓党是党校工作的根本原则。各级党校要健全完善干部按时参训、遵守纪律等各项规章制度，真正从思想、政治、作风等方面将党校工作严到位、管到份。同时，他意识到党校教师的“不一般”，要求党校教师应该在

为人师表、行为世范上有更高标准，在自身党性锻炼上更要严格，努力做模范党员，用实际行动影响和带动学员。^[39]在教育培训对象上，习近平要求“各个干部在原来单位无论担任什么领导职务，到了党校都是学员，都要按照党校的规定和要求去学习”^[40]，不允许任何人搞特殊。在习近平从严管理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理念指引下，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了《关于在干部教育培训中进一步加强学员管理的规定》等规章制度，从8个方面明确了干部在教育培训过程中25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四）务实管用的实效性

务实管用是判断一条理论是否有价值的重要标尺。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的实效性表现为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主体与客体相契合、目标与结果互为一致。首先，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论述并非是他个人空想出来的，而是着眼于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迫切需要，在吸取借鉴马克思主义干部培训思想精髓基础上形成的，是理论与实践有机统一的产物。其次，习近平主张坚持事业需要什么就重点培训什么，履职缺少什么就注意补充什么。他尤其尊重培训对象的差异性，提出了“因人施教、因材施教”的教育培训理念，根据不同对象的需要，采取灵活有效的培训方式和手段，有效实现了教育培训主体与客体的高度契合。再次，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仅在党的十八大期间，全国共培训各类各级干部、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等8400多万人次，广大干部增强了党性修养，补齐了能力短板、优化了知识结构、拓宽了眼界视野，领导发展的能力不断提高，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41]这充分表明，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培训重要论述既展现了务实管用的理论品格，又取得了务实管用的实践成效。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2:530.
- [2] 刘兴平. 习近平关于干部教育方面重要论述的研究:渊源、内涵和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 2018(12):1-8.
- [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282.
-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363.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526.
- [6]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146.
- [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153.
- [8] 江泽民. 江泽民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418.
- [9] 胡锦涛. 努力把党校教育事业提高到新水平[N]. 人民日报, 2000-06-08.
- [10] 胡锦涛要求在干部教育培训工作中联系实际创新路[N]. 人民日报, 2006-03-21(1).
- [11] 王秀良, 蔡林慧. 党的干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J]. 中州学刊, 2014(12):32-35.
- [12] 王海军, 王新刚. 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探析——以1929—1934年干部学校教育为考察对象[J]. 理论学刊, 2018(2):54-60.
- [1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98.
- [14] 黄爱国. 中共最早的地方党校[J]. 中共党史研究, 2002(5):1.
- [15] 习近平. 知之深爱之切[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2015:81.
- [16] 《秘书工作》采访组. 实干才能梦想成真——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倡导践行“马上就办”纪实[J]. 秘书工作, 2015(2):7-8.
- [17] 习近平. 之江新语[M].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10, 14, 218.
- [18] 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求是, 2016(9):3-13.
- [19] 中共中央印发2018—2022年全国干部教育培训规划[N]. 人民日报, 2018-11-02(1).
- [20] 习近平为第五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 要求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大国建设[N]. 人民日报, 2019-03-01(1).
- [21] 习近平. 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新一轮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N]. 人民日报, 2008-07-17.
- [22] 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求是, 2016(9):3-13.

- [23] 习近平. 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新一轮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N]. 人民日报, 2008-07-17.
- [24] 习近平. 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3-03-04(1).
- [25] 习近平为第五批全国干部学习培训教材作序 要求加快推进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学习大国建设[N]. 人民日报, 2019-03-01(1).
- [26]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412.
- [2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二卷[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7: 141.
- [28] 习近平就政法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指示[N]. 人民日报, 2016-04-26(1).
- [29] 习近平出席全国组织部长会议强调从严管理干部[N]. 人民日报, 2010-12-18(1).
- [30] 习近平. 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N]. 解放军报, 2009-07-28(1).
- [31] 习近平. 领导干部要加强党性修养提高综合素质[N]. 人民日报, 2009-03-02(1).
- [32] 习近平. 在全党大兴学习之风依靠学习和实践走向未来[N]. 人民日报, 2013-03-02(1).
- [33] 习近平. 做好新形势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N]. 学习时报, 2010-10-25(1).
- [34] 习近平. 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N]. 人民日报, 2018-04-22(1).
- [35] 习近平. 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6-12-09(1).
- [36] 习近平. 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 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N]. 人民日报, 2014-02-28(1).
- [37] 习近平. 以改革创新精神做好新一轮大规模培训干部工作[N]. 人民日报, 2008-07-17.
- [38] 毕国明, 许鲁洲. 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153.
- [39] 习近平. 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 求是, 2016(9): 3-13.
- [40] 习近平. 在中央党校2012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J]. 党建, 2012(10): 5-7.
- [41] 魏杰. 培养造就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党的十八大以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回眸[N]. 中国组织人事报, 2017-08-02(1).

Research on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Cad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Yang Zhihe Ni Maojin Huang Yue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inheriting the thought of Marxist cadre training, absorbing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the CPC's cadre education and summarizing the long-term cad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work, Xi Jinping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important expositions on cad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which is the innovative theory of contemporary Marxists on cad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e innovation of Xi Jinping's cad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thought is that it clearly defines the new orientation of work, endows the new connotation of objectives, constructs a new system of content and expands the new carrier of methods. Xi Jinping's important exposition on cad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a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ransmutation, meticulous and rigorous logic, comprehensive and strict times and pragmatic effectiveness.

Key words: cadre education and training; generative logic; innovation of theories; theoretical characteristics

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时代蕴含

冯 刚 高会燕

摘要: 新时代爱国主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为主题, 爱国主义精神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内容, 注重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现代化中突出爱国主义导向, 并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 需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实际行动中、在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的协同作用中、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在深化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关键词: 新时代; 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教育

中图分类号: G41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0)01-0016-08

作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心与民族魂, 爱国主义是一代代中华儿女共有的民族基因, 构成了中华民族鲜明的文化标识。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印发的《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 “爱国主义精神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心中, 维系着中华大地上各个民族的团结统一,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为祖国发展繁荣而自强不息、不懈奋斗。”^[1]作为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 爱国主义在贯穿民族精神形成、发展历史过程的同时, 又带有阶段性特征, 彰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 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2]。鉴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201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研判, 我国发展面临崭新的历史方位。新方位意味着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 爱国主义在传承优秀传统精神的基础上回应新的时代关切, 实现了持续发展。虚功实做、久久为功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应有之义。

一、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时代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奠定了爱国主义时代化的基调, 爱国主义在新的历史方位下创新发展, 焕发出新的生机力量。新时代的爱国主义集中体现在爱国主义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 构成其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内容; 它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主题, 并融入国家治理课题, 贯穿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

(一) 爱国主义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内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国家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和精神纽带。“国无德不兴, 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 莫衷一是, 行无依归, 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历史逻辑的统一, 其建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确定的政治前提、物质基础与文化条件这一基础之上, 是改革开

基金项目: 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发展研究”重点项目“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构建研究”(19ZD019)

作者简介: 冯刚, 男, 四川乐至人, 北京师范大学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院院长,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高会燕, 女, 河南周口人, 西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放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反映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同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无不体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积蕴于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历程的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表达。新时代背景下，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弘扬当代中国精神的客观要求。

以爱国为导引，绘就价值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这一重大问题，是国家价值内核、社会共同理想与个体精神追求的统一，成为凝聚社会共识的“最大公约数”。习近平总书记在同北京大学师生座谈时提出，中国是一个有着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使全体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进，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关乎人民幸福安康。爱国主义情感是融入每一个中华儿女血液之中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维护民族独立与尊严的强大动力，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践行实践中，以爱国为导引能够凝聚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共识，在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中做到“两个维护”，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具象化与实效化。

（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的主题

中华民族具有伟大梦想精神。胸中植梦、勇于追梦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爱国精神的指引下，一代代勤劳的中国人接续创造，使中华文明在历史长河中持续发展，推动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近代以来，在日渐腐朽的封建统治与西方列强入侵的双重挤压下，中华民族遭受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甚至面临亡国灭种危险。民族危亡时刻，无数仁人志士遵循爱国救国精神的引导，寻求挽救民族危机之路。农民阶级的揭竿起义、开明士绅的兴办洋务、资产阶级发起的变革与革命无不抵御侵略、富国强兵、民族独立梦想的现实写照。然而由于其自身局限性及历史条件的限制，他

们均没有完全实现梦想照进现实的美好愿景。诞生于此背景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即接过历史的接力棒，树立起实现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并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找到了实现梦想的正确道路，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在此基础上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启改革开放的新征程。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用“中国梦”这一概念阐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随后在实践基础上逐渐深化对这一概念的本质性认识，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国家、民族与人民三位一体的中国梦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激励着新时代的中华儿女不断协力奋进。

处于关键时期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强大精神支撑。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处于关键时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与艰难挑战交互并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客观现实，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民族复兴的梦想，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这个梦想。同时，“行百里者半九十”，关键时期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也前所未有。民族复兴光明前景的出现是以往坚持贯彻爱国主义的现实结果，而克服艰难挑战、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离不开新时代爱国主义的弘扬。“要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不懈追求，着力扎紧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培育精神家园，引导人们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动力。”^[4]为此，要切实把中国梦作为新时代爱国主义的主题，通过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力量。

（三）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突出爱国主义导向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国家治理是实现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阶段，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要内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这一科学界定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要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好；我们说坚定制度自信，不是要固步自封，而是要不断革除体制机制弊端，让我们的制度成熟而持久。因此，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以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目标和方向，这是不断深化改革的基础与底线。新时代背景下，我们既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又要树立高度的制度自觉，以辩证、客观的心态推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使我国各项制度更加成熟与定型。

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突出爱国主义导向。一方面，任何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均建立在一定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明确的意识形态性与坚定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国家治理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就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其坚实基础，而爱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构成。另一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支撑。目前，全面深化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面临种种硬骨头，为此“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的智慧，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5]。而爱国主义精神流淌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因此，将爱国主义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在全面深化经济、政治与行政、文化、社会治理等体制改革中突出爱国主义导向，有利于最大范围地凝聚社会共识，动员各方面力量于国家治理现代化事业。

二、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时代特征

爱国主义是历史进程的产物，其与社会发展所

处的时代与阶段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下，爱国主义亦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性，其主要体现于新时代爱国主义更加凸显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凸显面向全体人民与突出重点群体的统一、凸显丰富内容与创新载体的统一、凸显民族情怀与国际胸怀的统一。

（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

中国共产党是爱国主义精神坚定的弘扬者与践行者。诞生于民族危亡时刻的中国共产党以实现民族独立与复兴为目标，是爱国主义精神坚定的弘扬者与实践者，我们党成立至今90多年的奋斗历程是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爱国实践的真实写照。回溯历史，党带领人民浴血奋斗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在中国延续数千年的封建专制政治的彻底破产。党带领人民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确立起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与制度基础。党带领人民开创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并在这一实践过程中逐步开辟与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与理论体系。在党的带领下，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进，推动我国实现由站起来到富起来，由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在、幸福所在。”^[6]坚持和完善以弘扬与践行爱国主义精神为己任的党的领导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的坚实保障。

爱党与爱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我国爱国主义始终体现着民族富强、人民幸福的目标指向，并最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实现聚合。从其内涵来看，爱国主义是个体对祖国的情感与责任，是调节个人与国家、民族关系的道德规范、政治原则与精神力量，是国家属性、政党属性及社会制度的有机统一。因此，爱国从来不是抽象的，而是具象化的。个体所爱之国家总是一个具体的拥有一定制度与政权组织形式、文化构成的有机体，抽离具体的国家空谈爱国既不科学，也无实际意义。在当代中国，爱国即意味着爱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社会主义祖

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走上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领导力量。在当代中国，爱党、爱国与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是爱国主义的本质所在，只有将爱党、爱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互融合的爱国主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爱国主义。

（二）面向全体人民与突出重点群体的统一

爱国主义是我国社会各界的共有性精神。爱国主义的主体具有广泛性，这意味着爱国主义不为某一阶级、某一群体或个体所独有，具有突出的普遍性与共享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社会发展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梦想，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呼唤勇于面对挑战与处理矛盾问题的伟大斗争精神。在此语境下，爱国主义理应成为每一个中国人的信念构成与精神依归，“要坚持信任尊重团结引导，增进和凝聚政治共识，夯实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不断扩大团结面，充分调动社会各界人士的爱国热情和社会担当”^[7]。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与自觉行动。

爱国主义是青少年这一重点群体的青春底色。广大青少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后备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青年一代有理想与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充满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中国少年先锋队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来要在你们（全国各族少年儿童）手中实现，你们是未来的主力军、生力军。爱国主义是青少年群体永不褪变的底色，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首先要涵养青少年的爱国情怀，着力培养其爱国之情、砥砺其强国之志、实践其报国之行。“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我们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之中”^[8]。为此，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着力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丰富爱国主义出版读物，广泛组织开展爱国主义实践活动，将爱国理论与爱国实践统一起来。

（三）丰富内容与创新载体的统一

爱国主义的内涵不断丰富。爱国主义是时代的产物，新时代爱国主义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既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当代传承，又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性。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门研究人的思想形成和变化的规律，并指导人形成正确思想、行为的科学，要紧跟时代发展的步伐，密切关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规律性、前沿性问题，以问题为导向推进自身的创新发展”^[9]。党的十八大以来，伴随我国社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面临新的时代课题，为了更加科学地回应时代关切，爱国主义在内涵维度不断丰富发展。其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的目标指向在于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通过着力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使爱国主义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其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爱国主义的时代主题。把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作为不懈追求，扎紧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培育精神家园。其三，在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高度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祖国的命运与党的命运、社会主义的命运密不可分。其四，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爱国主义的着力点。全国各族人民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民族团结，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旗帜鲜明反对分裂国家图谋、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筑牢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铜墙铁壁。

爱国主义教育的载体不断拓展。“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的实施、活动的开展、任务的完成都离不开相应的载体支撑”^[10]。在爱国主义内涵不断拓展的同时，爱国主义教育载体的时代化受到重视，持续推进多样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教育对象

分众化、差异化发展需求，有力推动了爱国主义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创新爱国主义教育的形式，丰富和优化课程资源，支持和鼓励多种形式开发微课、微视频等教育资源和在线课程，开发体现爱国主义教育要求的音乐、美术、书法、舞蹈、戏剧作品等，进一步增强吸引力感染力。”^[11]依据着力点和主要功能的不同，爱国主义教育载体可主要分为理论性载体和实践性载体两大类。其中，前者侧重于通过爱国知识的系统性传授以培育爱国情怀，后者侧重于借由实践参与推进爱国情感与爱国行为的双向促进。理论性载体集中体现为：其一，课堂教学，课堂教学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渠道，要把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学校教育全过程，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头脑，理直气壮开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其二，爱国主义读物。爱国主义出版物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另一重要理论性载体，为此要结合不同年龄层的发展需求与阅读偏好，推出反映爱国主义内容的高质量儿童读物、教辅读物。实践性载体主要包含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仪式礼仪，重大的纪念日、历史事件等重大纪念活动、传统和现代节日、自然人文景观和重大工程等，均蕴含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四）民族情怀与国际胸怀的统一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相结合。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对内全面深化改革、对外增强开放力度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爱国主义与对外开放亦成为密切关联的两个范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是讲爱国主义的，同时我们也是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胸怀的。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既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2]正是基于此认知，我国提出了构建“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致力于使我国发展成果惠

及更多国家和人民，增添各国共同发展动力，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性问题，不断推动爱国情怀与世界眼光的深度融合。

涵养积极进取开放包容理性平和的爱国心态。良好的爱国心态是正确表达爱国情感、实施爱国行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条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开放兼容，才能富强兴盛。要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尊重各国历史特点、文化传统，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善于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13]为此，需从两方面着手：其一，开放包容的胸襟。以更加宽广的世界眼光和国际视野看待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深刻把握世界各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切联系。在树立坚定爱国信念的同时以更加包容的心态面对世界，接纳并尊重异质文化，投身于不同文明的交流与交融，既不妄自尊大，也不妄自菲薄。其二，理性表达爱国情感。每一个体的爱国情怀都值得肯定，但非理性的爱国情感及行为往往事与愿违，难以实现爱国初衷甚或产生消极影响。作为一种朴素的情感形态，爱国需以正确的方式予以表达。以理性引导爱国情感及爱国实践，反对极端行为，是做真正的爱国者的内在之义。

三、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路径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做好爱国主义教育。《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的颁布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爱国主义教育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新时代背景下，应着眼于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实际行动，着眼于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协同作用的充分发挥，着眼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爱国主义导向的贯彻，着眼于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的不断深化，把爱国主义教育实践推进新阶段。

（一）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实际行动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从来不只是言语之谈，而要把自己的理想与祖国前途、把自己的人生同民族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把爱国认知与爱国情感转化为爱国实践。因

此，爱国主义教育形式虽具有多样性，但相较于理论性教育，实践教育以其直观亲历性显示出独特优势。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着力点，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实际行动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是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途径。其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实际行动维护民族团结。我国各民族是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础。在共同体意识指引下，要坚决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民族团结。这要求我们每一个体在与不同民族交流交往时要坚持平等原则，在相互了解、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帮助中不断增强对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其二，旗帜鲜明地反对分裂国家图谋，维护祖国统一。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旗帜鲜明地反对任何分裂国家的图谋，维护祖国统一是每一个体的神圣职责。为此，要坚决维护“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全面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本质内涵，坚守“一国”底线，对挑战“一国两制”原则底线、践踏法治与社会秩序、外部势力干涉等行径予以坚决反对，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两岸同宗同源、有着割舍不断的文化血脉，是守望相助的命运共同体。对每一个体而言，支持和追求国家统一是民族大义。为此，要树立统一是大势、是正道的坚定信念，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等各种形式的分裂国家图谋与言行。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在加深相互理解、增进互信认同中提升中华民族认同。

（二）在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的协同作用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教育是一项关涉诸多要素的复杂过程，以涵养爱国情怀，作用于个体精神养成的爱国主义教育更是如此。新时代背景下，更为多元的文化思潮、快速发展及广泛应用的网络技术等给爱国主义教育

带来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整合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等教育力量，形成爱国主义教育合力，是推进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的重要举措。其一，进一步明确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角色定位。家庭对个体产生的影响往往具有初始性和长久性，是爱国主义教育的最初场域。因此，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坚持从娃娃抓起，着眼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发挥家庭教育的启蒙和熏陶作用。学校是系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主阵地，要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理直气壮开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坚持把爱国主义精神贯穿于学校教育全过程，推动爱国主义教育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爱国主义教育总是置于一定的社会空间，每一社会个体均不同程度地接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环境本身即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功能。从爱国主义教育过程来看，政府既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者，也是爱国主义教育有序推进的重要保障力量。基于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在爱国主义教育中的不同地位与功能，从理论上明晰各自的角色定位是爱国主义教育实践系统推进的重要基础。其二，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整体推进。以高度的大局意识统筹规划爱国主义教育，推进爱国主义在家庭、学校、社会、政府等具体层面的系统开展。在家庭层面，注重推进中华传统家教文化中由家及国、家国一体精神的当代传承，挖掘家庭自身包含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发挥家庭成员行为实践的导引作用。在学校层面，着眼不同年龄段、学龄段学生的认知特点与发展需求，区分层次，细化内容与方法，实现爱国主义教育的分众化、差异化发展。在社会层面，把爱国主义与大众传媒、互联网平台深度融合，通过发掘、培养、宣传爱国主义先进典型，创作爱国主义文艺作品，强化爱国主义制度与法治建设等，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创设良好氛围。在政府层面，切实把爱国主义纳入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强化爱国主义阵地的建设与管理，以强烈的目标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工作的指导与沟通。总之，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在统筹规划下各司其职，共同致力于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所占资源及主观条件限制，家庭、学校、社会、政府形

成的教育力量并非完全平衡，有时甚至出现抵消现象，为此，要在坚持目标指向的基础上，对各方力量加以协调，引导各教育力量同向发展，形成爱国主义教育合力。

（三）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如前所言，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现着一定的核心价值观念，建立在一定主流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爱国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精神财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构成，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动力与精神归依。爱国主义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具体而言，以下两个方面是值得关注的着力点：其一，将爱国主义贯穿于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具体领域体制机制的持续改革创新，将爱国主义贯穿于体制机制改革与创新过程是新时代背景下推进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路径。为此，要在具体领域的改革部署与政策设计中包含爱国主义内容，体现新时代爱国主义导向，有效规避具体政策设计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良倾向。把爱国主义融入推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与时俱进、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及基本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之中，使爱国主义成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内生性属性。其二，创设倡导爱国主义精神的治理氛围。国家治理发生于一定的时空场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能抽离具体的环境氛围，环境因素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隐性渗透作用。一个包含积极向上科学导向的环境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具有正向导引作用，反之，则会阻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持续发展。包含爱国主义内容，体现爱国主义精神的治理环境一方面能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正确导向，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始终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底色。同时，积极倡导爱国主义精神的治理氛围有助于最大限度凝聚社会共识，为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撑。

（四）在深化理论研究和理论宣传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从一定程度上讲，爱国主义教育是一种把情感知化、把知识行为化的教育活动，爱国理论的获得与转化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环节。因此，新时代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能不充分认识理论探索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不能不注重在理论研究与理论宣传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首先，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与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持续前进的思想武器。弘扬新时代爱国主义精神不能脱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宣传。为此，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本源、发展规律、实践指向等问题进行深度研究，并充分运用新媒体发展成果，采用多种形式宣传推广。其次，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基础理论的建设与宣传。爱国主义教育基础理论既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理论前提，也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构成。新时代背景下，深入爱国主义基础理论研究与宣传就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本质内涵、原则内容、途径方法、运行规律、质量评价等研究，廓清爱国主义教育理论框架，夯实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论基础。通过课堂教学、理论宣讲等途径传播爱国主义教育理论。再次，从理论上回答实践领域提出的一系列新问题。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面临诸多新的时代课题，如爱国主义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目标，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中的具体定位，爱国主义与提高发展质量与效益、提高社会文明水平、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等课题的相互关联与有机融合等，为推动实践领域的新发展，以上问题均需进行纵深理论探讨。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N]. 人民日报, 2019-11-13(6).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520.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

- 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112.
- [4]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N]. 人民日报, 2019-11-13(6).
- [5]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J]. 求是, 2013(22):3-18.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8:355.
- [7]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N]. 人民日报, 2019-11-13(6).
- [8] 习近平.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 人民日报,
2019-03-19(1).
- [9] 冯刚.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28.
- [10] 冯刚, 王树荫.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年度发布(2018)
[M]. 北京:团结出版社, 2019:389.
- [1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N]. 人民日报, 2019-11-13(6).
- [1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4:260.
- [1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
[N]. 人民日报, 2019-11-13(6).

Implications of Patriotism in the New Era

Feng Gang Gao Huiyan

Abstract: The theme of patriotism in the new era is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spirit of patriotism constitutes the deepest, most fundamental and most eternal content in the core value of socialism. It focuses on highlighting the orientation of patriotism in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and embodies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To carry forward the patriotism spirit of the new era, we need to carry out patriotism education in safeguarding the reunification of the motherland and national unity, in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family, school, social and government, in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in deepening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theoretical publicity.

Key words: new era; patriotism; patriotism education

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经验、影响与启示

杨 威 陈 毅

摘要: 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坚持与时事教育、国际主义教育、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相统一，坚持与群众性爱国运动、各项实际工作、国内其他运动相呼应，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并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系统总结和分析这些经验，对于我们深入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多方面的现实启示意义。

关键词: 抗美援朝；爱国主义教育；经验；影响；启示

中图分类号: D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0)01-0024-10

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权和反抗外来侵略的英勇壮举，它不仅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而且为中国赢得了长期的和平建设环境，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平稳恢复和长期发展。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前线战士浴血奋战和英勇牺牲的辉煌成果，也是国内轰轰烈烈抗美援朝运动的伟大结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国内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战争。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多变，爱国主义教育面临着新挑战与新要求。系统总结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有效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意义重大。

一、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经验

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实践，为我们留

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值得我们认真分析和总结。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时事教育相统一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民众对抗美援朝的态度和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偏差。一方面，多数民众对美国侵略朝鲜的行径表达出无比的愤慨，要求党和政府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在抗美援朝方面，中国民众‘思想认识很不一致’，还存在着一部分对抗美援朝的所谓‘消极性’心态反映”^[1]。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人民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和动乱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人们带来了久违的和平安定局面，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国家领导层，抑或部队官兵，都希望维持和平的生活状态，排斥、厌恶战争的情绪广泛存在。其次，国内民众对朝鲜战争对中国的影响缺乏清晰的认识。不少民众认为，美国侵略朝鲜并不是针对中国，与中国无关；有的官兵认为，“美国鬼子不会打到中国来，……何必多管闲事，不要惹祸上身”^[2]。最后，当时的中美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国内民众普遍

基金项目: 共青团中央“青少年发展研究”重点项目“高校意识形态安全体系构建研究”（19ZD019）

作者简介: 杨威，男，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研究；陈毅，男，河南修武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方法研究。

存在着恐美、崇美和亲美的心态。国内民众的这些消极情绪和心态对当时的抗美援朝形势极为不利，人们亟需一场以时事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

基于这种情况，1950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指示》从多方面说明了朝鲜形势对中国的重要影响，论证了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和正义性，也让全国人民对美帝国主义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一）美国是中国的敌人……（二）美国是全世界的敌人……（三）美国是纸老虎。”^[3]《指示》强调要“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4]。

《指示》发布以后，全国立即开始了以时事教育为主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并开展了“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活动。在论证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方面，《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5]《中国人民支援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要意义》^[6]等社论和文章；在正确认识美帝国主义方面，《人民日报》刊登了《怎样认识美国》的宣传提纲，正如提纲指出：“每个爱国的中国人都应当仇视美国、鄙视美国、蔑视美国！……仇视美国，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死敌；……鄙视美国，因为它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国家，是全世界反动堕落的大本营；……蔑视美国，因为它是纸老虎，是完全可以打败的。”^[7]胡绳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美国在历史上怎样侵略中国》^[8]，揭露美国侵略中国的历史，痛斥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威胁中国的阴谋。通过这些时事宣传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全国人民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洗礼，普遍认识到抗美援朝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基本清除了人们长期存在的“恐美、崇美、亲美”心理，更加激发了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爱国热情。

（二）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国际主义教育相统一

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美国侵略朝鲜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保卫朝鲜人民就是保卫中国人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因此，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爱国主义教育始终与国际主义教育相统一。

早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前夕，我军就开展了广泛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教育工作，除了向广大官兵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和教育，宣传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正义性和紧迫性之外，国际主义教育也是其中的重要方面。譬如，第13兵团政治部专门编制了《团结友邦人民》的宣传手册，宣传手册向广大官兵详细介绍了朝鲜的历史、风俗、习惯，以及金日成的革命生涯和朝鲜人民军的辉煌历史。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修改和审定了《中央军委关于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命令》，这不仅明确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的政治目的，还规定了一系列国际主义的原则和要求，充分彰显出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性。正如《命令》指出：“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9]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又强调：“中国同志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教育指战员、战斗员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如同我们在国内的看法和做法一样，这就是胜利的政治基础。”^[10]

这些国际主义的要求和教育，使广大志愿军认识到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必要性，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和国际主义精神，涌现出无数以罗盛教、黄继光、邱少云、杨根思为代表的国际主义战士，谱写出一曲曲国际主义的英雄凯歌。同时，志愿军战士的国际主义精神得到了朝鲜人民的高度赞赏和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朝鲜人民时常冒着生命危险为志愿军送水送饭、为志愿军提供住所、充当志愿军的向导，以支持和配合志愿军作战；苏联《真理报》、波兰《华沙生活报》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报刊，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报刊，如美国《工人日报》、法国《人道报》、瑞典《新时代报》等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对中国人民抗美援朝的正义立场和行动表示支持和理解。

（三）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相统一

经过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形成了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核心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优良传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充分发挥了我军长期以来的革命英雄主义的优良传统，中共中央号召在志愿军和人民群众中广泛开展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极大地激发了志愿军的战斗积极性，增强了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对志愿军战士的爱戴之情。

在前线部队中，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1]一是“号召指战员人人‘当最可爱的人，做最可爱的事’”，使广大指战员和志愿军战士进一步认识到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斗志；二是“对部队进行光荣历史的教育”，使志愿军战士深刻认识到我军革命英雄主义的优良传统，提高了他们的战斗素养和政治觉悟，促进了我军优良传统的有效传承；三是“广泛宣传英雄模范事迹”，不仅宣传董存瑞、刘胡兰、马特洛索夫等革命年代的英雄人物，还广泛宣传抗美援朝时期涌现出来的英雄事迹，如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等，这些革命英雄和光辉事迹把广大志愿军的爱国热情和战斗积极性推向新的高潮。与此同时，我军在部队全面开展立功创模活动，并颁布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条例（草案）》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立功标准的意见》，规定了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立功评奖准则，为志愿军的立功运动提供了政策和制度保障，使部队形成了“学英雄、争立功”的良好氛围，成为抗美援朝的巨大精神武器。在国内宣传战线上，国内众多媒体向全国人民宣传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的英雄人物和事迹，讴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不朽功绩，号召全国人民向革命英雄学习。《人民日报》先后刊登了《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12]《伟大的邱少云战士》^[13]《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14]等文章宣传罗盛教、邱少云和黄继光的英雄事迹。在作家、战地记者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作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生动描绘出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艰辛，歌颂了伟大的志愿军战士，弘扬了伟大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正如文章写道：“他们的

品质是那样的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的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的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的美丽和宽广……他们确实是最可爱的人！”^[15]这些宣传和报道使全国人民都受到了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洗礼，更激励着前线战士继续奋勇杀敌。

（四）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群众性爱国运动相结合

坚持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最大政治优势，也是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最显著特征，就在于党和政府始终坚持群众路线，紧密依靠群众运动，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群众性爱国运动相结合。在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次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布成立，随后抗美援朝总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教育和政治宣传工作，包括爱国公约运动、捐献武器运动、拥军优属运动、诉苦运动、游行示威运动、爱国防疫卫生运动等。

1951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爱国运动的指示》，《指示》把“发起订立爱国公约”作为当前爱国运动的三个中心工作之一。根据相关数据统计，“至1951年10月，仅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和河北省的统计，即有80%以上的人口订立了爱国公约，全国邮电工人有85%订立了爱国公约，全国农村有50%的人口订立了爱国公约，其中云南省晋宁县有90%的家庭订立了爱国公约”^[16]。签订爱国公约，把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用公约的形式加以巩固和强化，使爱国情感更加内化于心，进而外化于行。1951年6月1日，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以此为节点，捐献武器的爱国主义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全国各地、各族、各界人民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纷纷加入捐献武器的热潮。“自1951年6月1日至1952年5月31日，一年来全国各省市人民银行汇解抗美援朝总会的武器捐款，共为55650亿余元人民币，以每架飞机15亿元计算，共折合3710架飞机，尚余人民币6230万余元。”^[17]从基层农民的捐献粮食，到普通

工人的捐献工资，再到演艺界、工商界、宗教界等人士直接捐献财物，全国上下涌现出无数生动感人的捐献事例，广大人民群众在捐献武器运动中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不仅激发了全国人民更为浓厚的爱国情怀，而且为前线战士提供了巨大的物质支援和精神鼓舞。针对美国发动的细菌战，全国又掀起了反细菌战运动和爱国防疫卫生运动，全国的卫生状况和人民的健康水平得到较大提高，不仅挫败了美国发动的细菌战，更为我国的卫生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全国人民广泛开展诉苦、游行示威等运动来控诉、抗议和揭露美国的侵略暴行，进一步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民族觉悟和爱国热情，等等。这些群众性爱国运动把中国人民牢牢地团结在一起，激发了亿万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极大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

（五）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8]纯粹依靠爱国热情的精神力量是难以打败美帝国主义的，只有将这种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只有将这种爱国热情投入到具体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才能将这种爱国热忱转化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无限力量。“要使抗美援朝运动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就必须使这个运动与当前的中心工作，与各界各业的本身业务结合起来。”^[19]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始终坚持与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使爱国主义精神外化为人民群众的行动力量，不仅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也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物质保障。

为了做到爱国主义教育与各项实际工作相结合，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先后开展了爱国生产竞赛、爱国丰产运动等多种形式的爱国运动。在工厂中，工人们喊出了“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多出一件产品就是增强一份杀敌力量”的口号，他们把生产竞赛比作战场杀敌，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涌现出像“马恒昌小组”“高炉卫士”孟泰、“汗水浇矿山”马万水等先进集体和标兵人物。在农业战线上，宣传和教育农民个人生产和抗美援朝的联系，提高了农民的政治觉悟，他们积极参加爱国丰产竞赛，“爱国丰产竞赛运动的开

展，大大激发了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1951年的粮食、棉花等农作物的产量都超过了1950年的水平。”^[20]在工商界，“着重地宣传工商界的踊跃纳税、反对偷漏税、协助政府稳定市场物价、反对投机倒把的任务”^[21]，既保证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又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在学校中，除了保证正常的授课任务之外，还“把抗美援朝的爱国教育与正课的教育结合起来”^[22]，使学生们在学习中接受爱国主义的熏陶和感染，等等。同时，1951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确立了“精兵简政，增产节约”的方针，在国内整编部队、精简机关、厉行节约、增加生产，在朝鲜战场节约兵力、物力、财力。这样，爱国生产竞赛辅之以增产节约的方针，既提高了人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也形成了全社会的节约风尚，使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每个人的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既保证了抗美援朝的最终胜利，也带动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长远发展。

（六）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内其他运动相结合

建国初期，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被称为党和国家的三大中心任务，这三大任务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处理和解决了民主革命时期的遗留问题，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在抗美援朝的大背景下，坚持爱国主义教育与国内其他运动相结合，有助于广大农民认识到“保护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就是抗美援朝”，也有助于全国人民领会到“镇压反革命就是保家卫国”，从而使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三大任务协同推进。

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中，初步阐述了爱国主义教育与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相结合的问题，明确提出要把时事宣传教育与国内的其他运动相结合。《指示》指出，“可利用适当的实际问题（例如反对奸商投机、奸人造谣、特务活动等），组织街头宣传，发起自愿的向人民解放军和朝鲜人民写信表示敬意和决心等。在农村中，则应结合当前工作（例如加强地方武装、镇压反革命活动等）来进行简要通俗的宣传”^[23]。随着抗美援朝运动的蓬勃发展，抗美援朝运动为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的顺利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社会环境，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反过

来为抗美援朝运动提供了稳定的政治局势。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抗美援朝的时事宣传教育与土地改革有机结合起来。“这种时事教育工作，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地区必须与土地改革教育相结合，使广大工人群众认识土地改革是挖反动势力的根，挖帝国主义走狗的根，是中国人民大翻身的决定条件，因而坚决拥护农民反对封建地主的革命斗争。”^[24]广大农民普遍认识到土地改革就是保家卫国，就是为抗美援朝服务；要保卫土地改革的胜利果实，就必须要进行抗美援朝。这就把农民反封建和参与土地改革的热情上升到爱国主义的高度，同步推进了抗美援朝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的进程。

朝鲜战争爆发后，国内反革命势力的破坏颠覆活动明显加剧，他们借美国侵略朝鲜威胁中国政权之机，四处鼓吹“三次大战”的谣言，妄想“反攻大陆”，各地的暴乱、抢劫、暗杀事件跃然上升，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政权的稳固。基于这种情况，镇压反革命被作为抗美援朝运动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全国各地开始紧密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来促进爱国宣传和教育活动。譬如，在上海市的抗美援朝运动中，上海市委指出：“由于四、五两个月上海工作以镇压反革命为中心任务，因此，上海当前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和深入，须紧紧结合镇压反革命来推动全部爱国公约的订立与执行，并扩大爱国公约中镇压反革命这一条的宣传和实际行动，使广大群众在爱国的基础上认识到，镇压反革命分子就是为贯彻爱国公约，巩固后方，保家卫国，是当前具体爱国行动，发动他们积极参加和支持对反革命分子的斗争。”^[25]通过这些指示和教育，人们普遍认识到美帝国主义是反革命分子的帮凶，抗美援朝和镇压反革命都是巩固社会主义政权的必然要求，不仅促进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迅速推进，更为抗美援朝提供了政治保证。

（七）坚持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建立和完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取得的重要经验，也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安全稳定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统一战线是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必须长期

坚持”，要“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26]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在工人、农民、工商界、宗教界、妇女、学生等各个阶层和群体中广泛开展起来，全国的每一处、每个人都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洗礼，极大地巩固和发展了爱国统一战线，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11月22日，中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关于当前任务的通告》。《通告》指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是一个广泛的群众性的运动。这一运动应当在全国各地各阶层广大人民群众中广泛展开。望联络当时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工厂、各学校、机关、部队及广大人民群众当中的爱国先进分子，向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工作，以普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时事政治教育，推广仇视、鄙视、蔑视美国侵略者的运动，以唤起全国各阶层人民对于美国侵略者的同仇敌忾，扫除美帝国主义残存在中国一部分人中间的有害影响。”^[27]除了前文提到的在工人中开展爱国生产竞赛、增产节约运动，在农民战线上开展爱国丰产运动，在工商界开展诸多形式的宣传教育，在学校开展的爱国教育活动，以及在各阶层各群体开展广泛的时事教育、“三视”教育等爱国主义教育之外，中共中央积极推进宗教界的革新运动和妥善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相关事宜，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在宗教革新运动中，在《中共中央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中提出，基督教、天主教要“利用各种机会和经过有爱国心的教徒，向教徒群众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揭露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与间谍活动的阴谋，领导和支持其中的爱国分子，团结虔信的教徒的大多数，反对仍与帝国主义勾结的少数反动分子，有步骤地使教会摆脱帝国主义的影响及其经济关系，把教会变为中国人自治、自传、自养的宗教事业”^[28]。自此，宗教界纷纷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各教会学校、教会团体、教会医院的人员举行了数次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把宗教界的爱国反美运动推向高潮。在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问题上，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政

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决定》要求这些相关机关和团体要积极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努力肃清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文化侵略影响，割断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与国内反动势力的经济政治联系。以此为基础，众多的救济机关和宗教团体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纷纷开始控诉帝国主义势力控制下的罪恶现象，揭露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进行文化侵略的事实，赢得了广大宗教界人士的强烈共鸣。在这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文化侵略，最后地、彻底地、永远地、全部地加以结束”^[29]。

二、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历史影响

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对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培养国民意识等方面带来诸多积极效应，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精神支撑和物质基础

正如彭德怀在《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工作的报告》中所言：“抗美援朝运动使全国人民受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教育，大大提高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加强了同仇敌忾、打退美国侵略者的决心。正是在这一思想基础上，产生了通过各方面来支援志愿军及朝鲜人民反抗侵略，保卫远东和平与世界和平的强大物质力量。”^[30]一方面，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和志愿军战士的爱国热情和战斗意志，增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必胜信念。在时事教育、国际主义教育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的感召下，广大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深刻认识到抗美援朝的必要性、正义性和紧迫性，基本肃清了“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束缚，“仇视、鄙视、蔑视”美帝国主义的观念深入人心；在朝鲜战场上，志愿军战士充分发挥国际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的优良传统，涌现出无数国际主义战士和英雄事迹，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这些都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最终胜利的精神支撑和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物质基

础。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坚持与各项实际工作相联系，全国人民踊跃参加爱国生产竞赛、爱国丰产运动和增产节约运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全国各界人士积极捐赠粮食、资金、武器等重要物资，有力支援了前线志愿军战士的作战需要，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基础条件。

（二）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巩固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的阶级成分还较为复杂，人们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认知并不完善，不少农民还保留着旧社会的封建思想，有些资产阶级还对社会主义持怀疑态度，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并不稳固。随着美国武装干涉朝鲜战争，国内残余的封建势力开始大肆阻挠土地改革进程，隐藏起来的反革命分子也开始猖獗起来，他们大搞暗杀、破坏、暴乱等恶性事件，严重威胁着社会稳定和政权的稳固。基于这种情况，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紧密呼应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运动，揭露了封建势力和反革命分子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罪恶行径。人民群众普遍意识到推进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对社会主义政权至关重要，他们纷纷参与到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来，极大地推动了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的进程，也对国家稳定和新生政权的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以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为切入点，在原则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是统一的、一致的”^[31]。这就把国家利益和阶级利益统一起来，把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放到同等的地位，使爱国主义与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观念深入人心，进一步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

（三）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促进了国民意识的塑造与整合

梁启超曾指出，“中国人不知有国民也，数千年来通行之语，只有以国家二字并称者，未闻有以国民二字并称者”^[32]。中国传统社会很少强调国民意识的概念，人们的国民意识十分淡薄，直到西方列强的不断入侵，中国人民的国民意识方才逐步生成和觉醒。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中

国人民被压迫被奴役的悲惨命运，但在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和控制下，中国人民的国民意识仍然带有较强的自卑感和屈辱感特征，国民意识仍需进一步塑造和整合，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为之创造了良好的契机和条件。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对国民意识的塑造和整合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意识。在旧社会，在普通大众眼里，“国家”或是皇帝贵族的“天下”，抑或是财阀军阀的势力范围。人们对“国家”概念缺乏清晰的认知和普遍的认同。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对扭转这种观念起了重要作用。经过各种宣传和教育活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成为普遍共识，广大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显著提高。正如云南的一个读报组所说：“过去我们根本不知道国家是怎么一回事，到今天才知道，毛主席领导我们得到了解放，有了自己的国家，也才知道了我们祖国是这样伟大。”^[33]二是主权意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政府割地、租地、赔款，这不仅使国家主权遭到极大损害，更逐步消磨了中国人民的主权意识。随着抗美援朝时期时事宣传和爱国教育的广泛开展，人民群众普遍意识到国家主权至关重要的作用，纷纷投入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浪潮中，中国人民的国家主权意识得到恢复和重塑。三是责任意识。正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的兴盛和灭亡，每个国民都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抗美援朝时期，全国的每一处每个人都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洗礼，“抗美援朝运动与抗美援朝战争交相互动，形成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主题的时代精神，把亿万人民群众最大限度地发动起来，投身到保家卫国、建设新国家的神圣事业中去”^[34]。全国人民积极履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责任，共抓生产建设，齐捐武器物资，展现出昂扬的主人翁姿态和积极的责任意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对国家和民族的忧患意识、责任感显著增强。

三、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现实启示

当前，国际国内环境复杂多变，爱国主义教

育面临着诸多挑战。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全球意识”“超民族主义”“民族国家主权过时论”等观念甚嚣尘上；在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下，民族虚无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等错误论点有所蔓延；同时，我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日常化、常态化、实践化机制并不完备。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所形成的历史经验，为推进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现实启示。

（一）对于开展新时代形势政策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抗美援朝时期，普通民众很难全面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的严峻态势和复杂特点，部分民众还存在着抗美援朝的消极情绪，以及长期以来的“恐美、崇美、亲美”心态也是国内民众的精神束缚，这些都对抗美援朝的顺利推进极为有害。因此，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坚持与时事教育相统一是非常必要和紧迫的。当前，国际国内环境仍然严峻和复杂，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紧密扣时代主题，不断充实和更新形势政策教育的时代内容。从国内局势来看，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有所蔓延，“精日、哈韩、崇美”分子日益活跃，“港独”活动气焰嚣张。从国际形势来看，经济全球化持续发展的同时，贸易保护主义不断抬头，我国周边的国际局势，尤其是东北亚局势仍波谲云诡。这都提醒我们，伟大事业伴随着伟大斗争，伟大斗争需要继续发扬伟大爱国精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引导人们充分认识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敢于直面风险挑战，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在进行伟大斗争中更好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必须把当前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及其对中国的挑战作为重要内容，使人民群众立足于国情来掌握世情的发展变化，更好地认清国内外局势特点和演化趋势，认清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增强忧患意识、斗争精神和亮剑本领。

（二）对于新时代正确认识和处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关系具有启示意义

抗美援朝时期，中国人民志愿军秉持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不仅获得了朝鲜军民的高度赞赏，也

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这是抗美援朝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也是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经验。我们要弘扬的爱国主义，绝不是狭隘爱国主义，更不是极端爱国主义。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不仅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原则，更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时代内涵。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

“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关。我们要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起来，尊重各国的历史特点、文化传统，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善于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增强中华文明生机活力。”^[35]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引导广大人民群众以开阔的视野看待世界，以宽广的胸襟拥抱世界，以积极的心态参与全球化的过程，始终坚持爱国主义的对外开放原则。同时，要教育广大人民群众既要保持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也要恪守对他国的尊重和理解；既要坚持本国的独立自由和主权完整，也要尊重他国的制度选择和发展道路；既要维护本国的利益和诉求，也要履行相应的国际职责和义务，进而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世界人民的繁荣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充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的时代内涵。

（三）对于新时代继承和弘扬革命精神具有启示意义

抗美援朝精神，是抗美援朝这一段历史所形成的宝贵精神遗产，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精神的有机组成部分。抗美援朝时期，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是志愿军战士英勇杀敌的力量源泉。在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感召下，前线志愿军战士“人人争当英雄”，国内民众“人人爱戴英雄，人人学习英雄”，极大地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进入新时代，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中出现了革命意志衰退、革命情怀淡薄的现象，在一些青少年中存在着对革命历史传统和抗美援朝精神的隔膜甚至怀疑，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应当继续传承和弘扬抗美援朝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优良传统，充分利用和开发抗美援朝这一历史资源，加强党史教育，并结合新时代实践发展的要求，为革命精神的教育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时代精神和时代力量。要善于运用新媒体新方法，“推进教育

技术的现代化，把握互联网发展的特点和规律，运用互联网思维开展教育”^[36]。大力宣传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共产党员、志愿军战士、社会各界人士的英雄事迹，充分发挥抗美援朝纪念馆、档案馆、影视文化作品的教育功能，在青少年中加强革命精神与革命英雄主义教育。

（四）对于新时代不断完善爱国主义教育方法具有启示意义

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在方法论原则和具体方法上，都有很多值得继续坚持和发扬的方面。首先，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应当坚持群众路线，广泛开展群众性爱国活动。抗美援朝时期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群众基础。新时代的爱国主义教育，要坚持走群众路线，突出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增强群众性爱国活动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说服力。其次，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应当紧密结合具体实际，使爱国主义教育充分融入人民群众的学习、生活和工作之中。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是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际紧密结合的，抗美援朝运动本身就是日常性的爱国主义教育运动。新时代，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把爱国主义渗透融入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中，探索形成爱国主义教育与日常生活融入贯穿的有效机制。

（五）对于新时代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启示意义

抗美援朝时期，爱国主义教育在工人、农民、工商界、宗教界、妇女、学生等各个阶层和群体中得到普遍开展，巩固和发展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要正确审视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准确把握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的新趋势。在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要继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加强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教育，深刻揭示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大势所趋、大义所在、民心所向，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旗帜鲜明反对分裂国家图谋、破坏民族团结的言行，增进广大同胞心灵契合、互信认同，筑牢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文化根基。

参考文献

- [1] 侯松涛. 全能政治：抗美援朝运动中的社会动员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40.
- [2] 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政治工作总结 [M].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5:22.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437-438.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436.
- [5] 为什么我们对美国侵略朝鲜不能置之不理 [N]. 人民日报，1950-11-06.
- [6] 中国人民支援部队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要意义 [N]. 人民日报，1950-11-16.
- [7] 怎样认识美国 [N]. 人民日报，1950-11-05.
- [8] 胡绳. 美国在历史上怎样侵略中国 [N]. 人民日报，1950-11-20.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 [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235-236.
- [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上） [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449.
- [11] 许贤超.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 [M]. 北京：中国民主出版社，1999:284-285.
- [12] 戴煌. 不朽的国际主义战士 [N]. 人民日报，1952-02-05.
- [13] 郑大藩. 伟大的邱少云战士 [N]. 人民日报，1952-12-04.
- [14] 石峰, 王玉章. 马特洛索夫式的英雄黄继光 [N]. 人民日报，1952-12-21.
- [15] 魏巍. 谁是最可爱的人 [N]. 人民日报，1951-04-11.
- [16]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 抗美援朝战争史（上） [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521.
- [17]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 抗美援朝战争史（下） [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51.
- [1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9.
- [19] 廖盖隆. 爱国运动论集 [M]. 上海：海燕书店，1951:74.
- [20]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 抗美援朝战争史（上） [M]. 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521.
- [21] 廖盖隆. 爱国运动论集 [M]. 上海：海燕书店，1951:75-76.
- [22] 廖盖隆. 爱国运动论集 [M]. 上海：海燕书店，1951:75.
- [2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436.
- [24]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 怎样在工人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5.
- [25] 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抗美援朝运动的情况及今后部署向中央及华东局的报告 [J]. 斗争, 1951(84):7.
- [26]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39.
- [27]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 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66-67.
- [2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408-412.
- [2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411-515.
- [30] 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 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397.
- [31] 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 怎样在城市中开展抗美援朝运动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65.
- [32] 梁启超.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 [M]. 北京：中华书局，1989:56.
- [33] 杨农安. 读报组是对群众进行时事政策教育的重要方式 [N]. 大公报, 1951-08-27(2).
- [34] 庞松.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1949—1976）：第一卷 [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82.
- [35] 习近平. 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 为实现中国梦提供精神支柱 [N]. 人民日报，2015-12-31.
- [36] 冯刚.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28.

Historical Experiences, Influence and Indication of Patriotism Educa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Yang Wei Chen Yi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Chinese people to carry out a variety of patriotic education campaigns. During this period, patriotism education combined current affairs, inter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ary heroism education with the mass patriotic movement as well as various practical work and other domestic movements. It consolidated and developed the most extensive patriotic united front and produced valuable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 systematic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se experiences can help us further promote patriotism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nd better develop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war to resist u.s. aggression and aid korea; patriotism education; experiences; influence; indications

论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王永友 耿春晓

摘要：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对于更好地凝聚和增强人们的国家共识、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和促进民族复兴的实现具有重大意义。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是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是一个整体，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统一于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当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既要注意区分“统一”的层次性，又要注意把握“统一”的对象性，还要注意研判“统一”的真假性。新时代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在实践上需要以史共情激发情感共鸣、以情蕴理涵养理性素养、以理铸魂强化爱国主义精神，在爱党中体现爱国、在爱国中体现爱社会主义、在爱社会主义中体现爱党。

关键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统一

中图分类号：D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20)01-0034-09

《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明确指出，要“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1]，这既是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总体要求，也是开展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坚持的根本原则，还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本质体现。站在新的历史当口，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需要更加强调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为此，厘清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理论本质、时代要求和实践进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重大意义

新时代强调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无论从国家层面、政党层面还是民族层面都具有极

其重大的意义，能够更好地凝聚和增强人们的国家共识、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和促进民族复兴的实现，进一步增强人们的国家意识、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

(一) 更好地凝聚和增强人们的国家共识

在国家层面，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能够更好地培育人们的国家认知共识、凝聚人们的国家情感共识、增强人们的国家认同共识。一是能够培育和提升人们对国家基本体系的认知共识。国家基本体系不仅蕴含国家理论体系、文化体系、功能体系、治理体系、发展体系等内容，而且蕴含国家领导体系、国家制度体系等内容，融合了我国政党制度、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等内容。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将国家与党、社会主义的发展融为一体，将爱国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大众认同困境与破解策略研究”（17ASK018）

作者简介：王永友，男，重庆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重庆市高校师生思想政治工作研究咨政中心执行副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化发展与意识形态建设，社会思潮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耿春晓，女，山西平遥人，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社会思潮与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与爱党、爱社会主义同步推进，既有助于人们自觉认知国家基本理论，又能够促使人们自觉认清国家发展与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发展息息相关，更好地培育和提升人们对国家的系统认知，达成国家认知共识。二是能够培养和凝聚人们对国家归属荣辱的情感共识。对国家有强烈的归属感、把国家荣辱与个人荣辱融为一体，是达成国家情感共识的重要旨归。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进一步明确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国家利益的逻辑关系，能够将人们的情感诉求、价值追求，与党、国家、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和荣辱兴衰联系在一起，促使人们认识到个人价值只有在党的领导、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中实现，更好地培育人们对党忠诚、对社会主义信任、对国家信赖的情感价值，进而更好地凝聚人们对国家的情感共识。三是能够凝聚和增强人们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同共识。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同，就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这是达成国家认同共识的基础和前提。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能够有效破解人们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质疑，实现国家发展道路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有机统一，促使人们对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革开放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广泛认同，进一步凝聚人们对国家发展道路的认同共识，增强人们对国家发展的认可度、支持度，进一步强化国家使命意识和责任意识。

（二）更好地坚持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政党层面，新时代坚持实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能够更好地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建设、增强人们对党的政治认同。一是能够更好地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中国的发展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历史和人民在长期实践中做出的正确选择。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明确了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国家发展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了在我国只能实行社会主义制

度，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能够更好地帮助人们理解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当代中国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不可动摇性，进而更好地坚持和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二是能够更好地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建设。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强和改善党的全面建设，既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之义，也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强调了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政党建设的思想，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永葆共产党人政治本色。”^[2]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将党的建设和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结合起来，及时发现和解决在发展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能够更好地破解党内“四风”问题，促进全面从严治党，进一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进而增强党的政治能力和领导能力。三是能够更好地增强人们对党的政治认同。人们对党的政治认同，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形象问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效果问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能否长期执政的问题。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既能够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是领导一切的，巩固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坚定人们爱国就必须要爱党爱社会主义的信念；又能够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歪曲、否定和误解，深刻认识和理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始终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进一步增强人们对党的政治认同。

（三）更好地推动和促进民族复兴的实现

在民族层面，新时代坚持实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对“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全民族力量，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3]具有重大意义。一是能够振奋民族精神，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信念支撑。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

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力量源泉，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凝聚力的重要体现，是一个民族得以自信的根本。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能够进一步汇集中国共产党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和团结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能够进一步激发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梦想精神，进而不断增强中华民族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定信念支撑。二是能够凝聚全民族力量，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力量支撑。只有振奋民族精神，中华民族的生机活力才能得以进一步彰显，中华民族的磅礴之力才能得以更好地凝聚，才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能够更好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国家发展、民族进步统一起来，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凝聚起全民族力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不懈奋斗，为基本实现现代化、早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民族力量支撑。

二、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理论本质

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是新时代爱国主义的本质体现，是新时代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共同统一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爱党和爱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爱党必须爱国，爱国一定要爱党，二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一方面，爱党是爱国的本质体现，爱党必然要爱国，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实践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爱党和爱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就自觉将共产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自觉肩负起实现民族独立振兴、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的责任和使命，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深刻体现了对国家的期许和热爱，党和国家的发展目标相一致，爱党和爱国相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始终代表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始终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服务，这就决定了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建设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就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爱，爱党和爱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另一方面，爱国既是具体的情感表达，也是真实的行为实践，爱国一定要爱党，爱党和爱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之中。爱国是对中华大地的真切热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传扬、是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深刻认同、是对全体中国人民的真心爱戴、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衷心拥护、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动实践，其本质就是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具体表现为对国家的强烈归属感、对人民的强烈责任感、对党的强烈拥戴感、对社会主义的强烈认同感，深刻体现了爱国和爱党的内在统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这不容任何人、任何组织质疑，爱国就要爱党，就要爱由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就要始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继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不懈奋斗，把爱党和爱国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

（二）爱国和爱社会主义统一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爱国必须爱社会主义，爱社会主义一定要爱国，二者统一于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一方面，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我国的

根本制度，社会主义是国家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内容，爱国就必须要爱社会主义，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经过长期实践探索出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做出的正确选择，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国家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为此，爱社会主义就一定要爱国，一定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爱国与爱社会主义不可分割，二者统一于中国共产党必须肩负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指出，“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4]。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带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实际相结合，领导中国人民实行改革开放，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只有中国共产党勇担使命，推动社会主义的繁荣发展，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因此，爱社会主义一定要爱国，爱国必须爱社会主义，二者统一于中国共产党肩负的历史使命。

（三）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统一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

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来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是统一的。习近平指出，“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5]。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的80多年历史中，

中国各阶级人民一直致力于探索救亡图存的救国方案，并进行了种种尝试，但都未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最终导致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失败，中华民族复兴举步维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在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斗，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以来被剥削被压迫的局面，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和根本政治保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了一切剥削制度，推进了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两弹一星”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当代中国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和国家的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光明前景。中国近代史表明，正是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性跨越。因此，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就是对国家的热爱、对国家的热爱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爱国爱党爱社会主义三者内在统一于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征程中。

三、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时代要求

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是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经过实践总结得出的科学结论。站在新时代的历史当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

义相统一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提出了许多新的时代要求，既要注意区分“统一”的层次性，又要注意把握“统一”的对象性，还要注意研判“统一”的真假性。

（一）注意区分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层次性

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在道德情感层次、制度约束层次和理性自觉层次上具有不同的要求。一是道德情感层次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这是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最基础层次的要求。情绪情感是一种自发的心理活动，作为生活在新时代的中国人，大多数民众并未亲身经历近代以来的苦难，并未亲自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青年学生还未能亲自投身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很难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去体验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社会主义三者的紧密联系，因而在情感态度和道德要求上，应主动学习了解党史、国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更要懂得新时代美好生活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奋斗出来的，进而对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强烈的情感归属，在思想认识上对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事业给予支持和赞成，主动参与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去。二是制度约束层次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这是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最关键层次的要求。制度约束是一种硬性约束，是制度层面的制约和规范。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需要对大众爱不爱党、爱不爱国、爱不爱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行为在制度上作出规范性约束，从制度层面规定或明确哪些思想或价值观念是对的、哪些是错的，什么样的行为才是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什么样的行为有损党和国家的利益与形象，怎样做才能实现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等。如面对当前严重的“港独”“台独”等思想，针对一些激进分子做出损害中国共产党形象、损害国家形象、损害社会主义发展的行为，迫切需要在法律层面做出制度性规定，对有关人员予以更刚性的制度性约束。三是理性自觉层次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这是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最根本层次的要求。理性自

觉是一种高度觉悟下的思想活动和行为实践。理性爱党，要求我们既不把党“神化”、不过分鼓吹党“万能”，也不“污化”党的形象、弱化党的地位和作用，对党的历史认知理性、对党发挥的作用和做出的功绩认同理性。理性爱国，要求我们必须自觉维护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不做有损国家荣誉、威胁国家安全的事，自觉把国家利益与个人荣辱有机统一起来。理性爱社会主义，要求我们既不搞社会主义“万能论”，也不诋毁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能够自觉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去，努力实现对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理性自觉认知认同。

（二）注意把握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对象性

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针对不同的主体对象具有不同的要求。一是针对中国共产党员及党政领导干部，要求必须积极践行与共产主义理想相一致相统一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重要的身份标识和安身立命之本”^[6]，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共产党员的自我修养、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对身边的普通民众发挥着重要的带头示范作用。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要求共产党员、党政干部必须忠诚于党、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必须以身作则，自觉践行与共产主义理想相一致的行为，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人民、热爱共产主义，自觉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不懈奋斗。二是针对普通民众，要求必须积极践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相一致相统一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我国是人口大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需要全体中国人民的真心支持和衷心拥护。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要求普通民众从心理上自觉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认同完全统一的中国和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在行为上支持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支持并参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力量。三是针对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要求必须积极践行与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相一致相统一的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海外侨胞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支持和参与。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要求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真心支持和衷心拥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热爱祖国、热爱中华民族，认同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愿意且主动为实现香港、澳门、台湾的繁荣稳定，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祖国完全统一贡献智慧和力量。

（三）注意研判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真假性

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要注意研判不同对象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真假情况、注意甄别其思想与行为是否统一，坚决防止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表面性和虚假性。一是注意研判新时代共产党员思想与行为是否统一，是否真心认同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理想，是否真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共产党员真心认同、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精神支撑，是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重要表现。“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是各种客观实际以生动的形式进行的汇集聚合”^[7]，面对党内“四大风险”“四大考验”和“四风”问题，新时代要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必须善于甄别并及时发现党员及其领导干部是否存在理想信念动摇、共产主义信仰不坚定等思想问题，是否存在口头上、表面上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实际上却在背后散布歪曲党的言论、丑化国家形象、泄露国家机密、出卖党和国家的行为；是否存在思想与行为相背离、是否存在心理背叛与行为“出轨”，这是研判新时代党员及其领导干部是否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前提性要求。二是注意研判新时代普通民众思想与行为是否统一，是否真心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否真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人民群众真心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前提，是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重要表现。面对国内网络民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的泛滥，新时代要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必须准确掌握普通民众的思想动态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地甄别和把握普通民众是否真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真心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针对不同民众的思想和行为做好相应的引导工作，对于真心支持和拥护的民众要积极鼓励，对于虚与委蛇、摇摆不定的民众要教育引导，对于抵制、反对的民众既要注意态度坚决，用法律、制度约束其行为，又要努力疏导，通过释疑解惑匡正其思想认识，这是研判新时代普通民众是否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基础性要求。三是注意研判新时代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思想与行为是否统一，是否真心拥护祖国统一，是否真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真心拥护祖国统一是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重要表现。2019年以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出现的“暴力颜色革命”，严重威胁香港地区的繁荣稳定，一些不法分子通过制造暴乱，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恐慌，妄图破坏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面对部分地区的严峻状况，新时代要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科学判断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是否真心拥护祖国统一，是否认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否真心热爱祖国，是否真心认同“一国两制”，这是研判新时代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是否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最为迫切的时代要求。

四、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的实践进路

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在实践上需要以史共情激发情感共鸣、以情蕴理涵养理性素养、以理铸魂强化爱国主义精神，在爱党中体现爱国、在爱国中体现爱社会主义、在爱社会主义中体现爱党。

（一）以史共情：激发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共鸣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

剂。”^[8]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必须学习了解党史、国史和社会主义史，以史共情，在掌握相关历史的同时激发人们对党、国家、社会主义的情感共鸣，以此培养人们的“党情”“国情”和“社情”。一是注重中共党史教育，激发爱党爱国的自觉性，在爱党中体现爱国情感。进行中共党史教育，帮助人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组织建设和发展状况，把握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体悟中国共产党近百年来不懈奋斗的艰辛，继承和弘扬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孕育出的精神谱系，知史爱党。在重温中国共产党历史的过程中，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制度优势，增进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对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热爱，感知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激发人们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情感共鸣，在培育爱党过程中体现爱国情感。二是注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教育，激发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主动性，在爱国中体现爱社会主义的情谊。进行国史教育，帮助人们了解七十年来的社会主义探索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明晰中国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掌握中国未来发展的目标蓝图，进而认同国家七十年来的发展成就，珍惜新时代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继承和弘扬中国精神和时代精神，知史爱国。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对自身拥有的传统和价值的充分认同与肯定，是对其文化旺盛生命力所保持的坚定信心和希望。”^[9]在学习国史的过程中，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国家的繁荣富强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而培养人们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国家的归属意识，培养人们热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激发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情感共鸣，在培育爱国过程中体现爱社会主义的情谊。三是注重社会主义史教育，激发爱党爱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在爱社会主义中体现爱党的情怀。进行社会主义史教育，帮助人们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建设和发展历史，了解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懈探索、发展和建设的历史，知史爱社会主义。在学习社会主义史的过程

中，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根本保障和必由之路，进而增进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热爱和拥护，增强对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热爱，激发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共鸣，在培育爱社会主义过程中体现爱党的情怀。

（二）以情蕴理：涵养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理性素养

“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必须在激发情感共鸣的基础上，以情蕴理，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涵养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自觉理性，进而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坚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一是以“党情”蕴共产主义理想，涵养理性爱党。共产主义理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奋斗目标，既是中国共产党的价值基因，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之“钙”。通过学习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激发人们的“党情”，以“党情”蕴理想。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定人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以提升思想觉悟。对于共产党员，要通过理想信念教育，不断提升修养水平，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共产主义信念；对于普通民众，要通过共产主义信仰熏陶，实现理性爱党，不歪曲、不污化党的形象，真心支持和拥护党的决定，坚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信任，自觉在党的领导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二是以“国情”蕴民族复兴信心，涵养理性爱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10]，为了实现这一梦想，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站在新时代，我们必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通过学习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激发人们的“国情”，以“国情”蕴信心。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定人们对国家发展的信心、对民族复兴的信心、对祖国统一的信心。通过不断强化理性爱国修养，促使人们自觉维护国家荣誉和国家形象、自觉拥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主动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三是以“社情”蕴社会主义信

念，涵养理性爱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是我们自觉投身国家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通过学习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激发人们的“社情”，以“社情”蕴信念。通过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定人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理性看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挫折，为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贡献力量。

（三）以理铸魂：进一步强化爱国主义精神

“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的本质就是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高度统一。”^[11]新时代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必须在涵养大众理性素养的基础上，以理铸魂，通过筑牢“党魂”“国魂”“社魂”，进一步强化爱国主义精神。一要筑牢“党魂”，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通过引导人们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制度优势，深化人们对共产党领导的认识，坚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认同，增强人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以筑牢“党魂”，自觉坚守初心勇担强国使命。二要筑牢“国魂”，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通过引导人们深刻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认识七十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深化人们对国家改革发展的认识，坚定对祖国的热爱，增强人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信心，以筑牢“国魂”，自觉肩负起反分裂促统一的使命责任。三要筑牢“社魂”，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深化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认识，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

化自信，以筑牢“社魂”，自觉肩负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使命责任。新时代只有坚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相统一，进一步强化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才能坚定不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维护祖国完全统一，坚定不移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N]. 人民日报, 2019-11-13(6).
- [2] 冯刚. 改革开放40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编年史(1978-2018) [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9:631.
- [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N]. 人民日报, 2019-11-13(6).
- [4]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 人民日报, 2017-10-28(1).
- [5]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12-19(2).
- [6] 郝书翠. 习近平关于人生观重要论述的四重向度[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4):56-64.
- [7] 关锋, 王晓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三大基本原理的“守正出新”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9(3):102-107.
- [8] 习近平. 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 [N]. 人民日报, 2014-07-08(2).
- [9] 冯刚.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史[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27.
- [10] 习近平.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奋勇前进[N]. 人民日报, 2012-11-30(2).
- [11] 习近平.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 2018-12-19(2).

Integration of the Love for the Party, the Nation and Socialism in the New Era

Wang Yongyou Geng Chunxiao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adhering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love for the Party, the nation, and socialism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better consolidating and strengthening people's national consensus, strengthening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promoting the realization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It is also the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of soul cultivating and character forging. Love for the Party, the nation, and socialism is a whole, integrated with the great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with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with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At the historical juncture of the new era, to adhere to the integration of the love for the Party, the nation, and socialism, not only should we distinguish the levels of "integration", but also grasp the objectivity of "integration ", as well as study and assess the authenticity of "integr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integration of the love also requires us to inspire emotional resonance with historical empathy, cultivate rational literacy with emotion, strengthen patriotism with reason, and embody each love in one another.

Key words: love for the party; patriotism; love for socialism; integration

文化转型与学科发展取向

刘亚敏 夏施思

摘要: 依循“文化—教育—人”的逻辑关系,思考文化转型对人的发展施与的影响,从而审视学科发展取向,有助于学科建设从思维到行动上做出最具发展性的决定。文化转型彰显了由主体性、开放性、创造性、多元性、整体性、关联性、相对性等文化品格所共塑的时代精神,新的文化形态是对人性的审美本质的揭示、尊重与弘扬,审美教育让人的主体意识、情感获得自由展现;单学科中心主义的学科建设是“经济个性”与“专家个性”取向的产物,不利于“完整的人”的培养。基于“文化个性”取向,在理念层面,学科发展应尊重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的统一;在建制层面,学科发展应在正式学院建制的同时也注重发挥“无形学院”组织形态的作用。

关键词: 文化转型; 审美教育; 完整的人; 学科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 (2020) 01-0043-07

歌德说:“凡是希望成为最高尚的人,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人。”^[1]这是对单向度的人、分裂的人、自我中心主义的人的教育时弊的有力批判。学校教育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培养“完整的人”是教育的宗旨,是对教育质量、人才标准的质性规定。在学科规训体制下长期培养单学科思维的专业人才是现代大学最为显著的基本特征之一。我们在争创一流大学、建设一流学科的进程中,建大楼、引大师、育人才等举措的投入不可谓不高,但还是有充足的证据表明我们在通过学科建设追逐世界一流道路上,走得较远却忘记了为何出发。学科建设的目的是什么?学科发展如何把握时代精神?如何发挥学科育人功能以回应文化形态的时代变迁?研究理当在这些问题编织的宏大背景下对学科建设与发展做理性而精进的思考。批判当下单学科中心主义的学科建设思路,是否否认真一学科纵深发展的必

要性,而是强调沿着“文化—教育—人”^[1]这一逻辑出发,发挥学科的育人功能必然要求学科建设对时代精神予以积极回应,摒弃“经济个性”和“专家个性”思维,基于“文化个性”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将有助于大学学科建设在思维和行动两个方面做出更具发展性的决定。唯有如此,学科建设才是一项对大学发展而言富有生命力的“育人工程”。

一、文化转型: 对以审美价值为尺度的艺术文化形态的预见

文化转型是指在社会物质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形态逐渐消退,另一种新的文化形态逐渐形成而替代原有文化形态在社会物质生活领域和精神生活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过程^[2],它是文化演进的必由之路。当一种文化形态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实施路径研究”(18JZD04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我国高校博士生教育质量治理机制研究”(18YJA880057)

作者简介: 刘亚敏,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大学文化与院校治理研究;夏施思,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高校审美教育。

居于主导地位，新的文化形态便孕育其中并逐渐生长，经历一个漫长的对旧有文化形态的审视、反思与批判的历程，而促进人类在精神生活领域、社会实践领域和知识领域的整体变革，来实现对原有文化形态的扬弃，取而代之并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文化转型意味着新旧文化形态之间的交错更替，而非发生断裂，它是对前一种文化形态的否定和发展。文化转型是由社会接纳的创新决定的，预见文化之转型，创发改革之先声，其改革行动往往造就时代典范。18、19世纪之交，德国在面临内忧外困之际发起大学改革，柏林大学率先以科学研究大旗宣告宗教文化形态退出历史舞台而代之以科学文化形态的高扬，从而成为引领19世纪世界高等教育近代转型的旗手。毋庸讳言，越早敏感到文化形态变迁趋势的国家，就越能具备世界引领力；越早适应文化转型的教育，其育人功能就越强大。

人类文化经由宗教文化、科学文化，必将转向艺术文化。其中，宗教文化和科学文化是“属体文化”，文化是属于人的，因而也称之为人类文化；而只有文化成为自主的事物，不再受人的控制，人类彻底文化化了，这时的文化超越于人类而存在，就是艺术文化，即“本体文化”。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历程经由宗教、科学、艺术这三个阶段的跃迁而表现为三种不同文化形态的更替，即宗教文化向科学文化，进而向艺术文化的转移。^[3]三种不同的文化形态是情感与认识的发展关系决定的。情感与认识相混合的文化形态是宗教文化，此时人类具有尚不发达的思维能力，主观与客观、存在与观念、情感与理智尚未充分分化，因而在既需要认识自然而又对自然充满畏惧的条件下，形成了一种以信仰为基本特色的文化形态。文化在分化中进化，随着人类思维意识发展，当认识因素与情感因素分开之后且前者占据了支配地位之时，科学文化替代了宗教文化。科学文化本质上属于认识性文化，它的根本功能是认识自然界和人类，进而改造自然与调和人类，通过所造就的丰富的物质文化财富，提高了人类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力量。我们正在经历科学文化时代，虽然也有艺术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但后者尚未达到足以与科学文化抗衡的水平。当情感因素由弱到强，并在科学文化的基础上充分发达起

来，就形成了独立的文化新形态，即艺术文化。艺术文化是一种超越了人类动物本能的文化，也就是一种本体文化，它是一种充分实现了意识（精神）与物质合二为一的文化。

科学文化是人类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但还不是制高点，因为科学文化在造就物质财富提高人类的力量的同时，又给人类套上了新的枷锁，造成了自然物质与人工物质的双重压迫和禁锢，并未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目的。科学文化解放的主要是人的动物本质，只有富含情感内容和审美价值的审美文化，才是体现人的文化本质的文化。情感不是人的动物生命力，而主要是人的文化生命力，它是高尚的、自由的、博大的、完美的。审美追求的唯一目标就是主体意识、情感的自由展现，以审美价值为尺度的艺术文化是可以让人的情感自由奔驰的原野和世界，是可以最大限度解放人、达致自由、臻于至善的世界。

进入21世纪，新的时代形态已为先知先觉者们所预见，于20世纪掀起的文化思潮以及当下高涨的创新驱动发展的意识，其实就是孕育在科学文化母腹中的“艺术文化”的种子。文化转型悄然发生，与其说是科学文化的进一步壮大，不如说是艺术文化的种子正在萌芽。这一文化转型彰显了由主体性、开放性、创造性、多元性、整体性、联系性、相对性等文化品格所共塑的时代精神，它为当下社会各领域的发展与变革奠定了思想基石、提供了价值判据。以经济社会发展为例，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变令世界瞩目。然而，当代中国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还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何正确地回应经济社会转型，取决于我们对经济社会转型的质变做出正确的理解。概括起来，经济社会转型不仅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是人的发展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型要求从重物质生产、轻价值创造、忽视生产主体“人”的多种需求和创造潜能，转为“以人为本”，激发主体性，超越认识主体而培育价值主体。因此，经济转型要回答的是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等问题。对此，最早经历工业革命的英国也最早认识到，后工业时代来临必须对最活跃的生产要素“人”作一个新的理解。1943年，英国首相丘吉尔

曾在哈佛大学的演讲中发表了著名的观点：未来的帝国将是有头脑的帝国。这里的“有头脑的”意思就等同于“创意”，也可以说，有创意的大脑对国家的发展具有战略意义。正因为如此，为了挖掘国家发展的动力源，英国是最早将创意产业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的国家。那么何谓创意？产生创意的来源是什么？仅仅靠知识积累或者传统的知识生产模式均无法产生创意，而势必需要激发人内在的主体性、创造性、整体性。在崇尚认识成就与物质成就的科学文化时代，不可能源于人的本性创造一个超越物质的世界，因为真正的创造离不开审美情趣和主体自由意识，而这实质上是对以审美价值为尺度的艺术文化形态的呼唤。

二、审美教育：培育人的主体意识与审美情感

对文化转型的认知，对时代精神的捕捉与领悟，究其实质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培育适应时代发展并引领时代发展的“完整的人”。在伊曼纽尔·康德看来，修养教化的意思是，人应该愈来愈成熟，越来越独立，自己塑造自己。亚伯拉罕·马斯洛提出了“人的潜力”的概念，认为人的需要应当获得表达，蕴含在人自身中的发展潜力和个人的独特性应当充分被发掘出来。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社会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以上活动都离不开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广袤的情感世界。主体是由主体意识、情感组成。在情感中，审美情感是其最高形态，它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审美情感的形成是从动物到人类以及人类长期进化的产物。审美价值尺度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价值取向，也是一种追求自由的价值尺度^[4]，与之相较，科学文化的理性尺度本质上是一种对客体的崇拜，对主体的贬低，是一种求真、求实用的尺度，人往往不是作为目的而是被当作手段。因此，审美价值尺度追求的意识性、主体性目标，在科学价值尺度看来是虚幻的、无用的，审美活动在科学文化时代只被当作一种补充性的闲暇活动。显然，科学文化尚不足以让人的主体意识、情感获得充分的解放与自由，相反，科学文化越发展，主体

意识、情感所感受到的压抑越大。对此，我们现代人的生活状态恰好影射了这一点：物质丰富、信息爆炸、节奏加快，导致精神式微的现象愈来愈引人关注，人们想要摆脱物的依附的意愿越来越强烈。

现代审美教育是一种情感教育。解放人、发展人及提升人的审美情感，是科学文化进化到艺术文化的助推力。同时，也只有求美的审美文化才能使主体意识、情感获得自由。虽然在科学文化求真、求实用的价值尺度中，也隐藏着求解放、求自由的内在追求，但唯有推动科学文化进化到艺术文化，主体价值才可能取代客体价值占据文化的统治地位。为此，在艺术文化到来的预见中，揭示、激发并高扬人性的审美本质是文化转型对教育转型提出的挑战。蔡元培在20世纪初提出的美育思想，也是对这一新的教育使命的先知先觉。人的审美能力的缺失和审美意识的淡薄，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日益突出，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科学文化“蜕化”之时正是艺术文化的萌生之际，而审美教育将发挥破旧立新的作用。

审美教育是人类实现自我发展需要的重要途径，培育人的主体意识与审美意识是审美教育的重要内容。人的主体意识自由离不开审美活动，马斯洛把人的审美活动和人性的自我完善联系在一起。审美超越的实质，是以审美超越了主观与客观的对立、意识与物质的对立、人类与环境的对立、个人与社会的对立。当主观与客观、意识与物质的对立在审美中被超越了，人类与环境的对立在审美中就会消失不见，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也会被审美所抹杀。人的主体意识是以追求自由为本的，而真正的彻底的自由只能消灭前述四大对立才能完成。所以，以追求主体意识自由展现的审美必定要以超越以上四大对立为基本特征。具有审美意识且审美意识成为占主导地位意识的人，才是审美主体，而一个主要从事审美活动的人，必须拥有占有支配地位的审美意识，能依据审美意识去从事创造美的活动和欣赏美的活动。现代人之诞生于世，如果没有接受审美教育，没有审美意识，他就不可能投身于审美活动，也就不可能是审美主体。概言之，只有审美意识成为占主导地位意识的人才是审美主体，因

为审美意识是情感的升华和集中表现，是主体意识高度自由以至达到超越物质追求的境界的体现。

三、学科发展：以“文化个性”为取向

20世纪以来，世界文化形态所发生的大变革，一方面与学科发展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文化形态变迁也为学科发展昭示了新的使命与新的方向。在精神生活领域，量子力学、相对论、耗散结构理论、混沌理论、生命科学、信息科学等科学研究成果揭示了世界的开放性、创造性、多元性、相对性、联系性、自发性、运动性等本质特征，这是对牛顿机械主义将世界理解为封闭的、僵化的、单一的、绝对的、孤立的、被动的、静止的现代世界观的否定和超越。随着生产力与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后工业文明呈现出了多元化、弹性化、开放性、无穷变化和普遍联系的生活形态。进而在知识领域，具有多样性、境遇性、个体性、相对性特征的后现代知识型动摇了以标准性、客观性、普遍性、确定性为特征的科学知识型的霸权地位，而逐渐成长为当今时代的主导知识范式，它是一种更为民主、开放的知识型。^[5]然而，学科建制习惯对于学科发展力而言是一种局限。受库恩的“范式”概念的影响，学科建制的支点落在了“学科规训”上，一切学科活动主要以维护学科共同体和加固学科体系为职志，对于传统的学科而言如是，对于新兴的学科而言也如是，其地位毫无例外地是靠建构完整的学科体系得以确立。

科学的职能是认识世界，不同门类的学科都是从不同领域对世界进行认识的结果。如今，新兴的学科层出不穷，不断地促进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学科建设对于科学文化的发达而言，其作用也是巨大的。不过，回到学科发展本身上来，当下学科建设的主导性意志其实体现的是“经济个性”取向与“专家个性”取向。随着技术变化迅速而普遍，正如我们所见所感，一是专业化让融合性对话和开放式交流变得很困难，专业化使专业人士的头脑、身体、情感和精神难以融合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自20世纪中期以来，经济个性和专家个性一直主宰着学科发展思维。经济个性的主

要问题是把人看作一个消费者、一件商品、一位追逐利益者和市场中的最大满足者^[6]，这趋向于把个人当作屈从于市场利益的一个客体而不是主体，为此，经济个性取向下的学科建设无法摆脱效率、速度、规模、可视化的奴役。二是在专家个性取向的决定下，个人趋向“朝市场上可以出售的、技能范围很窄的专业化方向发展”^[7]。世界问题越来越复杂，一个问题往往就涉及到诸多要素，如技术要素、经济要素、政治要素、精神要素等，经济个性和专家个性使个人的形象成为单维度的或单向度的，可是要解决的问题却是多维的、综合的和开放的。学科思维形塑人的个性，因此根据这两种标准来判断人、规定人的行为是有害的，摆脱经济个性与专家个性取向的束缚，适应文化转型，朝向文化个性转变是未来学科发展的必然选择。

文化个性是整体的，文化个性强调把所有组成部分融合成一个相关的和复合的整体，以“促成整体”为目的，强调“崇高地思考”，即乐意去思考各种行为不仅对自己，而且对其他人、今后几代人，对自然万物的影响以及最后对宇宙的影响。文化个性取向下的学科发展，关注的不只是通过学科“规训”推动人作为认识（或思维）主体的发展，而更在于突出人作为价值主体的发展，即人是“自由、目的、责任”的主体。如歌德所言，“你不能改变你生活的时代。但是，你能反抗它的趋势，并为其顺利发展奠定基础”^[8]。学科建设立足于学科发展的使命，理应有超越时代局限性的勇气，抛弃不符合未来时势的偏见，以培育完整的人和具有高度的人为法则。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大学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框架下以学科建设为要务，学科建制强调学科内部的分化、交叉，以及学科领域内的“科学共同体”的发展壮大。如此作为，一方面使学科的边界越来越坚固，另一方面，学科发展的思维越来越僵化或窄化。事实上，从学科发展本身而言，学科发展到鼎盛之时正是学科需要突破封闭状态寻找生长点以求突破之时，从学科发展的育人功能而言，学科发展应当摒弃单学科中心主义之弊，致力于“完整的人”的养成。由此，具有整体意义的“文化个性”取向将决定学科发展的立场和前景。

首先，“文化个性”取向的学科发展，将尊重科学的研究的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的统一。将不同的学科理解为彼此独立、互不联系的知识体系，是违背知识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学科的发展内在于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的统一。

学科性与跨学科性并非矛盾对立，而是矛盾统一的。学科知识体系的充实、创新与完善需要在跨学科视野的引导下，通过具体的学术实践加以完成，且很多学科的学科性以跨学科性的有效发挥作为自身不断壮大的前提和基础。以文学理论为例，20世纪文学理论先后借助于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成果积极构建属于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学术形态，从而呈现出跨学科意义上的现代文学理论图景。^[9]由此，文学理论在保持自身学科特色的同时，通过跨学科的视野与实践，有效地保证了理论知识的增长与不断创新，保持了理论对现实的敏锐性和阐释机制的活力。尤为重要的是，跨学科性作为文学理论知识构成上的重要性质，不仅为文学理论的学科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知识理路与思想方法，而且也在更广阔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层面上显示出文学理论学科的兼容性与灵活程度。事实上，各门学科在明确学科外部界限的同时，针对某些问题的求解，其知识内部必然需要通过跨学科的关联达到系统化与综合化。就研究内容而言，各门学科之间呈现出明确的学科界限，但在共同研究目标的层面上，如果不能适时地借助于其他学科知识的支持与帮助，各学科皆难以在本学科领域内获得全面而完整的知识，正如著名美学家托马斯·门罗所言，各种不同学科的现象领域之间的界限是灵活的、任意的，划分界限的依据是暂时的和权宜的。^[10]

学科分化一方面促使学科发展，但与此同时，学科发展又以学科的高度融合为旨趣。学科结构过于孤立和单调，就无法形成学科发展的环境和学科群体氛围，难以实现学科之间的互动、难以产生学科的协同效应。虽然大学的开放程度较之以往增强了许多，但是学科建设作为大学的龙头事业，大学的目光还只是停留在将某一单个学科做强、做大的思路上，也就是说“单学科中心”的地位从未被跨学科人才培养的时代之趋势所动摇，所谓的学科交

流，只是局限于“多”（multi-）学科，或者“交叉”（cross-）学科这些阶段，而没有更前瞻性地走向融合意义上的“跨”（inter-）学科。“跨学科性”“交叉学科”和“多学科性”代表着学科合作的不同阶段。与多学科性、交叉学科不同，跨学科性包含了超越溢出一个学科的范围，是一种模糊学科之间界限以解决现实复杂问题的方法，或者是一种构架研究中专业知识和政策中普遍认识的方法。可见，跨学科旨在通过打破学科界限，利用学科之间的协同效应，实现学科的整合，其特点彰显于开放性与动态性，强调学科合作、协同与高度融合。促进学科性与跨学科性的统一，是学科建设迎战“大学科”时代的挑战所应遵循的基本理念。

其次，学科发展依赖社会组织，在建制层面，文化个性取向的学科发展应在学院建制的同时也注重发挥“无形学院”组织形态的作用。

学科发展与社会组织之间彼此作用的关系，早为20世纪60年代科学社会学领域的研究所证实。学科发展所依赖的“科学共同体”是由正式的社会组织和非正式的社会组织所组成，这些社会组织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正式的社会组织主要是单一的学科和专业，不同学科或专业都有自己的正式交流渠道，如专业学会、专业学术期刊。在正式组织产生的影响下出现的各种研究网络或社会群体构成了非正式组织，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在成名作《小科学、大科学》中把非正式的交流群体称为“无形学院”，即从正式的学术组织中派生出来的非正式学术群体，其群体成员彼此保持不间断的接触、合作研究。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戴安娜·克兰在普赖斯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无形学院”这种社会组织形态对科学知识增长的影响，揭示了科学知识的增长和生产这些知识的具体社会组织的关系，从而指出“无形学院”的组织理念和组织形式，决定着科学知识的发展。^[11]近些年，受学科融合、跨界合作日盛的影响，“无形学院”再度为学界关注，它被认为是促进当代学科发展和知识创新的重要组织形态，其功能不断得到正视和挖掘。“无形学院”具有创造功能，如人才凝聚功能、知识互补功能、潜人才开发功能^[12]，与正式的学院建制相比，具有有效跨越学科边界的的功能^[13]等等。

科学研究呈现两大趋势：一种是高度专门化，即着力于形成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以保证科学知识的积累和增长。这种做法是相对封闭的；另一种是接受外来思想，以尊重现代科学知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的原则为前提，广泛地推动着学科之间的交叉与渗透，受这一趋势影响，科学知识呈现指数增长。对后一种趋势起到促进作用的便是无形学院。在历史上，“无形学院”不仅推动了科学活动正式化和制度化，而且作为大科学背景下科学家关系的表达方式，它对科学知识增长、提升科学的研究和科学交流效率作用显著。“无形学院”尊重互有差异的思想交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和认知的形态，具有促进学科发展、取得科学的研究前沿进步的作用。科学领域内部重叠、交叉的布局就像“鱼鳞”，由此形成诸多跨学科研究领域，而整个科学又似一个蜂房，每一个学科就是一个小室，彼此联系在一起。致力于学科创新，大学这一学术体系应具有扩展能力，即有预见性地吸收创新成果并允许其发展的能力。为此，大学就不能囿于现有的院系壁垒，阻碍跨学科研究或知识的跨学科扩散。

学科之间的区隔和边界随着学科发展到鼎盛就越来越坚固，往往已经不是学科自身的选择，而是“守门人”人为设置窠臼造成的。学科对话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支持系统，而现有的社会分工与部门形态主要以传统的学科专业化制度为基础，为此，在现阶段完全打破原有的院系建制是不现实的。“无形学院”是科学发展的产物，在大科学背景下，也是科学结构和科学家关系的一种折射，通过这一非正式社会组织形态，增进学者群体网络关系，提升科学的研究和科学交流效率，进而培养具有复杂性思维、科际整合思维与素质的人才，将是学科发展从冲突走向融合的必由之路。

注释

① 张应强教授以“文化—教育—人”为研究框架揭示了教育、文化、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并论证了教育的本质是文化与人的双向建构和教育的基本功能是文化的传承与创造这两个基本命题。参见张应强：《文化视野里的高等教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第19—33页。

参考文献

- [1] D. 保罗·谢弗. 文化引导未来[M]. 许春山, 朱邦俊,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127.
- [2] 侯立平. 文化转型与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设计的变革[D].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2013:6.
- [3] 韩民青. 文化的历程[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13.
- [4] 韩民青. 文化的历程[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2:23.
- [5] 侯立平. 文化转型与中国当今设计学学科本科教育课程设计的变革[D]. 北京:中央美术学院, 2013:236.
- [6] D. 保罗·谢弗. 文化引导未来[M]. 许春山, 朱邦俊,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130.
- [7] D. 保罗·谢弗. 文化引导未来[M]. 许春山, 朱邦俊,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131.
- [8] D. 保罗·谢弗. 文化引导未来[M]. 许春山, 朱邦俊, 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161.
- [9] 李震. 文学理论的学科性与跨学科性——对“文学理论边界”问题的一种理论回应[J]. 甘肃社会科学, 2008(5):137—141.
- [10] 托马斯·门罗. 走向科学的美学[M]. 石天曙, 滕守尧, 译. 北京: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 1984:233.
- [11] 戴安娜·克兰. 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M]. 刘珺珺, 顾昕, 王德禄, 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
- [12] 王克君. 从科学史看无形学院对科学发展的作用[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2):122—124.
- [13] 袁曦临, 刘利. 从“有形学院”到“无形学院”——高校智库建设的逻辑与组织结构模型[J]. 情报资料工作, 2019(3):6—12.

Culture Transformation and Disciplinary-Developing Orientation

Liu Yamin Xia Shisi

Abstract: Following the logic relationship of culture-education-human, to think about culture transformation's effect on development of human, and then examine the disciplinary developing orientation, which would help disciplinary construct make the most developmental decisions. Culture transformation reveals a spirit of the age shaped by the cultural characters of subjectivity, openness, creativity, diversity, integrity, correlation and relativity. The new cultural pattern is to find, to respect, and to carry forward the human's aesthetic essence,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would let people conduct their subject consciousness and emotion. Disciplinary construct based on single disciplinary-centered is determined by economic personality and experts personality,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cultivate a complete person. Nowadays, disciplinary construct should be guided by cultural personality to respect the unity of 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and strong informal social organization system according to invisible college conception in order to realize university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culture transform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well-rounded person;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一流课程建设和教学的关键在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

史仪凯

摘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和教学是高等学校一流本科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如何做好新时代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和教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一流教师队伍，一流教师要有一流的教育教学水平，而教师的一流教育教学水平则需要积极从事教育教学研究。本文简要介绍传统的课程建设与一流课程建设的内涵、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与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的关系，主要从教师的师德师风、教学理念、设计、内容和方法等方面讨论一流本科课程教学与教育教学研究的重要性。

关键词:一流本科课程；本科教学；一流人才；教育教学水平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0)01-0050-08

2018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先后就高等教育出台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围绕着贯彻党的十九大和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5月2日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和“高校只有抓住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才能办好，才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1,2]。

2018年6月21日，教育部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和《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高教〔2018〕8号）文件提出要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明确强调要淘汰“水课”，打造“金课”^[3]。2019年10月24日教育部再次提出“实施一流本科课程双万计划”，即建设国家级和省级一流课程各1万门。^[4]这些重大举措已在全国高校和广大教师中引起广泛关注，所谓的“金课”就是指一流本科课

程。培养一流人才的根本要有一流本科教育，一流本科教育的灵魂则要有一流本科课程，一流课程的核心是要有一流教师队伍，而一流教师队伍的关键在提升高校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如何结合新时代一流课程建设和教学活动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本文将从个人的教学实践和理解，谈以下几点看法，供读者参考。

一、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新内涵

一流本科教育是根本，一流课程建设是核心。课程是高校依照本科培养目标和专业培养目标，在培养方案中所设置的专业学习科目的总和，也是决定本科教学质量一流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本科生培养方案中设置的课程主要有专业通识课、学科基础课、学科前沿课、专业核心课、个性和人文素养课和综合实践课等模块。模块中的每一门课程既是本科生培养过程的细胞，也是教师和学生进行教

基金项目:陕西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攻关项目“应用型高等学校机电类专业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研究与实践”（17BG209）；西北工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基金项目“新时代‘双一流’高等学校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提升对策研究”（SKJJZ2018001）

作者简介:史仪凯，男，陕西兴平人，西北工业大学机电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级教学名师，研究方向为机械电子工程和电气工程。

学活动的基本单元。课程建设是高校教育教学质量的根本保证，也是高校推进教育教学改革的基础性工作，培养一流人才和最终实现培养目标的重要标志。课程教学是高校实现教育理念与人才培养目标的桥梁，通过教学可使学生掌握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提升学生综合素养。本科课程建设工作从未停止，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在师资队伍建设、教学理念更新、课程体系内容、教学方法手段、教材和实验室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尤其是“211工程”“985工程”和“质量工程”建设以来，先后建成了一大批国家级精品课程、精品资源共享课程、重点实验和精品教材，课程建设成果也在教学质量提升和人才培养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也取得了显著成效。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5]。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6]随着我国迈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也步入内涵式发展的快车道，本科教育要适应新时代教育教学的新形态，无疑做好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关键在于淘汰“水课”。所谓的“水课”是指含有“水分”的课。为什么会出现“水课”，究其原因：一方面，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调研和论证不够充分，使课程与专业发展现状不相符，课程教学内容陈旧，学生对课程兴趣不高，甚至不用花气力也可通过。有的课程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严重缺乏实践性环节，不利于学生能力和素养的培养，这就是培养方案设计出含“水分”课程。另一方面，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不到位，对课程内容研究理解不够，备课不愿花时间精力，视本科教学就是完成任务，严重缺乏热情和投入，课堂讲授照本（PPT）宣科，学生对教师课程教学评价不满意，这就是教师人为教出含“水分”的课程。因此，新时代重提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为传统课程建设在内容上赋予全新的内涵，除精品课程和资源共享课程外，还包括MOOC课程、SPOC课程、移动学习（Mobile Learning）课程、数字课程、在线课程建设等。这就要求本科课程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课程教学除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理论、

知识和技能外，还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教会学生通过互联网、线上线下等多种媒体获取和探究知识，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无疑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对高校教师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课程建设与教育教学水平

一流教师队伍是保障，教育教学水平是关键。新时代教育教学新形态和新理念的课程，其标准正如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提出的要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7]课程建设应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使学生通过学习能够掌握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通过课程实验和实践平台，将所学理论、知识和技能转变为必备品格和价值观念，也就是将知识、能力和素养的有机融合，以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内容要反映科技发展的前沿性和时代性，遵循教学规律和学生认知规律，适当拓宽内容难度，有利于充分调动学生的思考和探究能力。建设中尽可能将信息网络技术与教学形式融合，为学生探究知识和个性发挥留有适当空间。只有将低阶性、陈旧性的课程、教师不用心上的“水课”建设成为一流课程，方可使高校的本科教育真正回归到“以本为本”，一流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落到实处。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和教学是衡量学校办学水平与质量的重要标志，也是创建一流本科教育、一流人才培养的重要资源。无论从高校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还是从一流的本科教学，都离不开一流课程，而一流课程建设和教学首先要有一流教育教学水平的教师队伍。尽管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涉及到高校方方面面的工作，而不断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则是重要的基础和核心工作。

如何提升高校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已有不少的论述。这里想强调的是，通常大家习惯所说的“教育教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育是指影响和培养学生的思想品德、科学知识和个性素养的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活动。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引导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合作、学会做人，促使学生成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教学是指教师、学生间一种

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相互作用的共同活动，也就是整个教育的主要形式。严格讲教育不等于教学，教学的目的是教育；教育的手段是教学。教育包含着教学，教学为教育服务。通常泛指情况下可以讲或者用“教育教学”，可理解为其中既有教育之意，又有教学之意，如常说“教书育人”。由于教育是个较大的命题，其中包括着教学，而教学只是教育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如申请研究课题和成果奖的申报，还要注意根据具体情况而定。本文所提的“教育教学水平”，就是针对目前我国高等教育面临“以本为本”和“四个回归”的新时代，高校教师应很好掌握教育学理论和教学规律，不断提升教育水平和教学水平。

面对新时代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对高校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互联网+教育”已经使本科的教学形态发生了变化。课程教学以教师、教材和课堂为中心的局面被打破，倡导教师与学生情感和内容交流、批评质疑和争论争辩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形态正在形成。因而要求教师在课程建设中重点研究如何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能力。其次，“以学生发展为中心”使本科教学理念发生了变化。一流本科课程建设中可依托现代教育技术，教师需要研究的是如何结合课程建设内容进行教学资源的开发，如部分拓展内容、多媒体动画、视频等可以“二维码”形式给出，课堂教学与“中国大学MOOC”的优秀课程资源融合。这种新形态的教学模式既给师生充分互动的时间，也给学生个性发挥和探究知识足够的空间。最后，“以本为本”和“四个回归”使教师本科教学创新积极性发生了变化。这就要求教师积极开展如何培养学生自觉学习知识的内在动力、激发学生对于知识的探究精神等教育教学研究。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会对教师的教学能力有很大的提升，也会对教师的专业、教书育人和教育教学水平有很大的提升。

三、课程建设与教育教学研究

教师专业发展是底蕴，教育教学研究是先导。

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高校教师队伍和教育部提出的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意见，就是要求以一流的教师队伍建设一流本科课程，一流教师要有一流教育教学水平，而一流教育教学水平就是要求教师认真开展教育教学研究。

教育教学研究同样分教育研究和教学研究。教育研究是指在教育科学理论指导下，研究解决改革和发展问题的方法和决策，以揭示教育现象的本质特征，探索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主管部门决策和提高教育质量提供建议。而教学研究是研究教学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如教学内容、方法手段和过程管理等教育中的微观问题。主要解决课程教学中教师怎么“教”好和学生怎么“学”好的问题，如一流本科课程教学中的集体备课、课堂研讨、师生互动、探究式教学等，目的是提高课程教学质量。教育研究与教学研究两者间关系指：教育研究本身也包含教学研究，教学研究是为教育研究奠定基础。目前国内不少学者也将教育研究称为“教育科研”或“教育科学研究”^[8,9]，将教学研究称为“教学学术”^[10,11]。实质还是长期存在的重科研和轻教学的倾向未得以有效解决。如上级主管部门对高校的种种评价（评估）指标设计体系、高校对教师工作评价等将科研成果和高水平学术论文作为重要指标，高校评价教师的工作（如职称晋升）也跟着指挥棒走，促使教师将更多时间精力投入申请科研项目和撰写学术论文，而使得本科教育教学质量出现下滑。1990年美国学者博耶发现高校此问题后，提出了教学学术（scholarship of teaching）思想。^[12]所谓的教学学术就是本科教学、教学研究应与科学研究同等重要，研究成果应同等对待；高校和教师要回归本科教育，要重视本科教育和教学。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对高校本科教育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本科，“以本为本”和“四个回归”正在高校全面贯彻和落实。本文认为无论是“教育科研”，还是“教学学术”研究，都是强调要重视本科教育工作，提升本科教学质量。

高校教师的专业化是课程建设的根本保证，教师专业化主要包括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学科专业就是要求教师掌握精深学科知识和广博的学科相关

知识，具备将本学科的知识转化成自己学术造诣的能力。教师学科专业的系统知识、思维方式、科学方法与课程建设融合，依据学生的认知规律和发展诉求重构课程建设内容，引导学生懂得“学什么”和“怎么学”。教育专业要求教师掌握高等教育学、心理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等，深刻理解教育教学工作的本质和责任，了解教育教学规律和学生的认知规律，不断探究如何将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和学生的学习融合，如何将教师所掌握的学科知识和一流本科课程内容传递给学生。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互联网+教育”的快速发展，高校教育教学形态也发生很大变化，教师的角色也正在发生着变化。传统的观点认为教师角色仅是知识的传递者，忽视了教师还是知识的“研究者”这一重要的角色。不管是学科专业的学术研究，还是教育专业的教育教学研究，有许多未知领域和知识都需要教师探究。研究者是高校教师的必备角色，尤其是做好教育教学的研究者，这对于教师提高专业化水平极为重要。就拿一流本科课程建设来说，怎样将学科学术和科技发展的新成果引入课程，怎样在课程建设中将知识、能力和素质进行有机的融合，怎样将课程教学由单向知识传授转变为师生双向探讨式，怎样在课程建设和教学中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等，教师只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才可使自己从事的课程具备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因此，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研究是累积教育教学经验和成果的前提，也是从事MOOC课程、SPOC课程、移动学习课程、数字课程、在线课程建设等的前提，以及提升教师自身专业素养、专业化水平和走向成功的主要途径。

高校教师如何有效地从事教育教学研究。首先，要认识到教育教学研究的重要性。如果高校教师不从事教育和教学研究，就难以发现和很好地掌握教育教学和学生认知规律，不仅自身教育教学工作无底蕴，也就不可能培养出具有创新性思维的学生。其次，要适应新时代教育教学的新形态要求。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和“互联网+教育”的教育教学方法不断创新，以教师为主导者和决定者的知识传授模式也在随之变化，适应教育教学新形态就应具

备一定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教育教学研究成果早已被列入研究课题申请、教育教学成果奖申报的支撑基础，也被列入“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入选者的必备条件。忽视和缺乏教育教学研究者角色转换意识，这正是教育教学水平难以提升的症结所在。最后，要静下心来扎实从最基础做起。教育教学研究内涵很广、范围也很宽，有待解决的问题很多，尤其教学研究内容涉及范围也非常宽泛，如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和教学就有很多亟待研究的内容。不管从事什么题目和内容研究，要结合自己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找准切入点，研究过程中要善于总结，研究成果要有思想和实践，要以学生获得的成效来体现。所谓的从基础做起就是先从学校的教学改革课题做起，积淀到一定程度后，再申请省部级和国家级课题。但不能急功近利，不能因研究经费少而忽视和放弃研究。只要有利于提高本科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效果，有利于提高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无疑都是会得到认可的优秀教育教学研究成果。

四、课程教学与教育教学研究

做好教书育人是使命，良好师德师风是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13]“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任”^[14]。这不仅凸显党和国家对新时代一流教师队伍建设的高度重视，也凸显党和国家为新时代教师赋予的神圣职责。一流大学的目标是以一流本科教育（教学）培养一流人才，而一流本科教学离不开一流教育教学水平的教师，提升高校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必须遵循新时代教书育人规律，重视开展教育研究和教学研究，为一流本科教学工作奠定良好的基础。^[15]

（一）师德师风优良

师德师风不仅是新时代提升教师教育教学水平、提高教学质量和培养一流人才的首要任务，也是学生对教师一流课程教学评价的主要标准之一。

近年来，高校在教师选聘中严格把关，一大批具备较好的师德基础、学科专业知识功底深厚的博士、博士后和海内外高层次人才相继进入高校教师队伍，大部分教师相继通过各级教师资格认证，还有被聘为高级技术职称。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这不仅是我国新时代教育的根本任务与目标，也是高校的核心功能和立校之本。师德师风是立德树人之源，也是一名合格高校教师之魂。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要求教师要争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这是教师的师德师风的最好概括。做党和国家名副其实的“四有”好教师，无疑是高校广大教师的奋斗目标。

优良的师德师风是经过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累积而成，也是通过教学态度、人格魅力、内容熟练、方法把控、师生之间互动等具体显现出来。古人云“师者，人之模范也”。课程教学要做到深入浅出，只有对课程内容涉及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也就是教师要有精深博广的学科专业知识，否则课程建设和教学无法做到“深入”。另外，还要有较高的教育教学水平，也就是丰富的教育教学研究和经验的累积，否则在课程教学中很难做到“浅出”。不可否认，有的高校在教师招聘时，关心最多的是应聘者的学术研究水平和潜力，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忽视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这是高校高水平教师培养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高校教师怎么适应新形态和一流课程教学要求，还是首先要过好教学关，掌握课程特点、教学目标和规律，掌握学生的学习诉求、个性发展和认知规律。只有花时间和精力对这些问题研究清楚，才能不断提高教学能力和水平，使自己从一个能够完成教学任务的“教书匠”过渡到学生学习的“引导者”。作为高校教师，如果将科学研究课题和“高水平”学术论文放在首要位置，忽视或轻视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不但挤不出课程中的“水分”，还会人为地在教学中将一流课程教为“水课”^[16]。要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要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和教学做起，全身心投入一流本科教育教学，认真开展教育教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在课程教学实践中不

断增长才干，使自己成为受学生欢迎的教学名师。

（二）教学理念先进

先进的教学理念是获得教学创新和教学效果的关键，教学理念决定着教学行为。所谓的教学理念就是指教师“为何教”“教什么”和“如何教”。传统教学理念是以教师、教材和课堂为中心，而新时代一流课程的教学理念要求是：将知识、能力和素质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全面提升本科教学质量，为一流人才培养奠定基础；将课程理论知识传授与学生能力培养、情感素养、个性化发展有机融合，激发学生的学习志趣和潜能，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将课程教学与信息网络技术有机融合，充分利用网络教学优势，通过线上、线下和师生互动教学，以满足学生的学习诉求。新时代教学理念要求教师在教学中的角色由主导者和决定者转变为引导者、合作者；学生的角色由被动知识接受者转变为探究者、发现者；在教学实践中实现教师带着学生一起去探索。

教学理念也是教师对教学和学习活动内在规律的认知。陶行知先生讲的“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而在教学生学”和叶圣陶先生讲的“教是为了不教”，这正是对教师“教”和学生“学”内在规律认知的最好诠释。教学活动中教师作用重在引导和组织，就是引导学生自主地学，组织学生探究地学。学生学会学和学得好，这也正是课程教学所需要的最佳效果。适应新时代的先进教学理念，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投入的精力、探究的悟性、教学的热情和师生的探究。如何解决这一根本性问题，就需要教师在课程教学中了解学生的学习特点和规律，怎样根据不同教学内容设计不同呈现方法，培养学生如何在互动中获取和应用知识的能力。而积极从事教育教学研究，坚持教学理念创新，才是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

（三）教学设计科学

教学设计是依据教学和学生认知规律，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对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媒体、策略和反思等环节进行分析，给出具体教学活动方案的设想和计划。培养方案中的每门课程的教学目标都是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教学活动，引导学生认知

和探究知识。一流课程教学设计时要注意的是：根据课程的教学目标，针对课程教学环节要给学生建构何种认知模型，设计完整的课程教学实施方案，解决好学生“为何学”的问题；针对课程教学内容（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掌握学生在学习重点和难点内容时可能会出现什么困难和问题，教师要针对不同内容科学选择教学媒体和引导方式，以高效、简洁、合理的教学方法，满足学生的学习诉求，解决好学生“学什么”的问题；不管采用何种教学媒体和教学方法，首要的是创建教师和学生间的互动和情感交流的场景，引导学生自觉探究知识的兴趣，解决好学生“如何学”的问题。总之，一流本科课程教学设计要围绕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级思维这个中心。

教师教学活动的趋向取决于教学设计的科学性。一流课程是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课程，要求教师掌握课程各个教学环节。首先，对于课程的教学要求和大纲要心中有数。掌握课程内容（每次课教学内容）的三个层次（了解、理解、掌握）不同要求，根据内容的重难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水平，科学设计教学方式和方法，如电子教案和板书内容设计、互动内容和问题设计、课堂用时设计等。每堂课的开始和结束内容要前后呼应，有进有出。其次，对学生学习诉求要心中有数。研读精品教材和相关资料的同时，对教学内容要合理取舍和适当拓宽。只有教学内容熟练掌控，才会摒弃“照本（PPT）宣科”，做到“因生施教”和“因材施教”。科学安排学生线上线下和探究学习，但教师应事先备好预案，及时解答学生在学习中各种反馈信息。最后，要对教学活动效果的评价心中有数。重视学生和教学督导组对教学的反馈信息，不断优化教学设计。尽管不同教师有着自己的教学风格和特色、教育教学研究水平，教学设计思路和方法不尽相同。但要保证教学设计的科学性是不变的，教师教与学生学的效果具有一致性。因此，教师须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不断从教育教学研究中汲取他人的教学成果，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

（四）教学内容优化

教学内容是一流本科课程教学的核心部分，除

有教师“教什么”和“如何教”、学生“学什么”和“如何学”的内容，还有情感素养和价值观等培养的内容。课程体系决定着课程教学目标，课程教学目标决定着教学内容。^[17]符合现代科技发展、信息传播和学生认知规律的教学内容，在内容设计组织方面充分体现出基础性、先进性和应用性。一流本科课程有着明确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不仅是学生必须掌握的教学内容，也是学生后续从事科技工作的桥梁。教学内容应体现科技发展的新理论、新知识和新技术，也就是教学内容要突出前沿性和时代性，在合理增加教学难度的同时，摒弃与时代脱节的陈旧内容，扩展课程的可选择性，拓展教学深度和学生的视野，这是克服学生“不爱学”和“不用心学”的重点所在，也是激励学生学习兴趣和探究知识热情的关键所在。教学内容是教与学的一种有机融合，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有着广阔的工程应用背景。化解难教与难学的被动教学局面最好方法是突出内容的应用性，将课程理论知识与工程实践相结合，使学生有“学得好”和“学会用”的“成功”体会，又使学生感觉获取知识还有“差距”。

教学内容更新与教师的教育教学研究密切相关，教育教学研究水平直接影响着教学质量。首先，教学内容取决于课程教学目标，而不是取决于使用教材，但必须研读教材和各种教学资料。如果仅仅依赖于一本教材，教师是很难把控课程的教学内容，甚至会给学生传递被误解的信息。所谓研读就是要对教学内容进行取舍、精选和拓展。其次，教学内容既反映课程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技能，又反映科技发展最新成果，要有一定的学术性和先进性。教师在对内容的内涵探究、掌控能力、表现形式、师生互动是否得体，关键在教师的科学的研究和教学水平。最后，教学内容与教学形式密不可分，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研究选用恰当的媒体表现形式，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和寻求最佳的教学效果，提升教师的教育教学水平是最有效的途径。

（五）教学方法创新

如何提高一流本科课程的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牢牢抓住‘教’这个核心”和“紧紧抓好‘学’这个根本”^[18]。教学方法是实现一流课程教

学目标、理念、内容等的工具和手段，实际上就是为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所采用的最佳方法。教学方法的选择源于教学内容，而教学内容是一个较为复杂的体系，既涉及到专业培养和课程教学目标，又涉及课程的知识体系和内容的重难点。尤其是重难点内容选择恰当合理的教学方法，教学就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常言道“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虽然教学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方法，但教学肯定是有规律（即教学规律）可循。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和“互联网+教育”的发展，为适应教学新形态，涌现出许多创新教学方法，这些创新教学方法已远远优于所谓的传统教学方法。其实新时代课程教学模式和方法讲的都是“融合”，如传统课堂教学与在线学习融合、传统课堂与翻转课堂融合、MOOC与课堂教学融合等。在诸多有效的教学方法中教师和学生的角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宗旨还是围绕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提高课程教学效果和人才培养质量。

教学方法创新是指寻找课程教学中的更有效的方法。教学方法要求教师优化教学内容，掌握处理好教学内容与教材（教学资料），不断整合、更新和集成教学内容，将传统教学方法与信息网络技术进行有机融合，针对教学重难点内容，选择的教学方法要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所谓的“教无定法”是指教学不拘泥于某种具体方法，但并非不要方法。教师可依据个人的教学风格、教学内容和学情等选择不同的教学方法。一流课程教学新形态的思路，既要转变教师单边主义主宰下的教书本、学书本和考书本的低阶教学，又要转变教学活动与学生创新思维培养不协调的单向模式。方法创新的目的是要赋予学生更多的自主权，通过教学模式转变和信息网络技术拓展学生探究知识的时空，使课程教学变为“以教师为主导”和“以学生为主体”的活动。一流本科课程教学有着丰富的教学资源，涉及到多种媒体技术的混合使用，教师可根据教学实践和体会，课前要对现有教学资源和媒体进行消化，并进行必要的二次加工，切勿“照搬照用”，否则适得其反，严重影响教学效果。需要注意的是网络世界丰富多彩，要引导学生正确使用互联网资源，引导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和提升探究能力。

教学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这句话有两层意思。一方面，教学活动中需要教师投入足够的时间精力热情，做好教学活动的每个环节，如教学基本要求、内容精选、备课教案、学情和语言等环节。另一方面。教学活动中要求教师和学生共同学习，就是教师讲科学和学生学科学。教师在教学中要以情感人，使学生在学时感受到美在其中。教学要达到“艺术”的高度应从掌握教学技能和技巧开始，逐渐过渡到教学技艺，再达到教学艺术的终极目标。常言道：欲行万里，始于足下；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教学方法创新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作，只要坚持不懈地开展教育教学研究，总结自身的教学实践，揭示课程教学新方法和新途径，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就会在一流本科课程教学中获得优秀的教学成果。

五、结语

动力源于目标，收获源于累积，成果源于创新。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一流本科课程，形成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课程体系，教育部新提出“双万计划”，每个教师都将是课程的建设者和教学的参与者，没有旁观者。要求高校教师始终坚持以德立身、以德立教和以德施教，在自己热爱的教师岗位上不断为一流本科课程建设增光添彩，使自己所从事的课程尽快成为受学生欢迎、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一流本科课程。高校教师要充分利用学科专业水平和较高教育教学水平优势，积极投入到一流课程建设和教学活动，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在课程建设和教学实践中累积经验，不断进行教育教学研究和创新，就一定会在一流课程建设和教学活动中收获属于自己的教育教学成功。

参考文献

- [1] 张炼.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人民日报,2018-09-11(1).
- [2]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

- 出版社, 2018:6.
- [3] 陈宝生. 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教育——在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 中国教育报, 2018-06-22(1).
-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实施一流本科课程“双万计划”让本科课程优起来——教育部印发《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EB/OL]. (2019-10-31)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606/2019/tqh20191031/sfcl/201910/t20191031_406261.html.
- [5]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44-45.
- [6] 习近平.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5.
- [7] 吴岩. 建设中国“金课” [J]. 中国大学教学, 2018(12):4-9.
- [8] 周远清. 重视教育科学研究建设高等教育强国[J]. 中国高教研究, 2010(12):1-5.
- [9] 田慧生. 当前我国教育科研面临的形势和任务[J]. 教育研究, 2016(3):11-18.
- [10] 周波, 刘世民. 教学学术视域下大学教学的品性及其意蕴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6(3):11-18.
- [11] 刘华东. 试论大学的教学学术的内涵[J]. 高等教育研究, 2017(6):26-29.
- [12] Boyer E L. Scholarship Reconsidered: Priorities of the professoriate[R]. New Jersey: 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15-25.
- [13] 习近平. 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7.
- [14] 张烁.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 人民日报, 2018-09-11(1).
- [15] 史仪凯. 努力提高教学水平做一名合格的主讲教师[M]//王润孝. 春风化雨. 西安: 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1:302-311.
- [16] 李志义. “水课”与“金课”之我见[J]. 中国大学教学, 2018(12):24-29.
- [17] 崔佳, 宋耀武. “金课”的教学设计原则探究[J]. 中国高等教育, 2019(5):46-48.
- [18] 陈宝生. 办一流大学, 本科教育是根[N]. 中国青年报, 2018-11-02(3).

The Core of First-clas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Is to Improve Instructors' Teaching Skills

Shi Yikai

Abstract: The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teaching “centered on students' development” is the core element of training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key to accomplishing such a goal is to build a high-quality and professional first-class teaching staff. First-class teachers should be equipped with top teaching skills. It requires they actively and effectively engage in research on teaching. This paper briefly introduces the different concepts of traditional curriculum and first-class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latter and the promotion of instructors' teaching skills. It also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and research on teaching in terms of teachers' morality, teaching concepts, teaching designs, contents, methodology, etc.

Key words: first-class undergraduate curriculum; undergraduate teaching; first-class talents; teaching skills

丝绸之路的历史地理背景

——据作者多次讲演整理^①

葛剑雄

摘要：“丝绸之路”虽到1877年才由李希霍芬命名，实际早已存在，但并非由古代中国向外开辟，张骞通西域只是利用了现成的道路。根本原因是古代中国没有对外联系的需求，缺乏了解外界的动力。中国没有利用丝绸之路进行扩张，也没有从丝绸之路获得经济利益，更没有通过丝绸之路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一带一路”与“丝绸之路”没有直接联系和传承关系。“丝绸之路”的真实历史留给我们更多的是教训，而非经验。

关键词：丝绸之路；历史地理；教训

中图分类号：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20）01-0058-08

“一带一路”的全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无论“一带”还是“一路”，都离不开“丝绸之路”这个概念。因此，正确了解丝绸之路的历史事实，正确理解丝绸之路在中国史和世界史的地位，对于我们正确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意义至关重要。

一、李希霍芬定义的“丝绸之路”完全是由古代西亚、中亚各族各国由西向东开辟的

原始的、狭义的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提出的，指公元前2世纪形成的从中国的古都洛阳、长安连接中亚今乌孜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的交通路线。那么这条丝绸之路是谁开辟的呢？我们以前理所当然地认为，既然这条丝绸之路是从中国出发的，那当然是古代中国人开辟的。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新提法，称古代的各族各国人民共同开辟了丝绸之路。但历史事实是，这“古代各族各国人民”中是不包括古代中国或华夏各族的，

也就是说，这条交通路线完全是由西方向东方开拓的，是欧洲及西亚、中亚的各族各国人民向中国开辟的。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结论^②已经说明，中国古代的小麦、黄牛、绵羊、马、青铜都来自西亚、中亚，是距今4000年前后传入中国的。这一漫长的传播过程足以证明，从西亚经中亚进入中原地区的交通路线已经形成。而且传播的过程是由西向东的，如青铜，最先传入中国的证据发现于新疆西部，越往东时间越晚。所以这条道路只能是由西向东开拓的，其动力和需求来自西亚、中亚，而不是东方的中原地区。

我们还可以找到更多证据。在今河南安阳发现的商王后妇好墓中出土的大量玉器都是用和田青玉制作的，妇好死于3200多年前，说明当时已经有人将产于新疆和田昆仑山中的玉石运到中原，走的正是这条交通路线。妇好墓因年代明确，墓中的玉器证据确凿。商周传世的玉器基本都属和田玉，都应是沿着这条路输入中原的。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古墓中发现过约3000年

作者简介：葛剑雄，男，浙江湖州人，复旦大学资深教授，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人口史、文化史。

前的欧洲白种人的尸体，近年来在甘肃西部发现的公元前的遗骸也被鉴定出欧洲人的基因，说明当时已存在自欧洲到达今新疆东部甚至更东的交通路线。

公元前6世纪的波斯帝国已经扩展到帕米尔高原，给今天的塔吉克人留下了波斯语。公元前4世纪，来自希腊的亚历山大建立的横跨欧亚的帝国已经接近开伯尔山口，也是由西向东扩展的。他们在开拓的过程中都很重视筑路，并有很强的修建道路和维护的能力，以波斯帝国为例，修建了从帝国的四个都城通向各地的驿道。在帝国的西部，有一条从古都苏撒（Susa）直达小亚细亚以弗所城（Ephesus）的“御道”，长达两千四百公里，每二十公里设一驿站及商馆，亦有旅舍供过往客商留宿。驿站特备快马，专差传送公文，急件可逢站换骑，日夜兼程，整个路程七日到达。^[1]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的秦朝，其西部边界只到达临洮（今甘肃岷县），直到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才控制河西走廊。而在此前的公元前174年，原来处于祁连山西段的月氏人西迁至妫水（今阿姆河）流域今阿富汗、伊朗东部，乌孙人西迁至伊犁河流域今哈萨克斯坦东部和我国新疆西部^[3]，说明那时由河西走廊往西的交通路线已不止一条。大量论著的研究结论说明，在公元前2世纪前，河西走廊以西今新疆和中亚已经发生过多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存在着多条交通路线。

公元前139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就找了一位匈奴向导，不仅从长安出发到匈奴控制区，从大宛往康居、从康居往大月氏也是依靠当地的向导和现成的道路^[2]，说明匈奴人中已经有熟悉西域的交通路线、富有经验和生存能力的旅行者。值得注意的是，就是规模更大的第二次出使，张骞率领的使团也只有150人，并没有专门的筑路修路人员。第二次出使时还给150名随员各配了2匹马，携带了价值数千万上亿的丝绸和金币。有了第一次出使经验的张骞完全了解西域的交通路线和路况，才会作这样的部署。张骞第二次出使归来时，带来了一批来自西域各国的使者，此后汉武帝几乎每年都要派遣十多个使团，遍历西域各国，出现了“使者相望于道”的盛况。但在此前匈奴已经“役属”西域各国多年，连接各国间的道路显然早已存在。如汉武帝

派往大宛国都城贵山城（今乌孜别克斯坦卡散赛）去索取天马的使者，当然也是有现成的道路可循。所以，史书上记录的“张骞凿空”（张骞通西域）并不是说张骞开凿了通向西域的道路，而是他第一次出使西域带回的地理信息促使汉武帝由河西走廊的西端向西域开拓经营，他的第二次出使西域使汉武帝的意图得到实施，汉朝最终在公元前60年设置西域都护府，控制了今新疆和相邻的中亚地区，使汉朝的疆域与西域连成一片。

《汉书·西域传》记载：“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对西域都护府所属的各国，都记载了它们去阳关（今甘肃敦煌市西）、长安和都护治所的距离。对不属都护的罽宾国、乌弋山离国、安息国、大月氏国、康居国等也记载了与长安、都护治所间的距离。其中对罽宾国遥远的道路的艰险有详细的描述：“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临峥嵘不测之深，行者骑步相待，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县度。”以西汉控制西域的时间和投入的人力物力，绝无可能新筑成这样的道路系统，显然都是利用旧有，说明这些道路在此前已经存在，自然非汉人所筑。

二、为什么古代中国不可能开辟丝绸之路

有人不赞成我的观点，认为古代中国人口众多，生产能力强，公元前3世纪就筑成万里长城，秦始皇已建成连接全国各地的驰道，何至于建不成丝绸之路？至少这条道路的东段即今中国境内这部分应该是由中原往外开辟的。还有人以《山海经》《穆天子传》的内容为证，说明先秦时代中原人已掌握西方相当多的地理知识，周穆王西征还有具体路线，为什么当时不具有向外开辟道路的可能？

这些即使都是事实，时间也比由西向东的开辟要晚。何况地理知识既可自己外出了解，也可由

外人带入，或向外来人了解而得。就像昆仑山的玉石，既可以由当地人向中原输送，也可以由中原人去那里采集或购买，关键是需要有其他证据支持才能作出判断。

开辟和维护丝绸之路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长时间的持续努力，不可能出自某些人一时的好奇或兴趣。尽管有部分天然的道路可以利用，但在几千公里长度中要翻越高山、渡过河流、穿行峡谷、通过森林，还是相当艰巨的工程。古代中国固然具有开辟长距离道路的能力，却始终没有开辟丝绸之路的需要。

无论中国的先民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进入黄河中下游地区，一旦在那里定居，就获得了农业生产的最佳条件。由于黄土高原与黄土冲积形成的平原土壤疏松、天然植被稀少且容易清除，所以用简单的工具就能开发耕种。开发之初的黄土有足够的肥力，通过轮作更能持续保持较高的产量。三四千年前，黄河流域气温较高，降水充沛，利用黄河及其支流灌溉相当便利。当时黄土高原上水土流失影响轻微，大多是平坦的原地，太行山以东更是广阔的平原。^④这样的地形地貌不仅形成了成片的农业区，便于农业生产，也有利于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和延续。这片土地上生产的粮食和物资，足以供养当地的人口。在人口增加，黄河流域耕地不足时，一次次的人口南迁使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和南方的丘陵山区先后得到开发，新作物的引进和推广解决了更多人口的粮食供应，东北的开发又养活了几千万人口。^⑤直到近代，中国的5亿多人口还完全是由本土生产的粮食供养的。这块土地上生产的经济作物、能采集到的动植物、能开采的矿物，经能工巧匠生产加工，完全可以满足国家所需的武器和军用物资、行政机构日常运作所需的器具和物资，以及统治者享用的各种器物和用品。加上根本不了解外界的情况因而从未作过有实际意义的比较，古代中国人一直以为“天朝无所不有”，是天下最发达、最富裕、最文明的地方，中国“地大物博”的观念一直维持到当代。

早期黄河流域农业的开发不仅养活更多的人口，并导致农业人口更高的增长率，也加快了农业与牧业的分化。原来杂居于此的牧业人口或者转而

从事农业，或者只能迁离，农牧业的界线由此而生，农业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从事农业的夏人部族（诸夏）聚居于中原，自称为华夏。牧业区处于蒙古高原及其南部边缘、西北地区，干旱高寒，牧民逐水草而居，生存不易，一旦遭遇天灾，往往会长期南下劫掠为生。南方不少部族还处于“披发文身”“刀耕火种”或采集狩猎的阶段。东部沿海还残留着夷人的部族。因此华夏将自己周边的牧业民族和非华夏部族称之为东夷、西戎、北狄、南蛮，或者通称为夷狄、蛮夷、四夷（裔）。早在春秋时期，夷夏之间的差别已经被当作重要的原则，被称为“大防”，绝不允许混淆。孔子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只是指华夏之间，并不包括夷狄。夷狄中只有个别已经“向化”的人，即完全接受了华夏文化、完成了“由夷入夏”过程的人，才能变为华夏的一分子。自秦朝至清朝，即使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凡是还没有被正式编入户籍并由正式行政区管辖的非华夏人口，如羁縻州府、土司辖境内的部族仍被当作蛮夷。至于外国人，除了朝鲜、越南等藩属国外，更都是未开化的蛮夷，他们的地方都被当作蛮荒之地。

正因为如此，古代中国一直以“天下之中”“天朝大国”自居，缺乏了解外界的兴趣和动力，更不愿甚至不敢外出，从未出现真正意义的旅行家、考察家、探险家，个别获此称号的人其实都另有使命或目的，如张骞负有政治、军事使命，法显、宋云、玄奘是为了求法取经。与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并称为大旅行家的杜环，实际是唐朝军队的文书，公元751年随高仙芝出征石国（今乌孜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唐军意外遭遇“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怛罗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一战全军覆没，高仙芝带少数人逃回，其他数万唐军被杀被俘，杜环作为俘虏被送往阿拉伯。他得到阿拉伯人的优待，居留12年，期间还能周游列国，到过北非今埃及与埃塞俄比亚北部，之后又乘阿拉伯的船回到广州，再返回家乡长安。他将自己的经历写成《经行记》^[3]，正好他的族叔杜佑在编纂《通典》，收录了这篇文章，留下了千余字的珍贵史料。造就杜环这位大旅行家并使他的事迹得以流传的是一系列偶然因素，而不是他个人或社会

的必然条件。

所以在古代中国找不到任何开辟和维持这条丝绸之路的理由，反观欧洲及西亚、中亚各国，则其动因显而易见。如希腊境内多山，适合耕种的土地极其有限，人口增加后连水源也不足，面临地中海，附近岛屿星罗棋布，航海至北非相当方便，而从陆上扩展几无可能。正是本土资源不足，缺乏扩展余地，促使希腊在征服波斯后继续向东，要不是亚历山大英年遽逝，越过开伯尔山口是必然结果。

两河流域及以东的西亚、中亚大多是半干旱地区，有些地方更只是范围不大的绿洲，文明起源虽然很早，但天然资源并不丰富，能开发利用的土地也并不富余。这一方面促使当地政权不断向四周扩张，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商业与贸易，以便使本地的产品得到更高的利润，并获取本地稀缺的物资。小麦、绵羊、黄牛、马、青铜等都是作为有利可图的商品，才一步步传至数千公里外的中国。驱动商人们不畏艰险，长途跋涉，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是高额利润或生存的需要，而不是什么抽象的和平友好。

三、中国并没有利用丝绸之路进行扩张

这条丝绸之路形成后，给中国与外界的联系，特别是与中亚、西亚的联系提供了很大的便利。但在丝绸源源不断地输出的同时，中国并未利用这条道路进行扩张。这倒不是由于古代中国的统治者爱好和平，维护国际秩序，要知道当时人的心目中还根本没有这样的观念，而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原因，根本不需要扩张，或者认为没有必要通过扩张的方式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首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本来都是归我统治的，都是属于我的。而在还没有直接统治的地方，什么时候我需要用就用，需要去就去。而“中国”以外的地方都是蛮荒之地，那里的人还没有脱离野蛮，没有开化，与禽兽无异，这些地方怎么配成为“王土”？就是在王朝内部那些蛮夷聚居的地方，朝廷也长期不去治理，只通过羁縻机构、土司衙门管理，“因其旧俗”，让他们自生自灭。有时皇帝还会主动放弃一些土地，赏赐给藩

属国，美其名曰“守在四裔”——让四裔给我守边疆，减轻朝廷的负担。明太祖朱元璋就这样将朝鲜半岛铁岭以北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赐给了非常“恭顺”的李氏朝鲜，从此中朝之间才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其次，是否有资格成为“王土”的主要标准，是该地是否适合农业生产。否则，即使出于安全的需要一时占据，最终还是要放弃的，因为“取之无所用，弃之不足惜”。例如汉武帝打败匈奴后扩展到河西走廊，超过了秦朝的边界，因河西走廊有绿洲和水源，适合农耕，就正式设置郡县，并且大规模移民加以充实。^⑥但在汉军击败匈奴，深入漠北，据有蒙古高原，却在“封狼居胥山”（在狼居胥山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后就退回汉地，因为皇帝从来没有动过直接统治这块无用之地的念头。东汉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大破北匈奴，出塞三千余里，登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刻石纪功而还^⑦。就是在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投降，要求“内附”，宣帝却不接受，将他的地位定为“天子不臣”（“位在诸侯之上”），支持、资助他回匈奴当名副其实的单于，规定“从长城以北匈奴有之”^⑧，没有要长城以北的土地。在汉武帝开疆拓土后，除了青藏高原、蒙古高原和东北大部分地区外，其他地方几乎都已设置郡县，就是以是否适合农业生产条件为标准的。这一格局往往只有在非华夏民族入中原时才会有局部改变，直到清朝才被完全打破。

再者，中原王朝向西的扩张都是军事反击的结果，主要出于安全的考虑。从公元前60年西汉设置西域都护府开始，在玉门关、阳关（今甘肃敦煌西）以西都只设置监护性质的军事机构，原有的部族或政权只要愿意服从一般都予保留，并不干涉它们的内部事务。在这些地方，除了必要的军事屯垦外，从未进行过开发性的移民，或设置正式的行政区划。由于路途遥远，驻守成本太高，平时只派驻最低限度的军队和行政人员。一旦国力衰落或财政困难，就会主动撤退。西汉末留驻西域都护府的不过数千人，至新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西域都护李崇退保龟兹（今新疆库车），以后就完全放弃了。东汉期间西域“三通三绝”，都护府、长史府撤销了三次。中原发生战乱时，设在西域的监护机构往往名存实亡，或者听任它自生自灭。唐朝灭西

突厥后据有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但能西达咸海之滨却是一位波斯王子归降所致，所以这一全盛疆域只维持了三年。这片辽阔的疆域的实际统治者依然是当地的部族首领，只是它们的名称换成了唐朝封的羁縻都督。而在唐朝官员、诗人的心目中，“春风不度玉门关”，“西出阳关无故人”，玉门关、阳关以西是没有春天的苦寒绝境，是老朋友也找不到的异域，并非自己的家园。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朝军队东撤，吐蕃据有西域，唐朝的边界退到了陇西。丝绸之路的历史给中国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当年张骞从陇西出发开始了第一次通西域的行程，客观上导致丝绸之路的开始，差不多八百年后唐朝又退到了当年张骞的出发地。从此朝廷再也管不到新疆，直到清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才完全恢复。要说中国利用丝绸之路向西扩张，岂不是对历史的讽刺？

四、中国并没有从丝绸之路获得经济利益

李希霍芬命名丝绸之路的根据，是张骞出使西域使这条道路成为以丝绸贸易为主的商道，但从一开始张骞和汉朝就没有将丝绸当作商品。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时配备了150名随员，每人备两匹马，确实带了大量丝绸，与所带的金币合计价值达数千万至上亿^[5]。张骞为什么会带那么多丝绸呢？自然与他第一次出使西域期间获得的信息和积累的经验有关，他了解到西域没有丝绸，而且考虑到在缺乏后勤保障的条件下长途跋涉，无论是一匹马还是一个人，有效的负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只有像丝绸那样价值高、分量轻，经得起长途运输和长期储存的物品才是最合适的。

但这些丝绸完全是免费赏赐给西域各国的礼品，不仅挣不到一个铜钱，连异常高的运费也是在汉朝的国库中开支的。每年要派出十几批使团，规模大的要数百上千人，还连续多年，累积起来运往西域的丝绸固然不少，但对汉朝而言只是加快了国库的空虚。一些别有用心的投机分子却从张骞因出使而功成名就和丝绸大量出口中看到了发财的机会，纷纷报名请求出使。好大喜功又苦于找不到那

么多使者的汉武帝喜出望外，根本不考虑这些人的资质。这批货真价实的汉使从国库领走大批丝绸，到西域后却只将小部分作为赏赐礼品，大部分丝绸成了他们牟取私利的商品，客观上倒使大批丝绸提前进入西域的市场。

经过短期接触就要吸引西域各国派出使者去遥远的长安朝拜，对张骞和后继的使团来说不容易。但这又是必须完成的政治任务，所以随同使团回到长安的西域使者中很可能有一些只是精明而胆大的商人。好在汉武帝只要能感受“万国来朝”的尊荣，绝不会要求主管部门认真核对来使的身份。这批西域商人在获得丰厚的赏赐品后，肯定不会全部上缴本国的统治者，只能像那些“汉使”一样用于个人经商牟利。汉地价廉物美的丝绸更激发起他们长途经商的热情，有些人从此成为往返于汉朝和西域之间的丝绸商人。

物以稀为贵和商人逐利的客观规律，使汉朝的丝绸很快在西域向西流通，最终进入罗马。罗马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再贵再多的丝绸也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何况能进入罗马的丝绸毕竟数量有限！超高利润驱使一批商人不畏艰险，长途跋涉于这条丝绸之路，不少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后人在沿路发现的累累白骨见证了这一残酷的史实。

既然如此，作为丝绸原产地和输出地的汉朝、唐朝商人，为什么不捷足先登呢？难道他们没有商业头脑，看不到商机，不想发财吗？当然不是，连那批应召的“汉使”都在西域当上了业余商人，翻阅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更能见到一个个商业奇才。可是商人在社会上的整体地位是很低的，而且从秦始皇到汉高祖、汉武帝都将商人置于社会的底层，压制打击不遗余力。如秦朝规定商人的户口必须登记于商籍，而且子孙不得改变身份。正常征发兵役、劳役不足时，商人是仅次于罪犯的候补征发对象。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出行时不能乘车，还加征税收使他们经营困难。汉武帝将盐铁收归官营，断了一群大商人的生路，鼓励民众举报商人的财产并将部分没收的财产作为奖励（告缗），更直接掠夺商人长期积累的财富。汉朝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商人要离开本县外出经商，必须

向县官申请，将自己的“名数”移到外出人员项内，才能获得证明其合法身份的文书，以备各地关津的检查。边疆地区更是严密防范，连合法在那里服役的士兵及其家属，都必须持有记录完整的文书，以便核查。在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可见到实例，在一支木简上写着户主某某，某郡某县某里人，几岁，身高几尺几寸，（肤色）黑色，或黄黑，有的还注明“多须”；接着是妻子及子女的姓名、年龄，包括婴幼儿在内。^[6]从汉朝至唐朝，出于军事或安全的原因，在西部和北部边界都禁止本国人出境。即使是在边境安宁的阶段，也严格防范。西汉后期与匈奴和好，但在长城沿线各关隘的查禁丝毫没有放松。匈奴人很不理解，汉朝官员直截了当说明，这不是为了对付你们，而是防止我们自己的百姓偷渡^[7]。玄奘西行取经，到瓜州边境时就无法出境，他求法心切，只能冒险偷渡，要不是遇到信佛的边防长官，后果不堪设想。

《史记》中记载了两例民间的商品输出，一是张骞在大夏见到由身毒（印度）转卖过去的蜀布和邛竹杖^[8]，一是唐蒙在番禺（当时南越国都，今广州）吃到由蜀地经水路运来的枸酱。前一例显然是民间的贩运，所以官方一无所知。后一例则完全属走私，因为事后唐蒙向在长安的蜀地商人打听，对方明确告诉他：枸酱是蜀地特产，大多是由当地人偷运出去卖给夜郎人了^[9]。

古代中国的统治者一直没有对外贸易的概念，自然更没有这样的需求。因为一则天朝无所不有，无须仰赖外人；一则天下本来都是我的，即使在境外有我需要的东西，也不应该出钱去买，或用其他物资去交换，或只要让对方进贡就是了。像汉武帝听说大宛有天马（汗血马），就派使者带了黄金去要求对方进贡。黄金不是用来买天马的，而是作为对进贡的赏赐。来自外国的商人只要打着“朝贡”“进贡”的旗号，不仅通行无阻，吃喝全包，还能获得比商业利润高得多的“回赐”。因为天朝历来实行“薄来厚往”的原则，从不计较经济利益。就连外国商人购买中国商品出口，一般也免除税收。所以在这条丝绸之路上历来只有“胡商”或“商胡”，连敦煌石窟中留下的壁画也是“胡商遇盗图”。

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记录了北魏时期洛阳的商业盛况：

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自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贩客，日奔塞下。所谓尽天地之区已。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闾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柳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10]

所谓“附化之民”实际大多是来洛阳的境外客商，因为事业成功获得丰厚而定居。而那些奔走在葱岭以西直到大秦（罗马），将“天下难得之货”贩运到洛阳的，也都是“商胡贩客”。唐朝长安城中的商人几乎全属“胡商”，特别是来自费尔干纳盆地的粟特人。但迄今为止还未发现中国商人出境经商或利用这条丝绸之路外出经商的记录，在“葱岭已西，至于大秦”的范围内也没有发现中国商人曾在那里活动的证据。

五、丝绸之路为文化传播提供了有效的途径，但古代中国也未加以利用，在外界的文化大量传入中国的同时，中国几乎没有主动传播自己的文化

在信息的远距离传播途径还不存在的古代，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的传播都离不开具体的物和人，而人是其中最活跃的载体，物也是靠人传输的。既然在丝绸之路上流动活动的人基本上都来自中国以外，传播的载体也只能依赖这些人。就是汉朝、唐朝控制着丝绸之路的阶段，在玉门关、阳关以西来往的人中也只有官员、使者、将士，他们都有各自的公务，对传播文化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国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对外传播文化的目的，缺乏这方面的动力，更不会有积极性。前面已经讲过，至迟在孔子的年代，中原的诸夏已经形成了“夷夏之辨”的观念，即将周边的“夷狄”与自己（“华夏”）严格区别

开来，而“夷狄”虽也是人却没有开化，本质上与禽兽无异。所以华夏不必要、也不可能教化他们，孔子的“有教无类”是不包括他们的。只有其中主动“向化”的人才有被教化的可能，才有接受文化传播的资格。等他们完全接受了华夏文化，才能完成“由夷入夏”的转化。

这种“夷夏之辨”的观念根深蒂固，直到鸦片战争后还是如此。甚至在被迫签订的条约中已承诺不能再称“英夷”“法夷”，官方在非正式场合照旧称外国人为“夷”，民间则称之为“番鬼”“洋鬼子”。而对国内少数民族的名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下了禁令，在出版物中不许再沿用反犬旁（犭），如獐、猺等字，一律要改为人字旁的僮、僑等，进而都改为壮、瑶等。晚清的知识分子面对外国一些明显优于中国的事物，在不得不承认的同时却千方百计在中国历史上寻找根据，以证明“中国古已有之”，甚至认为这是夷人窃取中国文明的结果。我20世纪40年代出生于传统文化发达却比较开放的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镇上出过不少学贯中西的学者，出过洋、留过学、见过外国世面的人也不少，但从小依然听到过种种丑化外国人、外国文化的说法。如中国人请外国人吃汤圆，外国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国人是怎么将馅放到米粉里面去的。还说外国字为什么都是弯弯曲曲的呢？因为孔子骑着一头毛驴到外国去，毛驴拉的屎留在地上。外国人认为这是圣人留下来的，肯定有讲究，所以他们写的字就模仿驴屎的样子，是弯弯曲曲的。

既然认为境内外的蛮夷还不配接受中国文化，当然就不会主动去传播。尽管丝绸之路提供了人员来往的便利，但中国古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向外派过一位文化使者、教师，更没有在外国办过一所孔子学院。境外的汉字文化圈的基础是中国历代的藩属国，如朝鲜、越南、琉球等。日本已属外国，只是因为一批日本人诚心“向化”，主动来中国学习，才传授他们。

我们一直夸大了汉朝、唐朝的开放，凭想象将唐朝称之为最开放的时代。其实汉唐的开放是相对于其他朝代的不开放或封闭而言，唐朝并没有摆脱“夷夏之辨”的局限，不存在真正开放的机制，是

开而不放，传而不播。一方面，唐朝的大门的确开了，大明宫里出现“万国衣冠拜冕旒”的盛况，据说朝堂里突厥等外国人占了一半。长安城里也到处是胡人、胡商、胡姬，听的是胡乐，看的是胡舞，吃的是胡饼、胡瓜、胡豆、胡麻。^⑧另一方面却从来没有放本国人外出，或允许本国人出国贸易、游历、考察、学习。迄今为止能查到的屈指可数的出国记录都是出于偶然或例外，如玄奘是为了取经，且属非法闯关；杜环是怛罗斯之战中阿拉伯军队的俘虏；近年在西安一块碑文中发现的那位到过大食（阿拉伯）的墓主是奉命出使的宦官。所谓传而不播，就是只向主动来唐朝学习且被认为具备资质的人教授语言文化，从不主动对外传播。

早在公元2世纪，中国已形成成熟的造纸技术。但由于一直没有对外传播，这项重要发明并未影响丝绸之路的另一端，西方继续沿用古埃及的纸莎草纸。直到公元751年的怛罗斯之战，阿拉伯人从唐朝军队的俘虏中发现一批造纸工匠，中国的造纸术才传到阿拉伯，取代了纸莎草造纸，以后又传到欧洲。

所以不要凭想象就认为，既然有了丝绸之路，那么古代中国的文化都已经通过这一道路系统传到了沿途或另一端。事实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事物数以百计，而从中国传出去的数量很少，其中由中国主动外传的屈指可数。

现在我们应该明白，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没有直接关系，并非丝绸之路的延续或再造，而是史无前例、前无古人的伟大创新。丝绸之路出于外界的主动，中国只是被动地接受，有时甚至不愿意接受。而一带一路是出于中国的主动，只有获得外界的响应和合作才能成功。丝绸之路的利益主要为外界所得，贸易的利益主要为“胡商”所得，而“一带一路”的目标是形成利益共同体，并进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古代中国受益于由丝绸之路传入的文化，通过“一带一路”中国乐意展示自己的文化，并根据外界的意愿和需要传播自己的文化。“一带一路”为文明互鉴提供了畅通的渠道和丰富的方式，必将超越丝绸之路，使人类臻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

注释

- ① 因本文原稿为讲演稿，所以对常识性的史实和基本没有争议的学术结论不加注释。
- ② 据国务院新闻办2018年5月28日在北京发布，并参照首席专家王巍相关介绍。
- ③ 有关月氏、乌孙的迁徙，见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班固：《汉书》卷九六《西域传》，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并见相关西文论著。
- ④ 本文有关中国古代气候、植被和自然地理因素的论述，据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中国科学出版社，1982年出版。
- ⑤ 本文有关中国古代人口的增长、分布、迁移及相关因素的论述，据葛剑雄主编，葛剑雄著：《中国人口史》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葛剑雄主编，葛剑雄著：《中国移民史》第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 ⑥ 本文有关中国历代疆域变迁的论述，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1-8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1988年出版；参见葛剑雄：《中国历代疆域的变迁》，商务印书馆，1997年出版。
- ⑦ 班固：《后汉书》卷二三《窦融传附曾孙宪传》，卷八九《南匈奴传》，中华书局，1973年出版。据2017年8月14日

《澎湃新闻》的《私家历史》报道，中蒙考察队专家已在蒙古国境内发现《燕然山铭》刻石。

- ⑧ 有关此方面的论著很多。参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谢弗著，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原名《撒马尔罕的金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

参考文献

- [1] 张国刚. “丝绸之路”与中国式“全球化” [J]. 读书, 2018(12):120.
- [2]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3157-3158.
- [3] 杜环著,张一纯笺注. 经行记笺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63.
- [4]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3810.
- [5]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3168.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 居延汉简甲乙编[M]. 北京:中华书局, 1980.
- [7] 班固. 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 1973:3803.
- [8]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3166.
- [9]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 1959:2994.
- [10] 杨衡之著,范祥雍校注. 洛阳伽蓝记校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160-161.

A Discourse of the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Background of the Silk Road —— Based on the Author's Lectures

Ge Jianxiong

Abstract: Although the "Silk Road" was not named by Ferdinand Freiherr von Richthofen (1833-1905) until 1877, it had long existed prior to the designation. The "road," however, was not constructed by ancient China. Zhang Qian (164-113 BC) took the existing road on his way to various central Asian regions. Speaking metaphorically, for ancient China, the "Silk Road" was not a path to gaining economic benefits, nor an effort to expand its cultural influence. For ancient China, there was no need to establish networks with the outside world; thus, there was little interest to explore relations with other countries.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oday is by no means a recreation or a reconstruction of the traditional "Silk Road." Rather, it represents an unprecedented contribution to the progress of the world.

Key words: silk road; historical geography; experience and lessons

中餐西渐：中华饮食的美国故事

陈 勇

摘要：华人海外移民是一篇波澜壮阔的史诗。从19世纪中叶开始，数以百万计的华人远涉重洋，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从俗称“南洋”的东南亚和南亚次大陆到非洲、澳洲、欧洲及美洲新大陆，无处不见华人社区。华人海外移民，与近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及经济的重大变迁息息相关，也对国际贸易、外交关系和所在国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海外移民也是一部中餐全球化的历史。华人把中华料理传播到世界各国，而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下，中餐又衍生出众多的分支。研究中餐的拓展，也是进一步理解中国海外移民和华人社会变迁的一个关键。中餐就像是一棵参天大树，茂密的分枝布满全球，在不同地区结出大相迥异的果实，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地独特社会文化环境和华人的政治经济地位。

关键词：美国华人餐饮；美国华人移民；食品工业；唐人街

中图分类号：TS9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20)01-0066-10

美国是近代以来华人海外移民的主要移居地之一。其世界霸主及科技领先地位使之在改革开放后，仍然是华人移民的一个重要目的地。从19世纪中叶华人淘金者抵达加州以来，华人的旅美历程给美国社会文化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美国是海外中餐发展最为兴旺的国度之一，也是中餐兴起最早的西方国家。据纽约餐饮博物馆统计，现在全美国共有近5万家中餐馆。^①中餐居众多民族菜式之首。

本文概述中餐在美国170余年来的演变，并藉食品这一个崭新的视角，深入探讨美国华人移民和社会的发展历程。追溯中餐成长的轨迹，我们也可以清楚看到华人移民浪潮的不同阶段。这同时也折射出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变化，以及中美关系的冷暖。

一、中餐落户美洲

移民是各国餐饮文化国际化最重要的推手。中餐也不例外。

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黄金。在席卷全球的淘金热中，人们从世界各地争相而至。这也开启了大规模的华人移民美洲的浪潮^②，中国饮食文化也由此得以落户北美新大陆。

被华人称为旧金山的三藩市，是因淘金热而迅速兴起的三个城市之一，也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它是连接中美太平洋的世界最重要的枢纽，也是华人进入北美新大陆的最重要的口岸。这里的中国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是全美国最大的华人聚居地，被老华侨称之为“大埠”，足显其在华人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举足轻重之地位。

三藩市也是中餐在美国拓展的发源之地。华人的餐馆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早在1849年，就已经有四家华人经营的餐厅。当时的三藩市正处于飞速发展期，其人口从1848年的1000人猛增到1850年35000人。新增的人口几乎全是外来的，大多是单身的年轻男子，加上包括餐饮在内的服务业又都十分匮乏，所以光顾这些餐馆的顾客，不只有中国人，也

作者简介：陈勇，男，湖北武汉人，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UCI)终身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国际项目主任，研究方向为美国移民和种族关系、美国华人、中美经济文化关系、饮食文化。

有白人。^[1]

但是中餐不仅没有在白人中流行起来，而且不久就被主流社会所排斥。这是因为美国根深蒂固的对华人的文化偏见和种族歧视。19世纪上半叶，去到中国的美国传教士和商人，对于中国文化持有越来越强的偏见。^[2]这也表现在他们对中华饮食的看法上。

知名汉学家卫三畏1833年作为传教士抵达中国。他在其1848年题为《中国总论》一书中提到：“（来中国的西方）旅行者经常说起燕窝汤、犬火腿和炖猫肉、老鼠、蛇、蠕虫及其他稀奇古怪的食物；它们以同样奇怪的方式烹制享用，以至于人们读了这些文章，会认为这类动物在中餐里占有很大比例。”^[3]

在华美国人的偏见，对美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华人移民到了西部的加州，其饮食传统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成为嘲讽的对象。1854年，东部城市波士顿的一个刊物对中餐做了这样的描述：“加州的一家报纸刊登如下菜单：猫排，28美分；煎鼠肉，12美分；狗肉汤，12美分；烤狗肉，18美分。”^[4]

排华的种族主义，不光体现在对中餐的排斥，也成为美国政治生活和法律体制的一个部分。加州最高法院在1854年的一项判决中，将因杀害华人而被定罪的白人凶犯释放。其理由是此前的法院在审理此案时，采用了华人的证词，而加州最高法院依据加州的法律认定中国人的证词是不值得信赖的。由于这项判决，华人此后不能在任何涉及白人的案子中提供证词。1882年美国通过第一部排华法案，在10年内禁止华工来到美国，并重申华人移民不能归化成为美国公民的国籍法原则。这标志着排华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达到一个顶峰。

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大环境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19世纪后半叶很长一段时间，中餐为美国主流社会摈弃，中华餐饮文化传统被限于华人的聚居区内。

在这期间，中国城成了中华饮食文化在北美新大陆发展的落脚点和摇篮，其消费者几乎全部是华人。

被白人摒弃的中华饮食传统，对中国移民却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它从一开始就成为华人社区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早在1856年，三藩市的中国城以卖各类食物为主的杂货店就多达33家。此外，还有5家肉铺和5个餐馆。^[4]这凸显饮食业在华人的生

活和经济上的中心地位。可以说，华埠是一个十足的中华食品城。食品杂货店出售各类来自中国的食物，从大米、竹笋、陈皮到燕窝、鱼翅、鲍鱼。人们在此也能买到不同品种的茶叶。很多店家把这些中国食物卖到了远在金矿区的华工。

19世纪60年代末期，修建完第一条横跨美国的铁路后，华工奔赴美国各地建筑铁路，把中国食物带到了所到之处。1869年300华工受雇到田纳西州修铁路。在他们的要求下，铁路公司特地把66种华人需要的商品从中国城运到工地。其中有49种是与食品相关的，包括木耳、筷子、饭碗、红枣、生姜、陈皮、豆腐条和腌萝卜。^[5]这类商品，使得华工在偏僻的工地也能够享用故乡的菜肴。

生活在一个排华情绪弥漫的陌生国度，中餐不仅仅给予倍感文化孤独的中国移民情感上的慰藉，也是他们对自己华人身份和饮食传统的自豪感的宣示。在致美国总统格兰特的公开信中，华人坚定地回击对于他们饮食习惯的攻击：“有人攻击我们说我们吃米饭、鱼和蔬菜。我们的饮食的确与美国人有所不同，但是人们的饮食习俗本来就不尽相同，这是没法强迫的。”他们在信里问道：“难道中国人的饮食习惯也算得上一宗大罪吗？”^[6]

19世纪的中餐馆，服务的主要对象是华人。他们大多是矿工、农工、铁路工人、洗衣工和帮佣，生活在华人区之外，平时很难吃到中国菜。位于中国城的餐馆，就成了他们在周末或节假日时常光顾的去处。这些餐馆，不仅提供家乡的美食，而且价格低廉。一位28岁的华工在他的日记中记载他1878年12月的第3个周末去三藩市中国城的细节，他只花了10美分，就在中餐馆饱餐了一顿。^[7]

中餐馆也给华人提供了宝贵的休闲和社交的空间。19世纪美国的城市拥挤不堪，公共的空间非常有限。生活在唐人街的华人，居住环境更为恶劣。1885年三藩市的一份有关华人的调查报告在描述其居住环境时说，中国人把房子所有的空间都尽可能用来做睡觉的地方。^[8]《华盛顿邮报》报道说，当地的中餐馆也是华工聚会的场所。在中国城的餐厅里，除了吃饭，华人也打牌和玩游戏。中餐馆的这一功用，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一位华裔学者对于芝加哥为数甚多的华人洗衣工做过深入的研

究。他发现，每个星期天，他们都聚在中餐馆吃晚饭，这也使得星期天的晚餐时段成为中国城餐馆最忙碌的时段。^[9]

中华饮食和中国移民就像是一对双胞胎，密不可分而且相互依存。中华餐饮文化，随着第一批中国移民浪潮而落户美洲，其发展轨迹，一直随移民浪潮的起伏而波动。同时，它也成为中国移民的生活及华人社区的一个重心。它为生活在陌生而又充满歧视的环境下的华人，提供了一个避风的港湾。

二、中餐兴起的社会经济背景

从19世纪末开始，中餐异军突起，走出唐人街，进入各大城市的非华人社区。到了20世纪初叶，诚如熟悉美国的孙中山先生所言，“美国大小市镇，中餐馆无处不在。”^[4]长期被美国社会排斥的中餐缘何在此时流行起来呢？很多人都认为这是因为中华美食居世界之首。孙中山在其《建国方略》中写道：“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5]但这一说法完全不能解释为何中餐没从抵达美洲之初就流行起来。

很少有人会预想到中餐会在反华情绪弥漫的美国流行起来。一篇发表于1872年的文章表述了一个在白人中极具普遍性的观点：“中国人所认为的美食不可能在本国流行。相反，赞赏我们文明饮食条件的中国佬，在饮食和其他方面可能会接受我们的习俗。”^[6]

中餐的兴起不是因为它是世界美食之王，而是源于当时的美国和华人社会在社会经济上的种种重大变迁。

首先是华人人口的重新分布。1869年美国第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修建成，华人对此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7]，近2万华人参加这一铁路的修建。这一铁路的完工使得越来越多的华人从美国西部移居到东部各大城市，以逃避西部日益高涨的排华暴力，也寻找新的就业机会。这一迁徙改变了中国人的区域分布。1870年，在63199名华人居民中，有99.4%居住在美国西部各州。在194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60.4%。^[10]东部各城市的华人则逐渐增加。在芝加哥，华人人口从1880年的172人增长到19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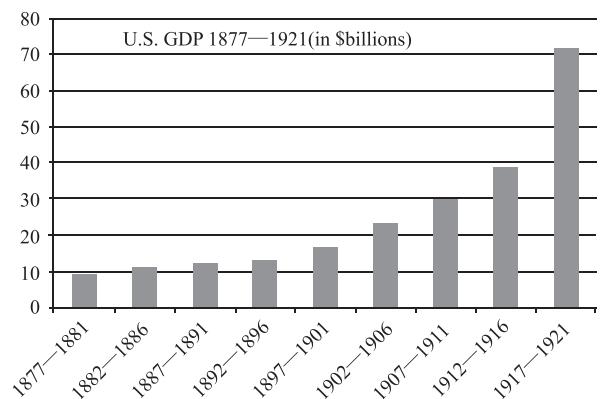
的1179人。在1920年，当地的华人总数增加到2353人。^[8]纽约的华人人口从1880年的747人增加到1900年的6321人。^[11]在1940年有将近13000华人生活在纽约，这为日后的中餐在全美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华人经历的第二个重大变化是人口的城市化。这与19世纪下半叶愈演愈烈的反华运动有着直接关联。1871年洛杉矶发生反华暴乱，19位华人丧生于暴徒之手，这标志着席卷整个西部的排华暴力的升级。在以后的10年内，反华运动单是在西北太平洋地区就摧毁了大约200个唐人街，并驱逐了当地的华人居民。^[12]这些华人大多移居到都市里的中国城。1880年，居住在人口为100000人以上的城市中的华人仅占华人总数的21.6%，这一比例到1940年上升到71%。

与此同时，华人的职业分布也发生巨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反华势力不光把华人驱逐出了农村和矿区，也将华人赶出采矿和制造业等多种行业。如何开辟就业机会，就成为华人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快速发展的餐饮业，是为数极少的华人能进入的行业之一。^[9]餐饮是一个劳动强度极高，利润菲薄，而且社会地位低下的行业，很多白人不屑为之。但对日渐城市化的华人而言，需求剧增的餐饮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谋生机会。

对餐饮业需求的高增长动力来自从19世纪末开始的美国经济迅速扩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与20世纪末以来中国发生的经济奇迹类似，在19世纪的最后30年中，美国制造业以每年约8.7%的速度增长，经济以约7.4%的速度增长。^[10]下图显示了1877年至1921年美国的GDP以四年为间隔的增长。

表1 美国1877—1921年GDP统计表



在一战期间，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最大债权国和最大出口国。^[13]人均GDP从1870年到1900年间增加了近67%；10年后，又增加21%以上。^[10]生活水平提高了，随之而来的就是对餐饮业的需求日益增长。同时，美国人休闲支出也大幅增加，于是旅游业应运而生。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康纳尔在其对美国旅游业史的经典之作中，指出20世纪初是美国人国际旅游发展的一个重大转折点。^[14]中产阶级和中下层人士，却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和时间来满足其周游列国的愿望。于是，在城市内的具有异国情调的移民聚居地就成为旅游业的一个大热点。在美国各大都市里最具有异国情调的，莫过于中国城了。

中国城成为极具吸引力的旅游热点，也因为其在白人心目中的形象大有转变。19世纪80年代前，纽约的白人把中国城看成是一个充满危险的“禁地”。在旧金山，偶尔造访唐人街的白人，会要求警察随行以确保其人身安全。^[15]但1882年国会通过一部排华法案后，美国基本上关闭了中国的移民之门，华人不仅数量开始大幅下降，同时也日渐被迫聚集到几个大都市的中国城里。于是，华人不再被视为威胁，中国城也不再是白人眼中的危险之地。到了20世纪初，中国城被主流社会看成是中国文化的标本：不光具有异国情调，也可以让白人游客看到作为低劣民族的中国人所具有的诸如嫖娼、吸毒等种种劣根性。《纽约时报》说，到中国城做游客会得到一种“我比你更圣洁”的感受。

基于以上原因，从纽约和芝加哥到圣路易斯和洛杉矶，美国各大城市在20世纪初几乎同时兴起了中国城游的热潮。不少白人导游以此为业，组织起一个又一个的旅行团来到华人的聚居地。在中国城里游玩的白人游客也发现并品尝了中餐。早在1888年纽约一位记者就得出结论：“在唐人街所有的去处中，最有趣的是餐馆。”

中国城作为旅游热点的兴旺，无疑对于提升美国人对于中华料理的了解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华埠的餐饮业者，也由此积累了与非华人顾客打交道的经验。但是，华埠游并没有发展到足以把中餐变成一个巨大行业的地步。中产阶级的游客，只是周末才有闲暇来唐人街散心，他们更不会一有时间就往中国城跑。而且中国城自身的空间也十分有限，难

以容纳很多人。

中餐馆兴起更重要的原因是日益高涨的对于餐饮业的需求。中餐馆从业者意识到他们不可能只驻足在中国城来满足这一需求，于是他们便走出华人社区，打造出俗称“美式中餐”的餐饮。

中餐的兴起，一方面印证了华人在美国所遭受的歧视和磨难。同时，也发展出一个系统性极强的菜式，并把它推广到美国各地，乃是餐饮史上一个传奇的故事。这也是华人餐饮业者所完成的一项“不可能的使命”。因为他们需要克服巨大的困难：

1.美国社会对于中华文化，乃至中餐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

2.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多数的华人都是第一代移民，对于美国的语言和文化的了解都有限；

3.由于种种反华的法律，华人在政治上被严重边缘化，毫无话语权；

4.绝大多数华人并没有开餐馆甚至烹饪的经验；

5.华人餐馆几乎全是个体家庭的，很少有横向的相互联系，更没有像行业协会这类机构来提供专业上的支持；

6.华人是一个人口非常小的族裔。在1890年，华人人口也只有10万7000来人；10年后，下降到不到9万人。到了1920年，全美国只有不到6万2000华人。

中餐能够战胜上述困难，无疑是华人不畏艰辛的奋斗精神的结果，也是因为在快速发展的餐饮里成功打造并推广了一个新颖的餐饮：美式中餐。

三、美式中餐

中餐在美国的流行，标志着在美国的中华餐饮之两分化。在华人居住区，除了廉价便捷的菜式外，以华人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高档中餐馆依然存在。由于20世纪70年代前，华人社会绝大多数是广东人，其标志性菜肴乃是粤菜中诸如鲍鱼、燕窝、鱼翅等珍品。但针对白人顾客，华人餐饮从业者则打造出一套不同的菜式。

在其理念和经营实践中，他们把中餐分为服务于华人的传统中餐和给美国人吃的“美式中餐”。这在中餐馆的菜单上得到充分体现。20世纪上半叶巴尔的摩市有一家名为顶好的中国餐馆。老板是

1922年从珠三角来到美国的移民，他把菜单分作两部分，左边是他称为“美式中餐”的菜肴：菜名全是英文；右边是“中国菜”，菜名同时用英文和中文标出。为了招徕非华人客人，就连中国城里的中餐馆也纷纷推出美式中餐。位于纽约市Mott Street 65号的一家名为叙宴的餐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3]

这家餐馆里的中餐也被分作两大类，包括鱼翅和白菜汤这样的传统中餐被称为“地道的中国菜”——也就是“与您在中国时可以品尝到的菜肴一样的菜式”；第二类就是人们所称的美式中餐。^[14]

美式中餐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把简易的菜肴精简为几大类。经过时间和市场的筛选，美式中餐的菜肴主要有三大类：炒面、杂碎和芙蓉蛋。前面提到的叙宴有17种不同的炒面、12个杂碎类的菜和6个被称为芙蓉蛋的菜。每一类，也都代表了一种烹制方法。比如杂碎就是炒菜——主打一种肉类（比如鸡肉、牛肉或猪肉）再加上青菜或豆芽。这大大简化了烹饪的过程。同时，这也使得这些菜肴更容易为非华人顾客所记住，成为美式中餐在市场营销上的一大成功。

便利是美式中餐的另一个特点。中国餐馆营业时间都很长。例如，20世纪初费城中餐馆的营业时间从早上11点左右，直到第二天凌晨2点，甚至4点^[15]，圣诞节等重要节日也不例外。此外，中国餐馆的广告也常常强调他们服务的迅捷。早在1894年，德州韦科市的一家中餐厅的广告说，它有专家中国厨师和便宜的膳食，而且上菜迅速是其“专长”。^[16]

廉价是美式中餐最基本的特质。华人餐饮业者很早就以此来吸引顾客注意。1887年，位于运河街附近的桑树街（Mulberry Street）的一家生意兴隆的中餐厅引起了《纽约论坛报》记者的注意。记者写道：“最吸引人的标志是：‘一顿美味的晚餐8美分’。”他继续说：“这足以吸引记者到这个地方。”价格低廉，也成为这类顾客对中餐馆的一项基本要求。中国餐馆老板们知道，甚至感叹说：“客人们很重视价格，并总是设法以10美分的价格就吃一餐。”

中餐馆的饭菜价钱低廉也表现在其“分量实在”。在1890年费城的中国餐馆里，一碗汤面加上

茶只需花10美分，而且面碗很大。《圣迪亚哥联合报》在1904年的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杂碎店在大多数美国城市越来越受欢迎，“菜的分量都很实在”，而且“大多数菜肴都很便宜”。位于三藩市市场街的老龙中餐厅在其菜单中特意提醒顾客每一份菜都“足够三人享用”。

正如安德鲁·P.哈利（Andrew P. Haley）所指出的，把餐饮作为一种休闲的娱乐，长久以来一直是上层社会的特权。^[17]吃饭不用自己动手，的确不是社会大众都能办得到的事。直到19世纪70年代后期，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才渐渐开始光顾餐厅。免去了厨房炊烟之熏烤，他们也能像贵族一样享受进餐时的轻松和乐趣。

中餐的一个重大贡献在于它把出外就餐这曾为上层社会独享的特权，扩展到下层民众。非裔美国人长期处于社会底层。20世纪初，他们时常光顾纽约华盛顿特区和堪萨斯城等各大城市的中餐馆。同样，在圣路易斯市，非裔美国人也是位于霍普谷的中餐馆的“常客”。^[18]在21世纪初，圣路易斯市的非裔聚居区，依然有40到50家传统中餐馆。同样，在底特律的非裔社区现在仍然能看到大量的中餐馆。这些非裔社区的中餐馆依然出售曾经风靡全美的“杂碎”，顽强地为一段被人逐渐遗忘的历史作见证。

如果说非裔美国人和中餐曾经的密切关系正日渐被淡忘的话，美国犹太人与中餐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亲密接触，则越来越多地为人了解。

20多年前，我的一个美国犹太人好友和家人去欧洲度假，到欧洲不久之后，他的一个儿子就想回南加州了，因为他怀念那里的中国菜。这个故事揭示了美国文化认同和美国中餐含义的变化。它也使我们想起了中国食物和美国犹太人之间源远流长的联系。从19世纪末开始，欧洲的犹太人大规模移民到美国。从1880年到1920年，有200万犹太人离开了东欧国家，其中多达90%的人来到了美国。^[19]他们中的许多人住在纽约，那里的犹太人口从1880年的80000人增加到1910年的1250000人，占该市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20]到了19世纪末，许多犹太家庭已成为中餐馆的固定客人。1899年，纽约的《美国希伯来语》杂志警告说，中国餐馆里的食物并不像它

们所声称的那样洁净。但是犹太人对于中餐的钟爱仍继续增长。1928年，一份意第绪报纸在纽约发表文章，将这种趋势描述为“杂碎鱼和吉菲特鱼（传统犹太人食物）之间的战争”。^[21]但赢得这场战争的是犹太中餐爱好者。他们到今天都一直保持着，使之成为美国犹太人的重要传统。

中餐馆受到非裔青睐，因为这是为数不多的非裔能进去的公共场所之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以前，美国的餐馆等公共场所普遍都存在非常强烈的种族歧视，很多地方公开宣布不欢迎少数民族。针对这种偏见，纽约于1895年成为颁布《民权法》的首批州之一，以保护少数民族进入“客栈、饭店、旅馆、食堂”等地方的权益。该法律特别针对那些拒绝给犹太人和非裔美国人提供服务的旅馆和饭店。但这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因为直到该法1913年修订之前，它规定被歧视的受害者必须在法庭上出示受到伤害的证据。

虽然犹太人的境遇比黑人要好得多，但也遭到类似的歧视，这是他们愿意光顾中餐馆的原因之一。犹太人爱上中餐，也还有其他历史原因。犹太移民在欧洲饱受歧视，很少人把东欧国家视为母国。所以，他们来到美国，就是打造一个新的家园。要变成美国人，而且要加入中产阶级的行列。在犹太移民的眼中，中餐馆所代表的是美国文化，到中餐馆消费、享受有人把饭菜端上餐桌的服务，是进入美国中产阶级的一个标志。当时，还有其他的餐馆。犹太人云集的纽约，就有很多意大利人开的餐馆。但是，这些餐馆当时多位于意大利人的社区。意大利人信奉天主教，在其餐厅的装饰上也得到充分体现。这使之与犹太人的信仰和习俗格格不入。而在中餐馆里，犹太人不仅不会因为他们的宗教文化被视为异端，而且还可以得到被尊为美国人感觉。

食品史学者理查德·皮尔斯伯里（Richard Pillsbury）将二战后兴起的美式快餐视为美国第一个高度商业化的外食餐饮。^[22]但是这个“桂冠”当属于美式中餐。它是在美国范围内最早、最持久的以大众消费为目标的高度商业化的餐饮，战后美国快餐的基本特点是廉价、便捷和商业化。我们已经看到，这些特点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被中餐开拓

出来。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一个名叫“食客”（diner）的廉价便捷美式餐厅。刚开始也跟中餐馆一样是独立运营的。^[23]在20世纪40年代盛行期间，它在全国有多达6000个店铺。但它们基本上还是一个区域性现象，集中在东北地区。而中国餐馆则从东岸到西岸遍及全国。在20世纪70年代，“食客”的店面数量开始下降，而中餐馆却继续增长，与美式快餐并驾齐驱，甚至使麦当劳的数量黯然失色。

四、1965年后移民和中餐的变化

20世纪下半叶，随着大批华人移民进入美国，华人社会和中餐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变化的开端乃是美国1965年的移民和归化法。它标志着美国移民政策的重大转折。此前国会在1924年通过的移民法，设立了充满族裔歧视的配额制度——此配额被定为1890年各族裔在美国人数的2%。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限制从19世纪末开始的非盎格鲁—撒克逊的东欧和南欧移民。虽然排华法案早在1943年已被废除。但由于华人的基数很小，配额制也继续限制了华人移民数量。1965年的移民改革法案废除了这一配额制，以平等的原则对待世界各国。此后，欧洲移民在美国移民总数的比例大减，包括华人在内的非白人成为移民的主力。

按照1965年移民法的规定，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得到一年2万移民签证的配额。中国大陆和美国恢复外交关系后，中国大陆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得到2万移民配额。1965年后从台湾来的大量移民和20世纪80年代开始从中国大陆来的移民，给美国华人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华人人口大幅增加，到1970年达到431538人。10年以后，几乎又增加一倍，达到812178人。美国华人总数在2010年已有400万左右；到2015年，华人总数已近500万人。华人人口的增长主要因素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幅度增大。1980年有29万多人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10年后，中国移民总数几乎扩大一倍，达到近54万人。到2015年，华人中有210万是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1965后的华人移民来自各地，他们把广东以外各地多姿多彩的地方餐饮文化介绍到美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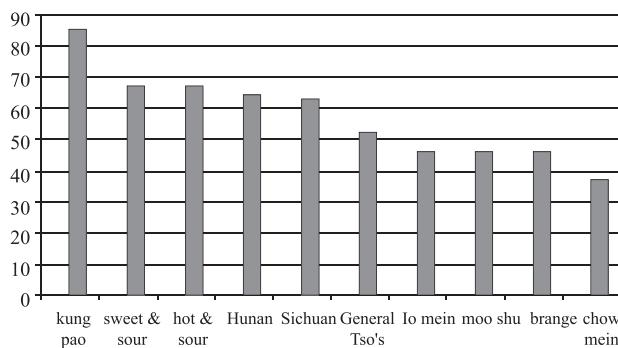
中餐的发展也与中美关系的变迁有着直接而密

切的关联。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关系的新时代。正如诸多记者和学者们都曾提到过的，^⑯尼克松在中国的宴会上使用筷子吃中国菜的画面，经电视在全国转播，家喻户晓，大大增强了美国公众对中国菜的兴趣。湘菜和川菜等地方中餐开始在美国流行起来。20世纪70年代，共有120种新的有关中国菜烹饪的食谱出版。

到21世纪初，美国中餐馆的菜式也发生变化。“宫保”成为中餐的十大热门菜名之首。其他菜名包括“甜酸”“湖南”“四川”“左宗”“捞面”“木须”“橙（陈）皮”。过去的三大中国菜之一的炒面，只排到第十。曾经作为中餐代名词、风靡全美的杂碎，则已经从大多数中餐馆的菜单上消失了。

在20世纪70年代，来自台湾的华人移民最先把广东以外的地方菜带到美国。这是因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是1949年从大陆移居到台湾的。当他们去到台湾时，大陆各地的地方菜也大举进入台湾。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不同地方菜系在台湾互相影响、交融，又产生了新的菜肴。如今风靡美国的左宗棠鸡就可以溯源1949年后的台湾餐饮发展。著名的台湾牛肉面是在眷村诞生的，日后也随移民来到美国。

表2 十大热门菜名：它们所出现的餐馆数量



从19世纪中叶开始，大批中国移民去到世界各地。在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发展出新型的中餐。在印度，中餐与当地传统餐饮融合，成为印度中餐（Indo-Chinese）。从1850到1874年约10万华工去了秘鲁，到了20世纪20年代，他们发展出如今名扬四海的“秘鲁中餐”（chifa）。这些华人在海外打造出来的新型中餐也都随着移民浪潮来到美国，大大增加了中餐的多样性。

五、21世纪的中餐

从20世纪末开始的中国经济起飞，改变了中国移民的结构，从而也对中餐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19世纪华人来美国，多数是为了打工挣钱。1965年以后的华人移民，人数大增，而且其地域渊源不再只局限于广东，更充分地展现出中国文化，包括食品文化的多样性。但由于美国在经济上的绝对领先地位以及文化上的差异，餐饮业仍然是华人移民谋生的重要途径。中餐馆的主要客源仍然非华人群体。所以，调整中餐菜式以适应美国人口味依然是华人餐饮从业者的一个重要经营策略。

然而随着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提升，新移民不仅人数继续增加，而且包括了更多家境殷实的人士。2015年美国投资移民的申请者中，百分之九十是来自中国大陆。移民趋势的新变化，直接反映到21世纪美国的中餐行业。

首先，新开的中餐馆，越来越多地提供地道的中餐。这是因为日益壮大的华人社区，承载中华餐饮业的能力越来越大。同时，这也是因为非华人的美国人对于中餐的了解进一步深入，很多开在非华人区的餐馆，也不再力图迎合美国人的口味。纽约市的“西安名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最初是位于纽约法拉盛华人区的黄金市场里的一家不起眼的小店。到2015年初，就变成了一个在全市有10个店面的餐饮集团。2019年夏天，笔者去到了它在曼哈顿中城的店铺，其装饰朴实，完全没有了以往业主为了吸引白人顾客而特意打造出的“神秘的东方”之气氛。一次性的餐具和简朴的食物，都跟在西安小吃摊上遇见的没有区别。但它却令安东尼·布尔丹（Anthony Bourdain）和安德鲁·伊门（Andrew Zimmern）这样的美国美食界大咖赞不绝口。^⑯

位于西海岸南加州洛杉矶县天普市（Temple City）那家小馆，是其北京总店开到美国的分号。它打出皇坛子这样的招牌菜，根本没有一丝要把中餐美国化的意思。2019年，当米其林指南重回阔别近10年的南加州，那家小馆获得了最高荣誉的三颗星。长期被视为廉价便利的中餐，开始得到作为高级美食的认可。这是中餐发展第二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2019年纽约时报记者阿米莉亚·尼伦伯格（Amelia Nierenberg）联系我，她要讨论的话题是近年来中餐馆数量下降。这也是我在中部一些城市已经开始注意到的现象。她和另一位记者在2019年12月发表的文章里，把主要原因归结于第二代华人社会地位的上升。第一代移民开的餐馆后继无人，这是一个很多移民群体都经历过的一个普遍现象。中餐馆是移民谋生的一个重要环节，多数是以家庭为核心的个体户。这类餐厅从业者，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而且很少有休息日。所以第二代华裔很多不愿再继承其父辈的餐饮业，而选择高科技和牙医等行业。此外，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中，越来越多的人不再需要靠中餐厅，尤其是美式中餐馆来维生。

中餐在美国170多年的发展史，是华人移民史上一个重要的篇章，它也印证了美国华人所遭受的种种艰辛和他们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中餐的变迁，也是美国经济发展及其生活方式和种族关系的演变的一部分。中餐在美国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中国经济的状况及中美关系的走向。

注释

① 参见该博物馆题为“炒：美国中餐馆的发展”的展览。Museum of Food and Drink, “Chow: The Making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Restaurant,” https://www.mofad.org/chowexhibition?_ga=2.106805450.835194295.1570600177-1041526256.1569912088. 作者为该展的学术顾问。

② 在19世纪中叶前，已经有中国人移居美国。1847年一位名叫阿苏(音译，其英文名为Ah Sue)的中国人在纽约市开起一家商店，贩卖烟草和糖果。参见John Kuo Wei Tchen, *New York before Chinatown: Orientalism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Culture, 1776–1882*,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82. 但这些早年开拓者，为数不多，也并没有形成长久和大规模的社区。

③ 参见Stuart C. Miller, *The American Trader's Image of China, 1785–1840*,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36, No. 4 Nov. 1967, pp. 375–395.

④ 参见孙文著：《建国方略》中的《孙文学说》部分，此书问世于1918年。他最后一次到美国是1911年。

⑤ 同上。

⑥ Alexander Young, *Chinese Food and Cookery*, Appleton's Journal of Literature, Science and Art, Vol. 8, No. 181, September 14, 1872:293. “中国佬”一词是当时美国社会广为使用的对华人的蔑称，当时很多美国人也认为华人没有接受美国文化的能力和意愿。

⑦ 华人铁路工人的历史长期以来被人忽视。近年来，斯坦福大学教授Gordon Chang 和Shelley Fisher Fishkin发起并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研究华人铁路工人的团队（本人也在其中）<https://web.stanford.edu/group/chineserailroad/cgi-bin/website/people/>，经过多年努力，取得卓越成果。参见：<https://www.history.com/news/transcontinental-railroad-chinese-immigrants> 及Gordon Chang的新作，*The Chinese and the Iron Road: Building the 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⑧ Tracy Steffes, “Chinese” in Chicago Historical Society, *Encyclopedia of Chicago*. 也可参见 Huping Ling, *Chinese Chicago: Rac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and Community Since 1870*,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50.

⑨ 到1940年，洗衣业和餐饮业成为华人就业最重要的两个行业。

⑩ Carlos Sabillon, *On the Causes of Economic Growth: The Lessons of History*, Algora Publishing, 2008.

⑪ Robin Archer, *Why Is There No Labor Party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25. For personal income increase, also see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Economic Analysis and United States Bureau of the Census, *Long Term Economic Growth,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3.

⑫ Iza Duffus Hardy, *Between Two Oceans*, Hurst and Blackett, 1884, 154. Also see J. W. Buel, *Metropolitan Life Unveiled*, Dan. Linahan & Co., 1882, p. 276. 而事实上，鲜有白人在中国城遇到暴力事件。即使在血腥的华人之间的堂斗期间，从未有白人成为受害者。

⑬ 它可能来自20世纪40年代或20世纪50年代初期。就格式和内容而言，它与1939年纽约著名中餐馆Ruby Foo的菜单非常相似。它的食品价格仅比Ruby Foo的食品价格略高。

- [14] 到了20世纪后半叶，很多餐厅印制有两份不同的菜单，其中一份全部是中文，上面的“地道”中餐是专门用来给华人顾客享用的。
- [15] 参见Andrew Coe, *Chop Su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38–9.
- [16] 这也并非一条平坦或甚至一定成功之路。就在此文杀青之际，传来纽约市开业才两年的大董烤鸭店倒闭的消息。Tanay Warerka, Zero-Star Roast Duck Clunker DaDong Closes After Bankruptcy Filing, *Eater*; January 9, 2020. <https://ny.eater.com/2020/1/9/21058588/dadong-nyc-peking-duck-roast-restuarant-closed-beijing-china>. 在国外烹制“地道”的中国菜，不一定总是能够找到所需的地道食材。在北京受追捧的菜式，不一定能在异地复制成功。纽约的大董在刚开张之际，门庭若市，一位难求。但其菜肴的质量很快就为众人所诟病。这也提醒我们在保持中餐的“地道”特色的同时，也要持有一颗谦卑和兢兢业业的心。

参考文献

- [1] Bayard Taylor. *Eldorado* [M].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894, 117 and 165.
- [2] S. Wells Williams. *The Middle Kingdom: A Survey of the Geography, Government, Literature, Social Life, Arts, and History* [M].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rp., 1966, Vol. 1, p. 771.
- [3] Wayside [N]. Gleason's Pictorial Drawing – Room Companion. Vol. 6, No. 3, January 21, 1854, :p. 47.
- [4] The Oriental, May 11, 1856.
- [5] The Memphis Daily Appeal. December 31, 1869.
- [6] An Open Letter of The Chinese to the President [M]// in Frank Moore, ed., *Record of the Year* 1, no. 6, June 1876, 601.
- [7] Ah Quin's diary entries for December 12 and 18, 1878.
- [8] Willard B. Farwell and San Francisco Board of Supervisors. *The Chinese at Home and Aboard* [M]. San Francisco: A. L. Bancroft, 1885.
- [9] Paul Siu. *The Chinese Laundryman: A Study of Social Isolation* [M].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8, 145.
- [10] 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Chinese and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 [M].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2, p. 73.
- [11] Xinyang Wang. *Surviving the City: The Chinese Immigrant Experience in New York City, 1890–1970* [M].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p. 136.
- [12] Jean Pfaelzer. *Driven Out*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7, 253.
- [13] Michael Lind. *Land of Promise: An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M].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2012, 263.
- [14] Dean MacCannell. *The Tourist: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M].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76, p. 5.
- [15] Tê-chao Chêng. *Acculturation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A Philadelphia Study* [M]. Foochow(Fuzhou)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Press, 1948, 96.
- [16] The Waco Evening News, April 12, 1894, 8.
- [17] Andrew Haley. *Turning the Tables: Restaurants and the Rise of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 1880–1920* [M].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1, 12.
- [18] Hop Alley. *The St. Louis Republic*, January 29, 1905, Part II.
- [19] Ruth Gay. *Unfinished People: Eastern European Jews Encounter America* [M].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1, 3.
- [20]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Moynihan. *Beyond the Melting Pot* [M]. Cambridge, Mass. :M. I. T. Press, 1992, 138–139.
- [21] Hasia Diner. *Hungering for America* [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5–206.
- [22] Richard Pillsbury. *No Foreign Food* [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8, p. 176.
- [23] For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s of the American diner [M]// see Richard J. S. Gutman, *American Diner Then and Now*,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0.

The Spread of Chinese Food to the West: Story of Chinese Catering in US

Chen Yong

Abstract: Overseas Chinese immigration is a magnificent epic.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millions of Chinese have travelled across the ocean and traveled all over the world. From the Southeast Asian and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s commonly known as the "Southern Ocean" to Africa, Australia, Europe and the America, Chinese communities are everywhere. Overseas Chinese immigra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major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modern China. It has als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trade, diplomatic relation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ost country. At the same time, overseas migration is also a history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food. The Chinese spread Chinese cuisine to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in different cultural environments, Chinese cuisine has spawned many branches. Studying the expansion of Chinese food is also a key to further understanding Chinese overseas immigrants and the social changes of the Chinese. Chinese food is like a towering tree with dense branches spreading all over the world. Very different fruits are produced in different regions. This largely reflects the unique social and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each place an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of the Chinese.

Key words: chinese american food; chinese immigration to america; food industry; chinatown

布雷蒙的叙事逻辑理论

张新木

摘要: 法国学者布雷蒙早年提出了“叙事可能之逻辑”的理念,后又发展为“叙事的逻辑”,认为文学作品由基本序列复合而成,借助镶嵌、并列、连接等方式展现情景的出现、采取的行动及达到的结果。叙事逻辑将叙事的基本序列确定为“可能、过程、结果”等三个功能,对应于故事中事物变化过程的三个必经阶段。该叙事逻辑理论具有相当的开创性,为考察文学文本提供了新的视角。对作品《往事烟云》的分析证明,这一理论基本反映了文学作品的普通叙事逻辑。

关键词: 布雷蒙; 叙事逻辑; 《往事烟云》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2020)01-0076-07

法国学者克洛德·布雷蒙(Claude Bremond)于1966年提出了“叙事可能之逻辑”的理念,认为文学作品是由一些基本序列(séquence)复合而成,通过镶嵌、并列、连接等方式,展现了情景的出现、应采取的行动及达到的结果。这种叙事的形式结构,折射出从欲望产生到付诸行动再到结果实现的各种可能性,归纳出叙事的内在逻辑^[1]。而到了1973年,他进一步发展了该理念,将其提炼为“叙事的逻辑”(Logique du récit),将叙事的基本序列归纳为“可能、过程、结果”等三个功能,对应于故事中事物变化过程的三个必经阶段。即某事物具备了发生的“可能”,主体可以采取行动,也可以不采取行动。若选择了行动,则有可能实现“结果”,谓之“成功”,形成由可能变成现实的“过程”;但主体选择行动后,也有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结果”,谓之“失败”,形成由可能没变成现实的“过程”;这就是叙事的基本逻辑^[2]。本文将对布雷蒙的观点进行梳理归纳,并通过法国当代作家庞克拉西的《往事烟云》进行分析对照,展示其理论的合理性及局限。

一、叙述角色与行动逻辑

布雷蒙在其理论著作《叙事逻辑》中对文学作品的叙事逻辑进行了深入探索。他借鉴普洛普对民间故事进行的功能研究^[2],试图将其应用于其他叙述文本。结果他发现,文学作品中除了虚构故事的情节外,还存在一种“叙述信息”(message narratif),它由辅助讲述故事的叙述符号组成:“叙事……只有在叙事技术的中继条件下才能达到交际。这种技术使用一套特有的符号系统,即叙事的能指要素成为承担叙事要素的技术能指”,布雷蒙称之为叙述元(racontant)^[3]。这些叙述元主要包括叙述角色(rôle narratifs)、叙述可能(possibles narratifs)和叙述句法(liens syntaxiques),分别对应于叙事的行动逻辑、叙述可能逻辑和句法逻辑,形成文学作品的主要叙事逻辑。

根据布雷蒙的分析,叙述角色主要有以下五种。一是施动者(agent),即故事中的行动主体,通常由主人公来承担,他的行动是改变人物状态的主要动因。施动者有时也由次要人物来承担。二是

作者简介: 张新木,男,江苏高淳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二级教授,文科学术委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为语言学、符号学、法国学。

受动者（patient），即故事中行动的承受对象，他的状态受到施动者行动的影响，并且发生改变，受动者一般由次要人物承担。不过次要人物的行动有时也作用于主要人物，因此也可充当次要行动的施动者。三是影响者（influenceur），它可能是人，也可能是物，其作用是影响行动者作出改善或恶化的决定，影响者有四对：告知者和隐匿者、诱惑者和威胁者、强迫者与禁止者、建议者和劝阻者。四是改善者（améliorateur）或恶化者（dégradateur）。五是获益者（acquéreur）或补偿者（retributeur）^[4]。对照上述叙述角色，我们分别观察到庞克拉西的《往事烟云》中这些角色的存在，以及它们在情节安排、角色组合和视角分配等方面的部署。可以看出，布雷蒙的叙事逻辑在该作品中得到很好的体现。

《往事烟云》^[5]讲述的是一个法国式的《编辑部的故事》。作品主人公是一位女作家兼出版编辑伊丽萨白，她得了癌症，将不久于人世，于一个秋日最后一次参加出版社举行的晚会。在其好友叙述者的陪同下，她来到了工作多年的出版大楼，与一个个同事见面，并且由此勾起对往日岁月的各种回忆，展现了出版界在经济状况、思想观念和人际关系等方面经历的巨大变化，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了巴黎虚荣十足的出版市场，揭示了作家、编辑及读者之间的金钱关系和情感纠葛，再现了一幅法国文人圈的现实画卷。其中飘忽不定的模糊人物遵循着人物行动逻辑，时空错位的凌乱事件受制于叙述可能之逻辑，细雨式的叙述语言标示着小说话语的句法逻辑，形成一种寓示“往事如烟”意境的叙事逻辑。该小说的主要情节总体上既简单又含糊。故事的起点是主人公伊丽萨白从家里出发，到出版大楼参加晚会后又坐出租车回到家为终点，时间跨度是傍晚到午夜前，大约半天。主要人物除了主人公伊丽萨白外，似乎还有个叙述者，一路上与她相伴，跟她一起走路、看街景、见同事、回忆往事、吐露情感。但是这个叙述者无名无姓，也没有明显的出场时间和地点，只是以“我”和“我们”的形式散见于叙述中。如“她在走进办公室的时候，强打精神……和我一起坚持下去，一直呆到傍晚结束”^[6]。另，在回家的出租车上，“她要我摇下我

这边的车窗玻璃，以便能用她的脸去感觉十月晚风尚存的温暖，每当她感到心脏疼痛时，她都要紧紧抓住车椅的把手，好像我们每时每刻都会在狭窄的道路上、无栏杆的山路上滑出道路。”^[7]从小说叙述中可以推断，这个由“我”和“我们”指代的叙述者似乎是伊丽萨白的同事，但没有任何关于她的信息，她只是和主人公一起行动而已。至于小说中的其他次要情节，则全部通过与相关同事见面后激发的回忆和预测构成，然而却比主要情节更为丰富，更为重要。如伊丽萨白见到的第二个人是新闻专员克莱尔，两人的见面激发了对克莱尔性格和友好关系的描述，回忆起与她共同编辑书稿和一起参加书展等活动。其他人物如布里吉特、贝尔纳、财务主管、阿兰、维维阿诺、罗杰、凡尔纳、瓦伦西、菲利浦、弗朗索瓦兹、缪勒、苏珊、朗梯埃老哥等，都是通过见面的方式去激发回忆，讲述他们之间的故事和感受。只有叙述者例外，她似乎是主人公的复体，与她一起经历和感受事件。这种情节的安排一方面分配了叙述角色，另一方面为角色组合提供了条件。

从施动者的角度来看，伊丽萨白无疑是施动主体，其他人物因她而出现，是其行动的作用对象。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他人物都是受动者，施动者和受动者组成互为前提的对立体。然而，伊丽萨白在小说中的状态变化被缩减到最小程度：她去参加晚会，但晚会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有哪些人参加，效果怎样，她高兴与否，基本没有交代。倒是由她引出的次要人物更显得形象丰满，各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成为自己故事的施动者。伊丽萨白的故事也只是在触景生情的回忆中得到描述，包括她过去的工作、发病治病的过程、目前病情对身体和情绪的影响等。从受动者角度来看，其他人物的受动状态并不十分明显，相反倒是对伊丽萨白进行施动，影响她的事业与情感生活。因此，书中人物都是主人公的影响者。从改善者角度来看，同事中的阿兰、贝尔纳、克莱尔等对主人公的事业有正面的积极影响，让她在写作和出版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但在情感方面，他们显然又是主人公的恶化者，伊丽萨白与他们的情感生活没有任何结果。而维维阿诺、弗朗索瓦兹、苏珊等显然是恶化者，她们与主人公的

观念和行为格格不入，成为她事业和情感上的敌人。在叙述的故事中，所有人物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或不同事件上，时而是获益者，时而是受害者。人物在晚会上的表现寓示着他们在工作和事业中的境遇，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在这里，施动者与受动者在行动上的相互制约，影响者在信息上的正面或反面影响，改善者和恶化者对主体状态的改善或恶化，获益者和补偿者在奖赏方面进行的奖励或惩罚等，形成了叙述角色的主要组合形态和相互转换机制。

上述叙述角色及其组合形态，正如普洛普的功能或罗兰·巴特的叙事功能组合，构成了小说的叙述框架。同样，这些叙述角色并不是线性分布的，而是根据某种行动逻辑（logique actionnelle）进行布局。布雷蒙将普洛普的31个功能分布于六个层面：即移动（A）、基础故事（B）、考验者（C）、协助者（D）、主人公（E）、对手（F），进一步探讨叙事作品的结构和形态。^[8]布雷蒙还参照巴特的功能层、行动层、叙述层及叙事符号在各语言层次上的横向分布和各叙述层面上的纵向组合^[9]，以便探索叙述结构的多维形态和符号系统。综合上述若干图式，这部小说的叙述角色可以这样分布：移动是该小说的主线，即伊丽萨白（包括叙述者）从家里出发到出版大楼，然后又从出版大楼返回家中；而基础故事则是出发状态、中间经历的事件及回到家中的状态。考验、协助者、主人公和对手则分布在伊丽萨白的回忆中，呈现为镶嵌形式，或是纹心模式（*mise en abyme*）。“对普洛普分析结果的重新阐释，将其推广到更普遍的系统中，这将适用于任何的叙述信息……它显示，通过对有限的可识别成分（功能、三元组合（triade））的结合，可以构建一些越发复杂的状态和行为模式，组成叙事符号学分析所需要的事件和人物（人们称呼的戏剧人物、动元、角色等）”^[10]。《往事烟云》正是以这种特有的手法安排了作家和出版圈内的人和事，人们的喜怒哀乐和悲欢离合。书中的人物不太能分清他们的归属，他们所承担的叙述角色复杂多变，所处时空飘忽不定，形成不同的视角和感知维度。人物通过即兴记忆和视角转换，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和事纳入线性的叙述链中，将

人物各时期不同生活的场景和各自的空间组合成一个个网结：故事的主场景发生在出版大楼里，主人公与每位同事的见面引出另外的故事，将读者带向另一个地方、另一个时代、另一个视角、另一种感知维度，以便全面地反映人物生活和情感的不同层面。

二、三元组合与叙述可能之逻辑

如果说叙述角色及其组合构成了作品的行动逻辑，营造出小说的主要框架，那么在人物引导的回忆故事中，叙事又是根据什么逻辑来组织的呢？法国学者亚当在《叙事》一书中指出：“布雷蒙并未将叙事当作功能的固定句段链。他指出在一系列可能的方向上存在叙述分叉和叙事选择的问题。”^[11]因为任何被讲述的故事都有一个时序属性，即任何事件都有一个到来（故事前）、发展（故事中）和结束（故事后）的过程。其中叙述者可以选择用一句话进行概述，如“两年后……”；或详细描述一系列的行动。这就可以建立一种“叙述可能之逻辑”，让我们透过叙事的线性进展，发现其中的结合关系和连贯次序。在叙述的任何时刻，都必须在这些可能中做出选择，叙述过程中只有一个可能被作者采纳并且得到实现。而且故事既可以向有利于主人公的方向发展，也可以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因此，“一个功能的提出同时伴随着一个矛盾选择的可能性”^[12]。另外，任何行动过程都伴随着三个时刻，对应于三种交替选择，即可能性（virtualité）、现时化（actualisation）和结果（résultat）。可能性指一个功能开启或不开启一个过程（需采取的行为或预测的事件），现时化指一个功能实现或不实现这种可能性，而结果则指一个功能的关闭过程，结果可能达到也可能达不到。具体地说，叙事的任何行动序列（séquence actionnelle）都建立在这种改善或恶化、平衡或失衡的交替选择上，叙事不再是一系列事件的线性排列，而是相互镶嵌的系列的连贯^[13]。设想系列1由初始功能、实现功能和结束功能组成，而在实现功能中又可以插入系列2，即另一个由初始功能、中间功能和结束功能组成的子系列。根据事件有

利于或不利于叙事计划的方向，会出现两种可能性：可能得到改善（amélioration）或可能出现恶化（dégradation）。得到改善的情况：改善中可能有改善过程，也可能没有改善过程；有改善过程时可能得到改善，也可能得不到改善。同样，恶化中可能有恶化过程或没有恶化过程；而有恶化过程中可能出现恶化，也可能避免恶化。这就形成两个或更多的三元组合的相互镶嵌，成为二维的叙述结构，以此拓展叙述的深度和层次。当然，这种三元组合除了相互镶嵌外，也可以相互并列，也可以相互平行，形成叙述角色的行动逻辑和人物视角的互补关系。

在《往事烟云》中，作者遵循了这种叙述结构的安排，充分发挥叙述可能逻辑对叙事文本的规约。如小说在讲到伊丽萨白见第三个人阿兰时，“她在阿兰的办公室门口停住脚步……”^[14]，这就引出了两种可能，她可能进去，也可能不进去。进去了将有一个改善过程，因为她与阿兰是好朋友；不进去，叙事过程将是另样的选择，也就得不到改善。而小说中确实安排她进去了，见了她的朋友阿兰，而且引出对阿兰的描述、他即将卸任的境况、他们俩的美好回忆和情感经历。还有伊丽萨白古怪的“邂逅”癖好，并由此引出两段伊丽萨白的“一夜情”场面。再如她在见第四个同事维维阿诺的时候，“她有点害怕碰到维维阿诺”^[15]。这里同样引出了两种可能：见她或不见她。如果绕过去不见她，那就不会有后续的叙述过程。而小说安排她见了维维阿诺，从而引出这个虚情假意、争强好胜的女人形象，她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潜在威胁。“她观察她（伊丽萨白）脸上的生病特征，好像在估算她还能存活多少天，多少个星期……因为她知道，伊丽萨白的死将彻底摧垮阿兰，最终将他从王子般的办公室里赶出去，她早就想取而代之，这也将代表她在出版社升迁中的最后阶段。”^[16]这种安排提供了恶化过程的范式，既引出了叙述过程，又指明了过程的性质。确实，晚会好比是一场“猎豹舞会”，交织着老一辈对过去美好岁月的无限怀念和新一代对未来前程梦幻般的憧憬，他们在一片虚情假意的寒暄和打情骂俏中，暗地里却互相争风吃醋、尔虞我诈，既相互倾轧又外强中干，一

个个为自我而奋斗；对大多数作家和编辑来说，文本只是个借口，可以借此而生存，去引诱，去自欺欺人。在镶嵌的事情系列2里也是这种情况。如伊丽萨白想起在“阅读协会分部”的事情，有个男孩请她帮助修改作文。那么帮助修改或不帮助修改就成了一种选择，将引导叙述走向不同的方向。小说安排她“温柔地给他提建议，尽量保持——非常清楚每一个句子都代表着对抗发烧、抵御恐惧和痛苦的斗争——不改变，也不抽去他作文中的任何一个词……在中心故事上怎样完成移植部分，给他提供一个目标，一个继续的道理……”^[17]这里既反映主人公的善良品德，又反映事件的改善方向，因为这符合她“治愈和新生的欲望”。同时这个插入故事也是对抵抗疾病和写作活动的一种戏仿。叙述可能在三元组合中的众多变体，为事件的叙述过程提供了众多的选择，让叙述前景具有更多的张力。作者借此去描绘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揭示文人圈里的习俗、弱点或是美德。

三、句法逻辑与叙述逻辑

在小说成文（mise en texte）方面，布雷蒙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索，提出了叙述分句（proposition narrative）的概念，以此作为叙述的基本单位。有关叙事的基本单位，亚当在《叙事》中进行了鉴定，区分出动机（motif）、故事（fable）、述题（sujet）等。动机是指最小的叙述单位，即每个承担最小意义的分句，如“主人公死了”“天空重新发亮”等。故事是指在时间和逻辑上具有连续关系的事件，它以“动机”为基础。而述题则指被纳入叙述性陈述句链的“动机”^[18]。由此可见，叙述的最小单位是由陈述句充当的叙述分句。布雷蒙随后又对这些分句进行了分类。他认为叙述分句大致有四种对立关系：首先是叙述独立句和叙述从句的对立，第二是同时性叙述分句和连贯性叙述分句的对立，第三是逻辑性叙述分句和物理性叙述分句的对立，第四是积极性因果分句和消极性因果分句的对立。^[19]其图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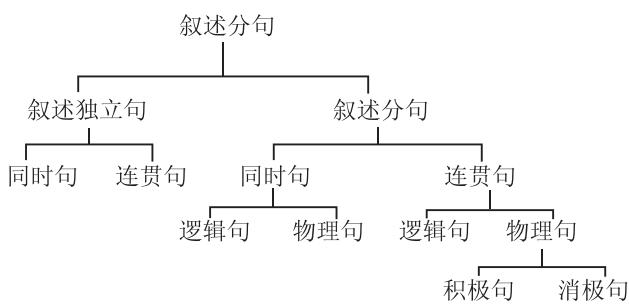


图1 叙述分句对立关系图示

这种分句特色在《往事烟云》中也有较突出的表现。作品布局展现的不再是传统小说中人物、时空和因果的逻辑关系，而是反映叙述话语结构的叙述分句关系。在叙述角色和叙述可能的构建之下，作者对叙述话语作了精心的设置，从叙述分句和句法逻辑等角度进行了探索。小说的语言非常独特，那是一种绵绵细雨式的表述，句子像长长的披巾展示着“甘美的忧虑”；作者灵活地使用关系代词和分词，构成错综复杂的复合句，常常一个句子占据半页篇幅；并且通过破折号和括号等方法，大量使用镶嵌式的句子。亚当在《叙事文本》中说：“作为序列结构，一个文本包括一定数量的序列，可以是完整的，或是省略的……序列是文本的组成单位，它由分句包组成，而分句包本身又由若干分句组成。”^[20]从叙述分句的角度来看，小说作者庞克拉西充分利用法语中的表达手段，将各个独立分句组合为串联的分句包（paquet de propositions），形成一种绵绵细雨式的叙事序列。我们不妨选取一个分句包作为例子：

Après avoir retiré sa bague de cornaline, devenue trop large, comme toutes celles déjà enfermées dans le boîtier triangulaire devant elle, et qu'elle ne songeait même plus à apporter dans l'atelier du Temple pour qu'on les remît à la taille de semaine en semaine, elle se mettait à écrire, heureuse de retrouver le contact, presque frais, de la page sous sa main qui était restée si belle comme si l'écriture – par reconnaissance pour ce qu'elle lui avait déjà donné et sacrifié sa vie – veillait à maintenir intacte cette partie de son corps, à ce

qu'elle ne fût pas envahie par la douleur qui était cantonnée au-delà du poignet où se lisait l'empreinte de son bracelet d'hôpital.^[21]

她摘下已经变得非常松的肉红色的玉戒指，在她面前的三角形首饰盒中，已经尘封了不少这样的戒指，她甚至想不起来把它们送到神庙加工点去，让人家一周接一周地帮改成合适的尺寸，她开始写作，很高兴又能重新触摸手下崭新的白纸，那只手依然是那么漂亮，似乎写作——为了表示对她终身付出和牺牲的感激——能够注意保持身体的这一部分完好无损，保护它不受手腕以上疼痛的侵袭，而她手上明显看得出有医院手术夹的痕迹。^[22]

该句中用不定式过去时après avoir retiré、过去分词devenue、形容词同位语heureuse等时态手段引出三个从句，用qui、que、où、celles、pour que、pour ce que、à ce que等关系代词引出八个从句，又通过介词par、副词comme和comme si、连词et等引出四个从句，因此在法语原文中，这是一个由15个独立分句串联而成的分句包。当然，还有比该句例更长的分句包，包括的分句达到数十个，确实给阅读带来另样的感受。况且，这种句式贯穿小说的整个叙述过程。其次，整部小说中几乎全是未完成时态，其中未完成过去时约占三分之二，其他未完成时态有现在分词、不定式、简单过去时等。现在时仅存在于直接引语中。尤其是许多动词，它们的体（aspect）表达短暂停时间或非重复动作，一般只能用复合时态，但在作品中仍然使用未完成过去时，如elle s'inatallait devant la table（她在桌边坐……下）、Elle allait vers Brigitte（她向布里吉特走……去）、Elle s'arrêtait devant la porte du bureau d' Alain（她在阿兰办公室门口停……下）等，似乎连短暂的动作也要拉长，以寓示主人公疾病缠身体力虚弱时的动作缓慢，或是伊丽萨白那小心谨慎不紧不慢的性格，或是让读者慢慢体会人物的感受和小说的意境。因此，这种特定句式不能不说这是作者有意为之。

从叙述分句的句法逻辑来看，作者试图建立自己的叙事逻辑，主要体现在人称的模糊性、叙述

的虚实方面。《往事烟云》中的人称很少，在交代出有名无姓的人物后，仅用“他”和“她”来表述，有时是指一个特定的人，有时又好像是其他任何一个人，叙述中常常不刻意确指，令读者有些茫然。其实作者就是想打乱人物的特定归属，让这些姓名符号和代词去代表一类人——是他，是她，是你，也是我，人物的生活状况和七情六欲就是这一类人的缩影；其中有几个人物还有他们的复体，物质的存在和精神的存在，自身的“我”，他人眼中的“我”或投射中的“我”，从不同的视角和感知方式来感悟人生。其次，小说中使用了大量的“好像”“似乎”“仿佛”等委婉语，在读者和故事之间设立了一种缓冲机制，喻示真实中的某些不真实，同时又让读者在虚幻梦境中领略非真实中的真实，构成了作品中特有的虚实逻辑。如果读者细心观察，《往事烟云》中的叙述分句在句法层面上营造一种“思绪绵绵、忧愤习习、长夜茫茫、期待悠悠”的意境。

综上所述，布雷蒙的叙事逻辑理论具有相当的开创性，为考察文学文本提供了新的视角。而对小说《往事烟云》的分析，证明确实存在一种特殊的叙事逻辑。叙述角色构成了小说人物的行动逻辑，以此确定人物及事件在时空维度上的布局；三元组合实现了事件过程中的叙述可能之逻辑，以此变换事件的发展方向和人物的最终结局；而叙述句法通过分句类型的不同组合和变种，形成长度悬殊、类型纷繁、穿插交错、令人欲罢不能的叙述话语。诚然，布雷蒙在语言层面上的探索则略显不足，没有对叙事逻辑在成文层面上进行贯彻落实。法国学者勒特说：“在虚构和叙事之后，成文则是另一重要任务，即‘靠近’文本实现的层面，它必须考虑修辞与文体组织、句法形式、词汇单位等，以便将虚构与叙事具体化，赋予其血肉。”^[23]如果能在文字和文体方面有所考察，揭示一些可资参照的模式，布雷蒙的叙事逻辑理论将更为丰满，更具有普遍性。

注释

① 参见Claude Bremond, *Logique du récit*. Editions du Seuil, 1973.

参考文献

- [1] Claude Bremond. La logique des possibles narratifs[J]. in *Communications*, n°8, 1966. Seuils, 1981. PP. 66–82.
- [2] Vladimir Propp. *Morphologie du conte*[M].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0. PP. 35–80.
- [3] Claude Bremond. *Logique du récit*[M].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3. P. 46.
- [4] Claude Bremond. *Logique du récit*[M].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3. PP. 131–308.
- [5] Jean-Noël Pancrazi. *Tout est passé si vite*[M]. Paris: Gallimard, 2003. P. 1.
- [6] 庞克拉西. *往事烟云*[M]. 张新木,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5:170.
- [7] 庞克拉西. *往事烟云*[M]. 张新木,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5:216.
- [8] Claude Bremond. *Logique du récit*[M].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3. P. 30.
- [9] Roland Barthes et al. L'Analyse structurale du récit[J]. in *Communications*, n°8, 1966. Seuils, 1981. PP. 12–28.
- [10] Claude Bremond. *Logique du récit*[M].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3. PP. 45–46.
- [11] Jean-Michel Adam. *Le récit. Que sais-je?* (2149) [M]. Paris: PUF, 1996. P. 31.
- [12] Claude Bremond. *Logique du récit*[M].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3. P. 25.
- [13] Jean-Michel Adam. *Le récit. Que sais-je?* (2149) [M]. Paris: PUF, 1996. P. 33.
- [14] 庞克拉西. *往事烟云*[M]. 张新木,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5:156.
- [15] 庞克拉西. *往事烟云*[M]. 张新木,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5:165.
- [16] 庞克拉西. *往事烟云*[M]. 张新木,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5:166.
- [17] 庞克拉西. *往事烟云*[M]. 张新木,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5:241.
- [18] Jean-Michel Adam. *Le récit. Que sais-je?* (2149) [M]. Paris: PUF, 1996. P. 22.
- [19] Claude Bremond. *Logique du récit*[M]. Paris: Editions du Seuil, 1973. PP. 320–321.

- [20] Jean-Michel Adam. *Le texte narratif* [M]. Paris: Nathan, 1994. PP. 111–112.
- [21] Jean-Noël Pancrazi. *Tout est passé si vite* [M]. Paris: Gallimard, 2003. PP. 11–12.
- [22] 庞克拉. *往事烟云* [M]. 张新木, 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05:143.
- [23] Yves Reuter. *Introduction à l'analyse du roman* [M]. Paris:Dunod, 1996. P. 88.

Bremond's Theory of Narrative Logic

Zhang Xinmu

Abstract: French scholar Bremond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the logic of narrative possibility” in his early years, and later developed into “logic of narrative”. He believed that literary works were composed of basic sequences, in which showed the emergence of scenarios, actions and results by means of mosaic, juxtaposition, and connection. The narrative logic determines the basic sequence of the narrative as three functions: “possible, process, and result”, which correspond to the three necessary stages of the changing process of things in the story. This theory of narrative logic is quite ground breaking and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literary texts. An analysis of the work *Tout est passé si vite* proves that this theory basically reflects the general narrative logic of literary works.

Key words: bremond ; narrative logic; *Tout est passé si vite*

述过往以鉴未来：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综述与反思

冯正斌

摘要：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史悠久，对于英语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无论是中国古典文学还是近现代文学都与英语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互动关系。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进程的加快，中国文学英译研究成为众多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因此，回顾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分析中国文学与英语文学的互动影响及中国文学英译研究概况，并对国内英译研究进行评论和反思，将有益于我们进一步理清研究思路，明确问题导向，推进中国文学英译研究健康发展。

关键词：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综述与反思；影响与接受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20)01-0083-06

文学作品的译介一直是促进文化交流、连接世界文明的重要渠道和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东西方文明的联通和融合。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别文学之一，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及“文化自信”理念推动之下，中国文学对外译介迎来了新的历史机遇。海外汉学家、本土译者、翻译研究者、比较文学研究者、本土作家和海内外出版机构等，对中国文学的翻译、推介和传播之广度、密度可谓前所未有。与此同时，中国文学译介成了国内翻译界和比较文学界研究的新热点。在此背景之下，简略回顾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情况，浅析中国文学与英语文学的互动影响及中国文学英译研究概况，并对国内英译研究进行评析和反思，以期管窥之举达抛砖之效，为中国文学英译研究进一步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一、中国文学英译及其影响述略

中国文学向外译介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的经文传译，如菩提流支翻译《大乘章义》到西域，刘世清翻译《涅槃经》至突厥等^[1]。而据现有文献记载，中国文学英译发轫于16世纪前后。英国作家兼文学评论家伯吞汉姆（George Puttenham, 1529—1590）在1589年出版的《诗艺论》中译介了两首中国情诗^[2]，堪为中国文学英译之滥觞。在之后四百余年中，中国文学在海外，尤其是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方面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虽然中国当代文学的海外译介与当代文学创作的实际成就相比还有相当的差距”^[3]。

通过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1845—1937）、韦利（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施奈德（Gary Snyder, 1930—）、华兹生（Burton Watson, 1925—2017）、白芝（Cyril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华文化‘走出去’视域下中国文学在美国的译介、接受与影响研究”（17BYY009）；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翻译方向’贾平凹小说英译模式考察”（2019M022）

作者简介：冯正斌，男，陕西勉县人，西安外国语大学博士生，西安科技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文学翻译、英美文学。

Birch, 1925—）、霍克斯（David Hawkes, 1923—2009）、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芮效卫（David Tod Roy, 1933—2016）、宇文所安（Stephen Owen, 1946—）等汉学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译介，通过闵福德（John Minford, 1946—）、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 1939—）、蓝诗玲（Julia Lovell, 1975—）、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 1941—）、沙博理（Sidney Shapiro, 1915—2014）、韩斌（Nicky Harman, 1950—）等汉学家、翻译家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西方世界以不同的形式接受着中国文学的滋养。海外出版机构对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代中国小说丛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读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国文学史》等，都对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极具影响力^[4]。同时，中国的翻译家也在努力向外译介我国的优秀文学作品。辜鸿铭、张庆桐、苏曼殊、林语堂、钱钟书、杨宪益、孙大雨、欧阳桢、许渊冲、汪榕培等翻译家的译作涵盖从古典经籍、唐诗、宋词、元曲到明清小说几乎所有中国古典文学精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外译方面，在国家资助行为和民间团体行为的共同推动下，“熊猫丛书”、《大中华文库》《今日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英文版）》《路灯》《天南》等向英语世界译介了大量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涵盖了鲁迅、老舍、曹禺、茅盾、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萧红、莫言、贾平凹、北岛、顾城、阎连科、余华、金庸、王朔、张贤亮、周立波、苏童、王安忆、姜戎、冯骥才、毕飞宇、阿来等中国知名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在西方英语世界里，中国文学的翻译对西方社会文化、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世界文学浩瀚的海洋里，国别文学的互动频繁。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的接受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猎奇、抵触，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依赖、推崇，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学的过度崇拜的演变过程。可以说，现当代中国文学无不与西方文学“血脉相通”。与此同时，中国文学对西方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英国和美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中国痕迹”^[5]。美国文艺

复兴时期，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超验主义学说借鉴和融合了孔子的儒家思想，通过挖掘儒家典籍中安贫乐道的思想，来对抗美国“物质主义”思潮并升华超验主义的内涵。爱默生个人对孔子更是推崇备至，“作为万世师表，在基督降生前的大批哲学家中堪称第一”^[6]。爱默生被誉为“美国的孔子”，这一称谓不仅表明了其本人在美国文学、思想、哲学史上的地位，同时也彰显了孔子思想对爱默生的影响。

20世纪初，一首《在地铁站》开启了美国现代诗歌之门。庞德因翻译唐诗获得诗歌创作灵感，钟情于中国唐诗中的意象叠加，并以此摆脱欧洲后维多利亚诗风的束缚，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现代诗歌创作。假如没有庞德与中国诗歌的邂逅，没有《神州集》的翻译，没有他对大量唐诗的涉猎，世界可能就会失去这样一位“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诗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寒山诗”与“垮掉的一代”及“嬉皮士文化”等的互动与契合，成就了美国第二次诗歌创作高峰。这一文学高峰缘起于韦利、施奈德及华兹生等人对于寒山子诗歌的翻译，尤其是华兹生1962出版的《寒山诗100首》。早期零散的寒山诗歌译介并未改变寒山子在中国及英语世界默默无闻的状态，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声势浩大的“垮掉派”运动揭开帷幕以后，寒山子才逐渐以“垮掉派”偶像的形象进入美国读者的视野。韦利、华兹生、施奈德的译介成就了寒山子在英美世界“中国重要诗人”的地位，并将美国诗歌创作推向新的高潮，同时也使得寒山诗歌在国内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文学对英国文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0世纪初，英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韦利通过英译汉诗打破了英国诗歌后维多利亚诗风的沉寂，对诸多英美诗人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沿着韦利开辟的道路，庞德、宾纳（Witter Bynner）、罗威尔（Amy Lowell）以及他本人都以中国译诗的形式创作出最好的作品”^[7]。

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持续上升，作为新型汉学的‘中国研究’正在海外蓬勃兴起。‘中国研究’关注当代中国问题，侧重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国际关系，其中也包括当代的中国文学和文化”^[8]。作为国家综

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文学吸引了西方读者更大的好奇与兴趣。“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等有力助推了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场域中的地位提升。美国著名汉学家葛浩文译著丰硕、深受市场欢迎便是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场域的地位提升的重要风向标。据统计，葛浩文共翻译中国文学作品五十多部，译介了以莫言、贾平凹、萧红、冯骥才、苏童、王朔、阿来、姜戎、毕飞宇为代表的二十多位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在英美读者中接受效果良好。正如英国新生代汉学家蓝诗玲所言，虽然中国文学要在英语出版中取得一席之地还需要付出更多努力，但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只是一个时间和投资的问题^[9]。进一步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学将对世界文学产生更大的影响，为人类文化的繁荣贡献更大的力量。

二、中国文学英译研究概况简析

国外汉学家及比较文学学者对中国文学的译介研究由来已久。斯洛伐克汉学家马立安·高利克（Marián Gálik）的《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侧重于中西文学之间的互文性关系和姻缘关系研究^[10]；美国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 Kinkley）的文章《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是按照时间梳理现当代作品的翻译现状的代表作^[11]。澳大利亚汉学家杜博妮的《虚构的作者与想象的读者：二十世纪现代中国文学》结合中国社会、历史语境和西方文学传统，评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分析了传播不力的原因^[12]。英国汉学家蓝诗玲在英国《卫报》上的文章《大跃进》中指出，英美出版商认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缺乏文学价值，仅仅是政治的传声筒。此外，汉学家葛浩文、安德鲁·琼斯（Andrew F. Jones）、马悦然（Goran Malmqvist）等的访谈均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当代文学在英美译介的问题。但是，国外研究更多的还是以汉学研究为出发点的探讨，实质意义上的译介研究并不多，毕竟我们才是要积极“送出去”的发起者。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在国外的译介和传播研究越来越受到国内翻译学界和比较文学界的关注。在此背景之下，翻译

学界和比较文学界形成了一批“中国文学译介”高水平研究团队。例如，以上海外国语大学谢天振教授为核心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团队，以华东师范大学张春柏教授、袁筱一教授为核心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团队，以南京大学许钧教授、刘云虹教授为核心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团队，以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为核心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团队，以及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的译介研究团队等。这些团队策划举办了多场以中国文学译介为主题的具有影响力的学术研讨会，团队成员承担了诸多文学译介相关的基金项目，并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文学译介的高水平系列论文、专著等，在中国文学海外译介研究方面起到了标杆性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由张健、刘洪涛、石江山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21世纪北美中国文学研究著译丛书》，由查明建教授主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系列丛书》，以及由曹顺庆教授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中外文化与文论》论文集刊等，可谓是近年来国内中国文学译介研究的标志性成果。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关于中国文学译介研究的科研课题获得各级社科基金项目资助，其研究范围覆盖断代史研究、国别史研究、经典案例研究、译者研究、译本比较等各个方面。近年来（2012至今），关于中国文学译介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年均超过10项。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立项有：中国网络小说外译及其社会效益研究（2019）、理雅各《春秋》英译注疏话语研究（2019）、企鹅版中国文学经典的翻译与传播模式研究（2018）、《楚辞》百年西传得失与中国典籍的译介路径研究（2018）、汉语古诗英译策略的体系建构与运行机制研究（2017）、中华典籍英译云平台的建构及应用研究（2017）、唐诗翻译在当代美国的接受和影响研究（2016）、中国文学外译批评研究（2016）、美国《文心雕龙》研究史料整理与翻译研究（2015）、翻译社会学视阈下中国当代小说译介模式研究（2015）、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译介模式研究（2014）、《道德经》在美国的译介与接受研究（2014）、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英语国家的翻译和接受研究（2013）、中国当代小说的英译研究

(2013)、建国后三十年小说英译研究(2012)、国家翻译实践中的“外来译家”研究(2012)等。据笔者统计，近年获准立项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课题有所增加，但是与翻译学科的总立项数相比，“文本的译介与传播成了近期翻译研究考察的一个热点，重点考察翻译活动及其产品的对外传播过程，分析具体成效及原因，但比重不大，没有形成规模效应”^[13]。因此，国家对于中国文学译介项目的投入仍需持续投入，学界同仁仍需加倍努力，争取收获更多的创新性研究成果。

除了科研立项、专著撰写之外，发表期刊论文是国内学界交流中国文学译介研究成果的主要渠道。截至2019年7月31日，通过CNKI高级检索主题词含有“译介”并包含“中国文学”，经过筛选排除共查找到中国文学在英美国家译介研究直接相关的博士论文48篇，其中19篇关注中国古典文学译介问题，如《〈史记〉英语译介研究》(魏泓，2018)、《中国戏剧典籍译介研究——以〈牡丹亭〉的英译与传播为中心》(赵征军，2013)；8篇专注于现当代中国文学译介研究，如《文化转向视域下的莫言小说英译研究》(孙宇，2017)、《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小说在美国的译介与传播》(崔艳秋，2014)；10篇以英译译者为研究对象，如《架设东西方的桥梁——英国汉学家理雅各研究》(岳峰，2003)；9篇关注中外文学关系，如《弱小民族文学的译介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族意识》(宋炳辉，2003)；1篇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仓央嘉措诗歌翻译与传播研究》(荣立宇，2013)；1篇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模式研究，《中国文学“走出去”译介模式研究——以莫言作品美国译介为例》(鲍晓英，2014)。从统计分析来看，博士论文研究略偏好中国古典文学，这与古典文学作品的异域传播业已经受足够的历史沉淀，同时其研究数据更具可靠性与充分性有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英译研究数量有限，这也反映了少数民族文学译介量不足的事实。中西文学关系和译介模式研究的占到相当的比例，说明学界对比较文学、译介学、接受影响研究关注意识增强。

通过CNKI高级检索主题词含有“译介”并包含“中国文学”，共查找到CSSCI期刊论文260余篇，

其中关于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的论文100余篇。笔者将范围进一步缩小，以“中国文学走出去”为主题，共检索到论文33篇，其中以中国古代文学为例探讨“走出去”问题的论文5篇，如鲍晓英的文章《“中学西传”之译介模式研究——以寒山诗在美国的成功译介为例》从拉斯韦尔传播模式出发，以寒山诗在美国的成功译介为案例，考察其译介传播过程，总结其成功西传的经验，探索中国文学“走出去”的译介模式，以期给“中学西传”提供经验和参考^[14]；以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例探讨“走出去”问题的论文17篇，如吕敏宏的文章《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译介模式》参照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的数据库资料，按照民国时期、十七年文学时期、改革开放时期来分类，以改革开放时期为重点，梳理了每一时期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的英语译介传播状况^[15]；哲学阐释性译介思考类论文11篇，如曹丹红、许钧的《关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若干思考》指出，“随着文学文化‘走出去’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相关问题的讨论之中。然而，由于参与讨论者来自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再加上媒体的聚焦放大，使得讨论不时呈现混乱局面。一方面看似发言者众，另一方面却是观点和意见的重复，某些观点未经深思熟虑就已发表，随即很快在人云亦云间扩散，导致形成了诸多认识误区”^[16]。从分析数据上看，译介研究热度较高，成果丰硕，但多数研究仅仅关注经典作品、知名作家，以典型案例为依据探讨中国文学英译问题者居多，关注少数民族文学、网络小说及非主流作家的研究涉猎较少。

三、国内英译研究的得与失

无论是从研究的数量，还是从研究群体的体量上讲，中国文学英译研究都是近年来语言学、比较文学、中国文学、世界文学、传播学等领域关注的热点之一，成果产出不凡。这些研究和译介活动共同推动着“东学西渐”，为中国文学的发展带来了积极意义，推动着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首先，这些研究成果不仅能为中国文化“走出

去”战略提供可资借鉴的方案，同时“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中国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建设具有启示意义”^[17]。中国文学海外译介反哺中国文学的例子也有很多。深受孔子思想影响的爱默生不仅对惠特曼（Walt Whitman）等美国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影响，同时也影响了中国的张爱玲、郭沫若、海子等诸多作家的创作。中国的新诗运动主将徐志摩等人深受惠特曼的影响，这便是国别文学之间良性循环、反哺互惠的典范。

其次，通过译介研究，我们发现中国文学的影响力有待提高。以轰轰烈烈的《大中华文库》翻译项目为例，在已经出版的近200册中国作品中，“除个别几个选题被国外相关出版机构看中购买走版权外，其余绝大多数已经出版的选题都局限在国内发行圈内，似尚未真正‘传出去’”^[18]。

再次，译介研究可以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国内外研究视角的互补、互证可以提供别样的洞见，从而启发我们调整、优化内部研究。例如，寒山诗在西方经典化过程的研究就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国内已有的诗歌史，从而促使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去发掘寒山诗新的审美价值。

任何繁荣的背后往往都隐藏着浮华，繁花似锦的中国文学译介研究事业也不例外。其一，部分研究密度极高，难免观点陈旧，资料重复，人云亦云。以“莫言小说译介”为例，仅2016年一年就有多本专著出版，如贾燕芹博士的《文本的跨文化重生：葛浩文英译莫言小说研究》、鲍晓英教授的《莫言小说译介研究》、孙会军教授的《葛浩文和他的中国文学译介》等。通过CNKI检索“莫言+译介”主题词，共有博士论文10余篇，硕士论文50余篇，CSSCI来源期刊文章近100篇。笔者绝无诋毁各位作者之意，我们真挚地认同多数学者的观点创新、方法创新等，他们不断地以新的视角介入莫言英译研究，不乏真知灼见。然而，如此高密度的研究，难免会有重复劳作之嫌。

其二，描写性研究正在吞噬规约性研究，大有文化研究独大之势。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无疑是翻译学科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霍尔姆斯（James Holmes）、佐哈尔（Itama Even-Zohar）、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等人确立了目的语在翻译中的核

心地位，将翻译研究从文本对等中解脱出来，将翻译活动作为一种历史事实来看待，从文化语境审视翻译这一既成事实，这样的主张无可厚非。然而，纵观国内的中国文学英译研究，大有堕入“翻译必言‘文化学派理论’”之趋势。似乎只有解构“翻译必言‘信、达、雅’”，方能在翻译界著书立说，然而文化学派的本意大概并非如此。正如赵彦春所言，“目前，文化派议论开辟的译学道路正引领着国人走将下去。的确，近几十年我们似乎‘失去了自我’，即便偶有自己的声音，灵魂却是他人的”^[19]。

其三，“走出去”的目的是构建理论自信，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然而，纵观目前的译介研究，多数以西方理论为依据，大有“唯西是从”之嫌。译者比较研究中，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深入骨髓，几乎统一认同西方所谓翻译即为“译入”的观点。葛浩文、宇文所安等西方译者的研究几乎成了译者研究的全部，西方中心主义思想深入骨髓。通过检索我们发现，国内对许渊冲先生这样在世界译坛享有盛誉的中国译者的高质量专题研究虽不能说凤毛麟角，但也只有1部专著、10余篇博士论文和290余篇CSSCI期刊论文。“西方中心主义思想”貌似已深入我们的骨髓，侵入我们心脾。笔者于2016年在西北大学（中国）聆听了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的讲座。他在论及中国文学外译问题时明确表示，即使中国人自己翻译出来，他们（西方汉学家）也不会接受，无论翻译本身的好与坏。西方学者的东方主义视角昭然若揭。东西方文化误解使然，尚可谅解。然而，我们的研究也以相同的意识指向发展，就不能不令人担忧。

四、结语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影响研究受到高度关注，相关课题成为近年来国内翻译学、比较文学、语言学和历史学专业的研究热点。学界出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一批“中国文学译介”高水平研究团队，中国文学英译研究也成了一门显学。但是，国内中国文学英译研究的维度、深

度或许与表面的繁华相悖相斥，存在着一些亟待关注、探讨及解决的问题。笔者梳理了中国文学英译历史及其影响，回顾了中国文学在英语世界数百年的传播、交融和浸淫，在概述高水平论文发表、国家资助立项、研究团队建设等相关情况的基础上，对国内英译研究进行评论和反思，将有益于我们进一步理清研究思路，明确问题导向，推进中国文学英译研究健康发展。我们相信，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学必将进一步走出国门，承担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使命。

参考文献

- [1] 侯秀然. 中国文学海外译介述略及启示[J]. 出版发行研究, 2016(12):110.
- [2] 党争胜. 中国古典诗歌在国外的译介与影响[J]. 外语教学, 2012(3):96.
- [3] 李朝全. 中国当代文学对外译介成就概述[N]. 文艺报, 2007-11-06(3).
- [4] 黄立.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得与失[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3(24):178.
- [5] 黄立. 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的得与失[J].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3(24):179.
- [6] 钱满素. 爱默生和中国[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6:63.
- [7] 李冰梅. 韦利与翟里斯在英国诗转型期的一场争论[J]. 外国文学评论, 2012(3):218.
- [8] 王洪涛. 社会翻译学视阈中中国文学在英国传译的历时诠释[J]. 外语学刊, 2016(3):150.
- [9] 孙敬鑫, 蓝诗玲. 英国新生代汉学家[J]. 对外传播, 2012(6):61.
- [10] 马立安·高利克. 中西文学关系的里程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 [11] 金介甫. 中国文学(一九四九~一九九九)的英译本出版情况述评. 张柠. 董外平编. 思想的时差(海外学者论中国当代文学)[A].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 [12] Bonnie S. McDougall, Kan Louie. 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M]. London:Hurst & Company, 1997.
- [13] 张威. 我国翻译研究现状考察——基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0~2013)的统计与分析[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5(1):111.
- [14] 鲍晓英. “中学西传”之译介模式研究——以寒山诗在美国的成功译介为例[J]. 外国语, 2014(1):65~71.
- [15] 吕敏宏. 中国现当代小说在英语世界传播的背景、现状及译介模式[J]. 小说评论, 2011(2):4~12.
- [16] 曹丹红, 许钧. 关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的若干思考[J]. 小说评论, 2016(1):56.
- [17] 曹顺庆. 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投标项目特稿: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J]. 中国文化与文论, 2013(24):2.
- [18] 谢天振. 中国文学走出去:问题与实质[J]. 中国比较文学, 2014(1):2.
- [19] 赵彦春. 翻译学归结论[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13.

On Domestic Studie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Feng Zhengbin

Abstrac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ve exerted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English literature. Both the classics and the modern masterpieces in Chinese literature are constantly interactive with English literature in various way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strategy,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domestic academic circle. Hence, based on a brief overview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its interactive effect on both parties, a tentative analysis of domestic studie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s conducted with the focus on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s, hoping to shed new light to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Going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of English translation; overview and reflections; influence and reception

论数据权利归属与取得

李爱君

摘要：数据权利归属的研究是要回答“数据是谁的”这一问题。数据权利归属是数据权利保护的核心问题。此问题不解决，就无法真正实现对数据权利的保护，更无法实现数据的有效利用和激励数据开发、利用技术的研究。数据权利归属就是确认数据财产的初始权利，数据权利归属研究的目的在于维护数据开发和利用的市场秩序，激发人们研发和利用数据技术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维护数据权利中的个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并为数据安全立法提供法学理论支撑。本文以数据资源有效开发利用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协调、数据开发利用技术发展的激励为核心来论证数据权利的归属，从立法层面、权利结构理论和数据权利的财产权属性三个方面论证了数据权利的可行性。最后，本文针对数据本身的特征提出了数据权利归属的私人模式及数据权利取得的路径。

关键词：数据权利；数据权利归属；数据权利归属私人模式；数据权利取得

中图分类号：D91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447（2020）01-0089-10

人类正在从IT时代（Information Technology）转向DT时代（Data Technology）！在DT时代，大数据已成为各国重要的生产资料和核心资源。数据资源一经进入市场进行流通，必然出现数据权利再分配，如没有一定的公平的权利分配机制就会出现各种利益纠纷，一旦权利利益纠纷出现，对数据资源的保护及其开发与利用都会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甚至会对个人数据安全和国家主权安全产生威胁。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途径是建立数据权利利益公平的分配机制与个人数据和国家主权保护机制。利益分配机制能够实现数据生产和开发的劳动价值；保护机制能够使数据安全和国家主权的安全得以保障。数据权利利益分配机制与个人数据和国家主权安全保护机制实现的核心是数据权利归属的确认。

一、数据权利归属的必要性

（一）数据资源有效开发和利用的需要

首先，根据资源定义“一切可被人类开发和利用的物质、能量和信息等的总称，它广泛地存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是一种自然存在物或能够给人类带来利益的财富”，可知数据属于非自然资源，数据能够给人类带来财富。在社会实践中，数据能够被人类开发、利用，并能够满足人类生产、生活的需要，是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客体，给人类带来了财富，因此数据是资源。其次，资源的范围是动态发展的。从历史的角度，资源的范围和种类是随人类开发能力变化的，或者说科学技术是资源范围界定的决定因素。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阶段，资源主要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占有；数据资源是随着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原有无法进行处理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央金融监管与区域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基础理论研究”（18FXB007）

作者简介：李爱君，女，山东曲阜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政法大学互联网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长、大数据与法制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金融法、金融监管、人工智能法律和数据法律。

与发现其价值的数据已经能够通过处理使其产生新的价值，此价值又能够满足人类的需要，因此数据是21世纪人类的非自然资源。

综上所述，数据是资源，已被美国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列为国家战略资源。资源就应有效地开发和利用，有效开发和利用的前提是有序。目前数据资源的无序开发和破坏问题极其严重，已经阻碍了数据的有效开发和利用，亟待解决。资源开发利用的人类社会发展史与理论、实践经验都充分证明了数据资源有效开发利用的核心问题是数据权利归属的界定。数据权利归属就是确定数据权利的主体，即数据归谁所有。“一切资源须由确定的主体拥有，或者，必须明了确定的主体如何获得对资源的所有权。……若资源为个人所有，拥有财产者便有合理的理由利用之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满足。……明确所有权的规则以及规范如何获得无主资源的规则可以减少就此类问题而发生的争议。”^[1]“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价值。”^[2]“……如果人们在占有和使用有限的资源时没有安全保障，则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如果人们不能确保对物的持续占有，就可能发生混乱以及对资源的浪费；……如果人们对于继续使用某些资源并依此获益抱有信心，那么，他们就有使用资源创造利益的积极性，资源的利用便会更为有效。”^[3]假设把数据资源视为公共产品，每个人都是数据的所有者，任人无条件地收集、使用、处理和交易，那将陷入无序和滥用的状态，最终走向人人对数据收集自危和恐惧的境地，进而导致数据的枯竭。“……就如同众所周知的‘大锅饭的悲剧’那样，可能会导致效率的丧失。”^[4]因此，数据权利归属的初始权利的界定，不仅有利于减少人们的相互争执，还能有效地保护数据主体的权益，从而在保护个人数据安全、国家主权安全等前提下为数据开发和有效应用提供稳定的秩序和激励机制。“安全有助于使人们享有诸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地维续下去。”^[5]个人数据无论其数量还是其价值都是大数据应用的重中之重，不仅是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新资源，还提供了诸多便利，如利用个人数据的大数据计算实

现精准决策、精准医疗和精准服务等。然而，个人数据在开发与应用的同时，其不当使用的乱象日趋严重，如对个人数据的非法收集、滥用、泄露、非法买卖等，轻则影响人们生活安宁，重则侵犯个人隐私权和损害公民财产权，甚至使人身安全和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近年来国内外发生的各种个人数据安全事件，如CSDN遭受攻击、支付宝年度账单事件、Yahoo邮箱泄露案件、华住集团上亿条个人信息数据泄露事件等。这些事件的出现充分表明个人数据的安全问题亟待解决，否则不仅对个人隐私权和财产权产生损害，还将影响我国建设数据强国目标的实现。个人数据安全已是实现数据强国的重要保证，要想实现个人数据安全就要赋予个人数据主体某种权利，即个人数据权利归属于数据主体。权利是私法秩序维持的手段。我国虽然没有对个人数据权利进行保护的专门立法，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以下简称《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都规定了个人信息保护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其主要原因是没有从根本上赋予个人数据主体对数据拥有数据权利，而是更多地规定了数据主体相对方的义务，从而导致无法真正实现个人数据权利保护。“要使某人负有的义务在私法上得到实现，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赋予另一个人一项对应的权利。否则，义务就难以实现。”^[6]“义务的核心意义在于，它是作为权利的相关物发挥作用的，义务的承担者不仅被告知他必须做某事，而且被告知他理应去做某事，它之所以受约束乃是因为如果他规避义务，所受到的不是他自己善良动机的挑战，而是另一个人的挑战，因为那个人拥有权利。”^[7]个人数据权利归属就是赋予个人数据主体权利，从而使个人数据收集、处理和使用相关主体的义务承担者不仅仅是自己善良动机的挑战，个人数据主体的挑战，进而实现个人数据的安全。

（二）数据资源应用过程中各方利益相协调的需要

数据资源应用过程中各方利益相协调主要有两个维度：一个维度是个体之间的利益协调，另一个维度是个体与社会利益的协调。第一个维度，个体之间的利益协调。“由于每个人的幸福都依赖于

一种合作体系，……因此利益的划分就应当能够导致每个人自愿地加入到合作体系中来，没有这种合作，所有人都不会有满意的生活。”^[8]“任何人的有意识的行为，按照一条普遍的自由法则，确实能够和其他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9]如数据资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某一主体的行为不涉及其他主体利益时，该主体的行为是自由的，否则，该主体行为的自由就必须受到应有的限制，此限制应是为了协调各主体之间的利益。数据资源应用过程中涉及多个主体，包括数据主体、使用主体、处理主体等，这些主体之间的利益如不能协调，将会导致某些主体的退出，进而影响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甚至会将数据开发和利用推向无序状态，最终使之失去社会价值。构建数据资源应用过程中各方利益的协调机制应从数据权利的归属入手，使各方主体的权利（利益）得到平衡，从而实现各方参与主体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科斯定理认为：“在市场交易成本为零的场合，法律对于权利的最初配置与效率无关，……法律在注重提高经济效率的意义上应当尽可能地减少交易成本，比如通过清晰地界定产权。”^[10]因此，数据权利归属是实现权利的最初界定。通过数据权利归属确定各主体的权利（利益），从而使各主体的利益达到平衡状态，进而推进数据开发、利用与相关技术的进步。第二个维度，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协调。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关系的协调是指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机制，即在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能使其社会利益为负数。“恰当制度的一个中心作用是在不同社会集团之间，……建立权势平衡，……才会出现基础广泛的持久经济发展。”^[11]数据在应用与开发过程中不仅应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还要保证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为追求个体利益而牺牲社会利益的做法是无法持续发展的，这就需要在社会利益和个体利益之间创建一种利益平衡机制。数据权利归属是创建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机制的基础，在此基础之上，权利与义务相匹配方可实现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协调。

（三）数据权利的归属能够激励数据开发和利用技术的发展

知识和技术的革新是任何时代经济增长的先决

条件。“但它本身并不是充分条件，它仅仅是一个潜在的、必要的条件。换句话来说，如果要使技术得到高效和广泛的运用……必须就得对制度作出调整和对意识形态作出改变，才能实现正确利用人类知识达到部分生产要素的革新”。道格拉斯·诺思认为：“产业革命不是世界经济增长的原因，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制度因素，特别是确立财产所有权的制度。因此，必须设立有效率的产权制，使个人的收益率与社会收益率接近于相等以刺激和促进人们去从事合于社会需要的活动。”^[12]目前数据开发和利用过程中所出现的个人数据安全与国家主权安全问题、企业数据纠纷基本都是权利归属不明确所导致的。当前，数据开发和利用过程中产生的纠纷在司法层面往往依据合同法、知识产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来解决，但现有的法律制度有着自身特定的立法目标和保护对象，因此无法实现数据纠纷裁决的公平与正义。最终绝大部分企业只能通过协商或求助于行业管理部门进行协调解决，导致企业在通过技术和内部控制维护自身权益方面承受了高昂的经营成本，极大地影响了企业的在数据开发与技术研发进行投入和积极性。^[13]保护和激励数据资源生产者和开发者积极性与创造性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确定数据权利归属，保护数据资源生产者和开发者权益，使数据开发和使用主体能够在数据资源和数据服务市场中真正实现自己权益，进而对数据开发利用的技术发展实现激励。

二、数据权利归属的可行性

（一）立法层面的可行性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确立了“数据”的独立性。《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了“隐私权”；《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明确了“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第一百二十七条“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其中又规定了“数据”的保护。因此，《民法总则》对“个人信息”“隐私”和“数据”进行了分别规定，即从法律层面进行了区分，故而“数据”是与“个人信息”和“隐私”区别的客体。《民法总则》已为“数据权利”预留了立

法空间，同时“数据”在法律层面已是独立于“隐私”和“个人信息”的客体，“数据”从立法层面可以成为权利的客体，数据权利就已成立。数据权利成立则应明确其权利的归属。

其次，《民法总则》确立了“数据”的财产属性。《民法总则》“民事权利”一章中，第一百二十七条的立法的选择是将“数据”和“虚拟财产”并列，表明两者具有相似性，隐含着立法对数据财产属性认可。对财产属性的认可，就意味着数据权利归属的可行性。财产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数据具有了财产属性，就要有其归属主体的问题。

再次，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公开其收集、使用规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规定，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要经消费者同意，这就意味着个人信息的权利归属于信息主体，并不归经营者。

第四，《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二条“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毁损、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规定，网络运营者收集的个人信息和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必须经被收集者同意。通过此项规定也可推论出个人信息的权利归属于信息主体而非网络运营者。

（二）数据权利决定了数据的归属的可行性

“凡权利均有其主体”^[14]，没有主体就没有权利的存在。人为权利的主体，分为自然人与法人。^[15]研究数据权利的归属就是研究数据权利的所有者。数据权利的成立是数据权利的归属的充分必要条件。数据是否能够符合权利结构客体的特征，决定了数据权利是否能够成立。权利结构是由权利主体、权利内容、权利客体组成。权利客体范围随着

社会发展而变化，“产权界定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水曾经是免费物品，但是今天水的产权被顺利接受”^[16]。权利客体是权利内容指向的对象，或是权利行使所及的对象，它说明享有权利的主体在哪些方面可以对外在的客体（物质客体或精神客体）做出某种行为或不做出某种行为。这种对象始终与权利本身共存灭，是权利主体之间发生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媒介。权利的类型是由权利主体和权利客体来决定的。数据权利就是新权利客体“数据”的出现而产生的。数据权利的成立应有其主体和客体，主体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客体是数据^①。客体“数据”是否具有权利客体“存在于人体之外”“数据具有确定性”和“数据具有独立性”的特征决定了“数据”能否成为权利的客体。首先，数据存在于人体之外。数据是对事实、活动的数字化记录，具有独立性，形式多样，且存于人体之外。^[17]其次，数据具有确定性。确定性是指民事主体对客体的独占和控制。数据不具有实体性，导致数据权利主体无法通过像对待物那样实际占有、控制和利用数据，也无法通过与他人的约定来对抗第三人的占有和享用。因此，其独占性可以比照知识产权。^②再次，数据具有独立性。民事客体是民事权利的附着对象，它必须是能被实际控制并能划分他人利益界限的独立载体。客体具有独立性是构成民事权利的一个要素。数据的客体与知识产权的客体都是无体物，知识产权客体独立性的实现是通过法律赋予其独立性，而不是以承载“知识”的载体来确定“知识”的独立性。数据本身的呈现形式是“比特”，数据所承载的内容是事实和活动。因此也可以通过对一定地域范围内全体社会成员有约束力的共同约定即法律规定的办法来控制对数据的占有和使用的制度——数据法。^[18]因此，“数据”权利成立，这就决定了数据归属的可行性。

（三）数据权利的财产权属性决定了数据归属的可行性

财产权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权利(权力)，是一种主体对客体享有的受法律保护的支配力。财产权的结构是主体、客体和内容。没有主体的权利是不存在的，财产权是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罗纳德·科斯认为，真正的财产权的含义是权利，是

主体实施一定行为的权利。^[19]财产只有能够被主体所控制，才能成为现实的财产，“物仅仅是权利的标的，无任何人享有权利的物根本就不是财产”。^[20]数据权利无论是在法学理论中还是在社会实践中都具有财产权属性^[21]。如果数据权利具有财产权属性，那么数据权利就有其归属的主体。数据权利是否具有财产权属性决定了数据归属的可行性。根据财产权的概念^③，如果数据权利满足具有经济价值、权利可以转移和以财产为客体的条件就具有财产权属性。“首先，数据权利具有经济价值在我国数据应用和发展过程中是不争的事实。”实践中，贵阳数据投行有限公司对北京舆讯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数据投资，以价值200万元的数据使用权为代价，取得了舆讯科技15%的股权。《民法总则》第一百二十五条“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股权和其他投资性权利”的规定表明股权是民事权利，具有财产属性。因此，数据与股权进行对价充分证明了数据的经济价值。^[22]“其次，数据权利可以转移。”2014年2月以来，我国地方共建立了57家数据交易所（数据交易中心），还出台了地方交易规则。这些交易场所的运行及交易规则，充分证明了数据权利是可以转移的。再次，数据权利客体具有财产属性。

《民法总则》中“民事权利”一章第一百二十七条写道：“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其中的立法选择是将“数据”和“虚拟财产”并列，表明两者有相似性，隐含着立法对数据财产属性认可。第四，经济学理论中“财产”的属性应当包括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目前数据已作为商品在各地方数据交易平台进行交易，这足以证明数据具有交换价值。数据的使用价值更是比比皆是，如利用数据分析进行的精准营销和定向营销使营销成本大大降低，政府对数据分析的应用成为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等。美国是将个人数据信息以财产权规制的典型代表。其基本理念是个人数据信息（包括其中的隐私利益）可以被视为财产得到保护，这是一种从下至上的理念。个人应该享有其个人数据信息，且作为财产所有人应该有权控制对其个人数据信息的使用。^[23]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说明“数据”是财产；另一层是赋予“数据”财产权利。数据本身的财产属性已毋庸置

疑^[24]，数据是财产就要有其归属的主体。“从数据既然是财产，数据权利又是财产权利，因此数据主体就应对其数据资源自由行使权利而不受他人干涉。”

三、数据权利的归属——私人模式

权利归属模式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权利无所有人模式；第二种权利归属于私人模式；第三种权利归属国家模式。数据权利归属模式应以最有利于实现数据安全和国家主权安全、数据资源开发和利用以及数据开发利用的技术发展为选择标准。数据权利归属不能设定为无所有人模式。无所有人模式是一种拒绝任何主体占有、使用、处理和收益的模式。“这是一种资源的不开放体制，拒绝人类对特定资源的使用。”^[25]数据资源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如果拒绝人类开发与利用将严重影响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这种模式将是不可取的。另一种情况是任何主体都可以对数据资源无条件地占有、使用、处理和收益。这就会出现对数据资源无序开发和利用的状态，最终导致数据资源的枯竭。数据权利归属也不宜设定为属于国家模式。

权利归属于国家模式会造成无法调动社会主体对数据开发利用的技术进行研发的积极性、无法释放数据对经济发展及其自身的效用、无法发挥市场机制对数据的有效应用的激励作用的情形。数据权利归属可以采取私人模式。此种模式是最有利于数据安全、国家主权安全、数据资源开发和利用以及数据开发利用技术发展的模式。“私有权制度在特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条件下适应着人们的合理求利的本能要求，从而激发了人们的为求利而充分发挥自己的各种潜能，尤其是激发了人们的科学创造性和劳动积极性。”^[26]数据权利的归属选择私人模式既符合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也符合数据客体所具有的属性和特征，更有利于个人数据保护，同时能够建立激励其开发利用及技术发展的有效机制。

首先，从数据财产权属性的角度，数据权利应属于私人模式。数据权利归属于私人，即归属于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等主体所有。数据权利财产权属性决定了数据权利应属于私人模式。亚里士多

德认为，“财产……一般而论则应属私有。划清了个人所有利益的范围，人们相互间争吵的根源就会消除”^[27]。数据权利归属于私人有利于个人数据的保护，也有利于避免数据的无序开发和利用，能够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促进数据经济的发展。“各人注意自己范围以内的事业，各家的境况也就可以改进了。”^[28]“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物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物，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物；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物。人们要是认为某一事物已有别人在执管，他就不再去注意了，在他自己想来，这不是对那一事物特别疏忽；在家庭中，情况正是这样，成群的婢仆往往不如少数侍从为得力。”^[29]“私人产权的决定性特征是，一项财产的所有者有权不让他人都拥有和积极地使用该财产，并有权独自占有使用该财产时所产生的效益”^[30]。数据私人产权就是让数据所有者有拥有和积极地使用该财产，并有权独自占有和获得该财产时所产生的收益，只有如此模式的选择才能实现个人数据的安全、国家主权安全、数据的有效开发利用以及其技术的发展。其次，从数据具有人格权属性决定了数据权利应属于私人模式。从数据实践中所呈现的内容看，自然人的数据包括姓名、身份证号、家庭住址、信用状况、运动轨迹、各类证照号、收入、爱好等方方面面。这些内容能够体现其人格尊严和自由意志，属于人格权的内容。尤其在实践中的人脸识别，人脸就是肖像，肖像属于人格权。因此，数据如具有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的内容，就具有人格权的属性。^[31]人格权是主体依法所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为维护主体的独立人格所必备的权利。依法所固有是指人格权是由主体始终享有的权利，与主体不可分离，除非主体死亡或终止，则主体所享有的人格权不复存在。^[32]因此，数据权利既然具有人格权属性就应归属数据主体，这样才能不违背数据具有人格权的属性。

四、数据权利取得

权利的取得的实质是权利与主体的结合，即数

据权利的归属。权利主体是权利的享有者，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数据权利主体是数据权利的享有者，包括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主体取得数据权利根据传统法学理论中的权利取得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原始取得是指不以他人既存的权利为前提的取得，如先占；继受取得是指以他人的既存权利为基础的取得。继受取得可以适用于数据权利的取得，如实践中的各地方数据交易所通过数据交易所获得的数据权利就属于继受取得。原始取得的先占不适用于数据客体资源。首先，数据客体符合经济学意义上“公共产品”的两个特征：一是非竞争性的消费；二是杜绝搭便车的成本很高。这两个特征决定了数据的共享性。数据共享是指同一数据可以同时存在于不同的空间，可以被不同主体占用和使用，而且互不影响，这就是“公共产品”的无损耗性、可复制性。数据的可复制性、可传播性和无形的共享性决定了如按传统法学理论适用原始取得的“先占”，会降低数据开发和应用的最大效益，导致资源的浪费。其次，数据权利具有人格权属性，人格权是主体依法所固有的、以人格利益为客体的、由主体始终享有的权利，与主体不可分离，除非主体死亡或终止。因此数据权利不能按传统的法学理论原始取得“先占”。数据权利的取得应符合数据权利的人格权属性、公共产品属性，进而发挥数据生产要素的最大效用。

(一) 个人信息数据权利归个人数据主体

个人信息数据是属于个人的数据。个人数据是指对自然人的事实、活动的数字化记录，具有独立性、多样性、无体性。数据通常由呈现为非物质性的比特（bit）^④构成。个人数据包括个人信息^⑤的数据和非个人信息的数据。个人信息的数据是指个人信息的数据化。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通过与其他信息的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个人信息的范围涵盖较广，姓名、住址、电话号码、社会账号、驾驶证号、金融账户号码、生物数据等都属于个人信息。^⑥非个人信息数据是指数据自身，以及与其他信息结合不能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如脱敏后的个人信息。这两种数据权利的取得依据是不同的。

个人信息数据权利归个人数据主体所有。首

先，个人信息数据归个人数据主体所有是建立在保护人格权的基础之上的。个人信息数据具有人格权属性，这就决定了个人信息数据权利归个人数据主体所有。第一，人格权不需人格主体实施一定的行为来取得，而且是否取得人格权与公民的年龄、智力、社会地位等方面都无关。因此，个人信息数据归个人数据主体所有，并赋予其支配权。第二，个人信息数据权利归个人数据主体所有，才能实现对人格权的保护。个人信息数据权利只有归属个人数据主体所有，才能实现不必借助于他人的积极行为即可行使人格权，只要义务人不加妨碍和侵害，人格权就可以实现，实现人格权的对世权^⑦和支配权^⑧，并有权禁止他人妨碍其人格利益。第三，人格权为专属权。专属权是指专属于某特定的民事主体的权利。专属权表现在人格权与权利主体是不可分离的，人格权只有权利人才能享有，因此，只有个人信息数据权利归个人数据主体所有，才能实现人格权的专属权。假如个人信息数据不归数据主体而是归数据控制者所有，就会出现数据控制者依法收集和利用的个人数据被盗用、滥用时个人数据主体的人格权受到侵害而无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情形。

其次，个人信息数据归个人数据主体所有是建立在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基础之上。《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对个人信息保护作出了规定，肯定了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因此，此种权利归属可以更好地保护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

再次，依据《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数据归数据主体所有。《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并经被收集者同意”^⑨。第四十二条“……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⑩。第四十三条“个人发现网络运营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其个人信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删除其个人信息；发现网络运营者收集、存储的其个人信息有错误的，有权要求网络运营者予以更正。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措施予以删除或者更正”。第四十四条“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第四十五条“依法负有网络安全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必

须对在履行职责中知悉的个人信息、隐私和商业秘密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因此，个人信息数据应归属于个人信息数据主体。

第四，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个人信息数据归数据主体所有。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并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⑪规定，个人信息数据归属于个人信息数据主体。

（二）非个人信息个人数据与非个人数据权利归属于投资（时间、金钱、人力等因素）主体

非个人数据可以自由获取、使用，且不需要承担法律上不利后果的数据，主要包括国家机关公开的信息、具有公益性质的企事业单位涉及公众利益或知情权的信息、其他组织中非涉密信息和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个人信息。^⑫非个人信息数据与非个人数据权利已经都不具有人格权属性，仅仅具有财产权属性。这两种数据财产都属于无形财产，无形财产没有有形的客体，主体不能直接实施支配，可以无成本或低成本的无限复制，是保护主体对客体的控制、支配和使用而不是占有。因此数据无形财产的权利归属应围绕其特征来进行权利的配置，既要符合财产属性、人格权属性和国家主权属性，又要符合无形的特征，同时能够促进相关主体和社会利益的协调，实现各利益主体最大化。此类数据应归属于能够使其价值最大化的使用者和为其生产、开发投入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主体。归属于价值最大化使用者的依据是科斯定理中的“在市场交易成本为零的场合，法律对于权利的最初配置与效率无关，……法律在注重提高经济效率的意义上应当尽可能地减少交易成本，比如通过清晰地界定产权，通过使产权随时可以交易，……在法律即使尽了最大努力而市场交易成本仍旧很高的领域，法律应当通过将产权配置给对他来说价值最大的使用者，来模拟市场对于资源的分配。”^[33]其次，非个人信息数据和非个人数据权利归属应遵循洛克的“劳动生产”理论赋予其财产

权，如非个人信息数据权利归属应以“劳动生产”理论赋予其财产权。非个人信息数据和非个人数据权利归属于在其生产、开发过程中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①的主体具有正当性和公平性。如不赋予数据的生产、开发主体财产权，就会对数据的生产、开发、应用及相关技术的发展失去激励作用，使数据资源失去战略意义。“……他的身体所从事的劳动和他的双手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可以说，是正当地属于他的。所以只要他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他就已经掺进他的劳动，在这上面参夹他自己所有的某些东西，因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既然是由他来使这些东西脱离自然所安排给它的一般状态，那么在这上面就由他的劳动加上了一些东西，从而排斥了其他人的共同权利。”^[34]同时，洛克也提出了劳动获得私有权是要受到一定的前提条件限制的，即每个人获取自然物为私有财产以供其享用为限。“同一自然法，以这种方式给我们财产权，同时也对这种财产加以限制。……但上帝是以什么限度给我们财产的呢？以供我们享用为度。谁能在一件东西败坏之前尽量用它来供生活所需，谁就可以在那个限度内以他的劳动在这件东西上确定他的财产权；超过这个限度就不是他的份所应得，就归他人所有。”^[35]欧盟于1996年提出了《关于数据库法律保护的指令》（以下简称《指令》），用以直接保护因不符合独创性标准而无法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数据库。《指令》第一条规定，数据制作者对其经系统或有序地安排，并可通过电子或其他手段单独加以访问的独立的作品、数据或其他材料的集合，可以享有特殊权利的保护。具体而言，这是一种独立意义的专有财产权，为期15年，只要数据库制作人在内容收集、核准和提供等方面上有实质性投入，数据库制作人就可以获得这种特殊权利。^[36]这种权利以实质投入为条件，且有排他性特征。

注释

① 权利结构是由权利主体、权利内容、权利客体组成。权利主体是享有权利的人。权利的内容是特定的行为，是权利人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以自己或他人的作为和不作为的

方式实现权利的过程。权利客体是权利内容指向的对象，或是权利行使所及的对象，它说明享有权利的主体在哪些方面可以对外在的客体（物质客体或精神客体）作出某种行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

- ② 知识产权的独占性是指法律仅赋予知识产权所有人行使知识产权中的各项权利。知识产权所有人可以自己行使，也可以授权他人行使。但他人未经其许可则不能擅自行使。有形物和无形物的独占性内涵与外延是不同的，且其实现的方式也是不同的，有体物的独占性是通过对物的占有来实现的，占有、使用，其他人不能盗窃、破坏，但可以模仿、复制。无体物的独占性的实现主要是未经所有人的授权，其他人不能商业性地制造、使用、销售、进出口、模仿、复制。因此数据的独占性可以通过法律实现其独占性，如欧盟数据可携带权。欧盟数据可携带权规定权利主体有权就其被收集处理的个人数据获得对应的副本，并可以在技术可行时直接要求控制者将这些个人数据传输给另一控制者。这就是通过对数据的收集和处理数据的控制者，通过法律以规定其义务的方式赋予数据主体对其自身相关的数据拥有控制性的权利。
- ③ 财产权是以财产为客体的权利。其特点是权利直接体现经济价值和权利可以转移。
- ④ 所谓比特，通俗理解为事实和活动的数字化存在形式。这一媒介特性意味着，数据不再需要具体物作为物质载体（如知识产权载体的书、电视等），它的载体是符号（符号载体），只需要相应的数字化系统工具加以呈现，使得人的认知思维可以直观识别。
- ⑤ 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址、电话号码等。
- ⑥ 《网络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5项。
- ⑦ 如何人均对权利人负有不得侵害的义务。
- ⑧ 所谓支配权是指权利人有权对客体直接支配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
- ⑨ 《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一条 网络运营者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公开收集、使用规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被收集者同意。网络运营者不得收集与其提供的服务无关的个人信息，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个人信息，并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

- 的规定和与用户的约定，处理其保存的个人信息。
- ⑩ 《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二条 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毁损、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 ⑪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九条 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围，并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收集、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应当公开其收集、使用规则，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双方的约定收集、使用信息。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经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信息安全，防止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信息泄露、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经营者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者请求，或者消费者明确表示拒绝的，不得向其发送商业性信息。
- ⑫ 《网络安全法》第四十二条 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网络运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确保其收集的个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毁损、丢失。在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个人信息泄露、毁损、丢失的情况时，应当立即采取补救措施，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 ⑬ 通过资本投入，如数据存储设备购置或租赁、数据采集与数据清洗等需要大量的经费和人力投入。
- [4] 迈克尔·D. 贝勒斯. 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 张文显, 等, 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90.
- [5] 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 等, 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9. 293.
- [6] 江平. 民法学[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1:29.
- [7] 张文显. 法哲学范畴研究[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336.
- [8] 约翰·罗尔斯. 正义论[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15.
- [9] 康德. 法的形而上学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1:40.
- [10] 波斯纳. 法律理论的前沿[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7.
- [11] 柯武刚, 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3:362.
- [12] 柳适, 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讲演集[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98:534.
- [13] 龙卫球. 再论企业数据保护的财产权化路径[J]. 东方法学, 2018(3):50–61.
- [14] 王泽鉴. 民法概要[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45.
- [15] 王泽鉴. 民法概要[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45.
- [16] 霍斯特·西伯特. 环境经济学[M].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97.
- [17] 李爱君. 数据权利属性与法律特征[J]. 东方法学, 2018(3): 66.
- [18] 李爱君. 数据权利属性与法律特征[J]. 东方法学, 2018(3): 67.
- [19] 刘伟, 李风圣. 产权通论[M]. 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8:77.
- [20] 尹田. 法国物权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8:55.
- [21] 李爱君. 数据权利属性与法律特征[J]. 东方法学, 2018(3): 68.
- [22] 李爱君. 数据权利属性与法律特征[J]. 东方法学, 2018(3): 68.
- [23] 吴伟光. 大数据技术下个人数据信息私权保护论批判[J]. 政治与法律, 2016(7). Litm an. Jessica. Information Privacy/infamyatian Property.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218274>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218274>. P5. 2016年3月27日访问。

参考文献

- [1] 迈克尔·D. 贝勒斯. 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 张文显, 等, 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89–90.
- [2] 科斯. 企业、市场和法律[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1990:95.
- [3] 迈克尔·D. 贝勒斯. 法律的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M]. 张文显, 等, 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6:89.

- [24] 李爱君. 数据权利属性与法律特征[J]. 东方法学, 2018(3):68. 2002:215.
- [25] Jan Hancock.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Power, Ethics, and Law[M]. Aldershot: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Press, 2003:137-138.
- [26] 张恒山. 法理要论(第二版)[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383.
- [27]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涛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54.
- [28]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涛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54.
- [29]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吴涛彭,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5:48.
- [30] 柯武刚, 史漫飞. 制度经济学[M]. 北京:商务印书馆,
- [31] 李爱君. 数据权利属性与法律特征[J]. 东方法学, 2018(3):69.
- [32] 李爱君. 数据权利属性与法律特征[J]. 东方法学, 2018(3):69.
- [33] 波斯纳. 法律理论的前沿[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7.
- [34] 洛克. 政府论(下)[M]. 叶启芳,瞿菊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19.
- [35] 洛克. 政府论(下)[M]. 叶启芳,瞿菊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4:21.
- [36] 龙卫球. 数据权利属性与法律特征再论企业数据保护的财产权化路径[J]. 东方法学, 2018(3):54.

On the Attribution and Acquisition of Data Rights

Li Aijun

Abstract: The study of data rights attribution i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ose the data is". The attribution of data rights is the core issue of data rights protection. Without solving the problem, we cannot truly protect data rights, let alone inspire the effective use of data and stimulate the research of data utilization technology. To confirm the attribution of data rights is to confirm the initial rights of data asset, which aims at maintaining the market order for data production, collection, storage, trading, regulation,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stimulating people's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in utilization of data technology, safeguarding personal interests, public interests and national interests in data rights, and providing legal theory support for data security legislation.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e attribution of data rights with the core of the coordination of the interests of all parties in the process of effective utilization of data resource and the impet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data technology. There are three aspects to prove the feasibility of data rights: the legislative perspective, the theory of the right structure and the property nature of data rights.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ta itself, the article suggests a private mode of data rights attribution and the path of data rights acquisition.

Key words: data rights; data rights attribution; private mode of data rights attribution; data rights acquisition

我国数据立法的GDPR启示 ——对欧洲数据治理模式的反思

栾 群

摘要: 随着数据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数据治理成为当前的紧迫任务。立法是制度建设的最高形式,数据立法日益受到重视。欧洲数据立法GDPR成为当下我国学习的目标,但实施以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应当全面看待欧洲这种以基本权利为基础的数据治理模式。我国采取地方数据立法先行先试的做法,在之前信息化和大数据行业发展政策实践基础上发展出细分领域立法。我们应当秉持创新和务实的态度,根据我国产业发展实际推动数据治理和相关立法。

关键词: GDPR; 数据治理; 大数据产业

中图分类号: D9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 (2020) 01-0099-10

一、问题的提出

1992年,28位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该委员会在1995年的报告中阐述了“治理”(Governance)的概念,认为“治理”是公共或私人的个体与组织处理其公共事务的多种方式的总和。近年来,数字技术飞速发展,传统经济和社会发展被迅速网络化、数字化映射,数据治理(Data Governance, DG)也成为当前增长最快的学科之一。2016年4月,欧洲议会通过《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①,2018年5月在欧盟成员国正式实施,该法案对欧盟公民个人数据进行保护。很多学者认为GDPR“先进的”立法技术和治理观念,值得我国数据立法和治理借鉴。在新时代背景下,为更好发展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结合我国大数据相关产业发展和欧洲等发达经济体立法实践,有必要对数字治

理特别是立法进行一番检视。我们注意到,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和产业迅速兴起的同时,各种纠纷和案件纷至沓来,带来人工智能等新领域应用的安全风险及法律防控的问题,反映出产业技术进步与法治需求之间的矛盾。^②地方上如贵州、天津、海南、上海等地已出台数据治理方面的地方法规,全国“两会”很多代表、委员提出我国应加快制定数据立法^③,刚刚胜利闭幕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命题,有的学者又自然地将目光投向美国、欧洲立法经验借鉴。但实际上, GDPR实施以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也有所显现,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发展战略、数字经济及产业发展现状,不宜对其理念和规定盲目跟随。

二、正确看待GDPR的光亮处与阴暗面

(一) 积极意义与示范性

久久为功的数据保护立法。早在20世纪70年代,

作者简介: 栾群,男,河南项城人,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政策法规研究所所长,工业和信息化法律服务中心主任,法学博士,研究方向为行业法律、产业政策、数据治理、人工智能。

欧洲作为世界发达经济体就兴起了个人数据保护立法的浪潮。1977年，联邦德国在各州的立法基础上，制定了《联邦数据保护法》。1981年，欧洲议会通过了《保护自动化处理个人数据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有约束力的个人数据保护公约。1990年，欧共体委员会发布一揽子个人数据保护建议，其中最重要的是制定个人数据保护的指令框架草案。1994年，欧洲理事会起草了《欧洲与全球信息社会》报告，提出建立欧盟层面统一的数据保护制度，引起各国政府和产业界的广泛关注。1995年，欧盟制定了关于个人数据保护的《数据保护指令》（Data Protection Directive）95/46/EC，包含如何处理欧盟内部数据主体的个人可识别信息的条款和要求，适用于与欧洲进行相关业务的所有企业，而这也成为GDPR的雏形和基础。2010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个人数据保护的综合措施》，明确具体的数据保护举措，为后续立法探索积累了素材。2012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个人数据保护及促进个人数据自由流通条例草案》，《数据保护指令》改革大幕开启。正是由于欧洲各国对于个人数据保护长抓不懈的“执念”，最终才有了GDPR的问世。2016年公布的GDPR在第十一章附则第94条，废止了《数据保护指令》95/46/EC。

统一市场与保护权利的平衡。欧洲一直是国际政治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并且有着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1993年，欧共体达成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成立，这是欧洲在统一市场努力方向上最显著的成就。但从实质性上看，统一市场的目标才刚刚开始——进行顶层设计并且使制度落地才能真正实现统一市场的目标。^[2]面对新经济市场的全面数字化，GDPR成为统一数字市场的最有利工具箱。GDPR将欧洲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管辖范围延伸至所有处理欧盟居民信息的境外企业，一方面当然意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但更意在维护欧洲的统一市场。同时，GDPR对于数据权利保护的力度是空前的，如：没有充分的权利人的同

意来处理数据或违反了隐私保护要求的企业，将会被欧盟处以高达年度全球营业额的4%或2000万欧元罚款，且以二者中数字较高的为准〔第58（2）条〕。在GDPR生效不久意大利竞争管理局（ICA）调查发现，Facebook在用户注册时并没有明确告知用户他们的信息将被用于商业目的，以侵犯隐私对Facebook处以1130万美元的罚款。

数据权利的创设与创新。保护当事人权利，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加大侵犯权利的处罚力度——但也更加激进的是创设新的权利类型和内容。GDPR之所以广受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它迎合了经济数字化的趋势，在法律制度上创设了新型权利和权利内容，开数字立法先河而成为必然被模仿者。GDPR赋予了数据主体知情权（或通知权）、同意权、访问权、更正权、被遗忘权、可携带权（持续控制权）、反对权（限制处理权）、拒绝权、自动化自决权等广泛的数据权利，即把相关的机器决策和云端服务也纳入管辖范围，充分表彰了数据主体的意志自由。^[3]同时，还从企业强化法定义务的角度加以补漏和巩固，明确了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应尽到采取合法、公平和透明的技术和组织措施保护数据权益的法定义务，以及履行对监管部门及数据保护认证组织的法定义务。实际上，我国学者也敏锐地注意到了个人数据的民事权利问题，并从个人和企业两个维度上提出民法保护的设想。^[4]与GDPR不同的是，我国数据立法在前期积累、权利体系甚至立法技术及数据观念上都与其有较大差异，但这并不影响GDPR的启示性。

另外，根据《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288条第2项，指令（Directive）虽然也具有约束力，但需要各成员国再转化为国内法，而条例（Regulation）则不然，具有在成员国直接适用的法律效力。所以，可以看出GDPR条例代替了95/46/EC指令，实际上的效果是不需经过欧盟成员国立法转换成各国法律，而可直接适用。这就在立法技术上，较好地解决了维护欧洲统一市场和加强数据权利保护的双重目的。

表1 GDPR的文本结构

章节	标题	主旨内容
第一章	一般规定（第1—4条）	主题、目标、适用范围、地域范围、定义
第二章	基本原则（第5—11条）	相关原则、合法性、同意要件、特殊种类规定
第三章	数据权利主体（第12—23条）	透明度、数据获取、纠正和删除、拒绝权、限制
第四章	数据控制和处理者（第24—43条）	基本义务、数据安全、评估咨询、保护专员、认证
第五章	个人数据传输（第44—50条）	基本原则、充分决定、约束性、未经授权的传输
第六章	监管机构（第51—59条）	监管机构独立性、权限、任务
第七章	合作与协调（第60—76条）	合作、一致性、欧盟数据保护理事会
第八章	补救、责任、处罚（第77—84条）	控诉的权利、司法救济的权利、赔偿、处罚
第九章	特定情形处理（第85—91条）	信息及形式处理、官方文件、科研、保密、宗教
第十章	委托与实施（第92—93条）	委托权、实施行为
第十一章	附则（第94—99条）	废除第95/46/EC号指令、与在先缔结协定之关系

来源：作者根据互联网资料版本整理，<https://gdpr-info.eu/>

（二）消极影响评价要点

GDPR实施以来，在落实过程中也暴露出了执行层面的一些困难和立法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笔者总结主要有四：

一是数据全流程保护要求过高。GDPR几乎囊括了所有能保护的数据环节：企业的数据收集、处理、存储、流动（交易和共享）、销毁等行为，要符合数据安全、咨询评估、机构人员配备及评测认证的各方面要求，要符合合法透明、目的限制、最小范围、准确性、存储限制、完整和保密、儿童信息处理等各种原则精神。如果不考虑经济发展，这几乎是完美的规定，但如果考虑企业经营和执法机构实际情况，完全做到则成本太高。内容“应景”并不意味着就是一部好的法律，关键要看与现实的契合度——企业和消费者的接受和落实程度。

二是新权利加入影响权利体系。GDPR按照大陆法系传统，通过明确赋予主体权利，加强对个人数据保护。如访问权、更正权、知情权（获通知权）、被遗忘权、反对权（限制处理权）、可携带权（持续控制权）、拒绝权等。数据权利名目增多，既是“权利本位”思想膨胀的直接表现，也是英美法系对大陆法系渗透的结果，在客观上复杂化了原来民事权利体系的内容。如被遗忘权与信息自

由权的内在冲突，就亟待法学和经济学的论证。^③

三是处罚过严，不利于中小企业。如根据GDPR第58（2）条的规定，2000万欧元的行政罚款或全球总营业额4%的罚款，两者取较高的数额予以处罚。这是一种非常严苛的规定，一般中小企业根本无力承担。除了上述意大利ICA处罚Facebook，还有如2019年1月法国的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CNIL）根据GDPR裁定，谷歌因使用数据时未能保持透明，且由于个性化广告缺乏法律依据，被处以5000万欧元处罚。这种额度的处罚，甚至远超大多数中小企业的营业额。但是，谷歌后续的业绩并未因受处罚下降而是保持增长。客观结果表明GDPR的严格要求对大企业的影响有限，反而替大企业阻挡甚至消灭了一大批有潜力的中小企业竞争者。^[5]

四是影响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2018年11月报告显示，GDPR实施半年，欧盟企业的融资总额、融资交易笔数以及每笔融资交易金额均大幅减少，新兴、年轻和成长阶段企业每笔交易融资额分别缩水27.1%、31.4%和77.3%。^[6]这些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的下降，将直接影响研发投入的增长，说GDPR戕害创新亦不为过。而对于有些数字产业，特别是基于互

联网发展起来的产业，如网络直销、信用科技、定向广告等，以及近两年兴起的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行业，可以说是被直接掐住了数据的“脖子”。^[7]

（三）GDPR的历史成因简论

GDPR的影响有正面也有负面，总之影响很大。让人好奇的是，为什么GDPR最终出现在欧洲而不是美国或中国呢？除了上述数据保护立法自身的演进外，从历史上看，欧洲是世界近现代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一贯有保护权利的传统。早期的如英国1689年和1789年的两部《权利宪章》，还有1836—1848年的“大宪章运动”，法国1789年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更近的如1953年的《欧洲人权公约》，2007年的《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等，可以说欧洲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权史。特别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经历，作为主战场的欧洲甚至可以说这种崇尚人权、保护权利的意识已经根深蒂固。所以，欧洲在数字化过程中，也必不可少地加入了权利保护的意识，数据立法中体现数据权利强保护也显得自然而然。GDPR制度设计是体现权利思维的典型作品，主要制度构建及实际影响对于涉欧企业数据合规确实提出不小的挑战——这极有可能是欧洲立法者有意为之。当然，还有欧洲的法系传统影响，这一点也不可忽视。如对个人权利法律化、为权利保护提供统一模式、促进欧洲大陆保护标准统一等，这是欧洲罗马法系的特质，恰恰表现出了正宗的大陆法传统基因。最后也最重要的是，现在欧洲产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既是欧洲统一市场建设在意识领域的成就，也是一种现实考量。当欧洲人意识到自己真的缺乏互联网企业——事实上世界互联网企业前20强都不在欧洲——制定较为严格的监管规则，对欧洲而言（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最优策略选择。^[4]

三、我国数据立法的探索、演进与问题

（一）数据立法地方实践情况

“法者，治国之重器；良法，善治之前提。”

国家立法兹事体大，困难程度不言而喻。但是，正如自动驾驶立法一样，当产业技术基础已有一定的成熟度和可行性，由于地方和企业有着现实的指标考核和发展压力，等不及漫长的所谓“立法平衡”，如果国家层面立法短期内（年度）进展无望，就会有地方立法“先行先试”。^[5]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数字经济成为储备和开发新动能的重要领域和策源地，我国每年“两会”上关于数据立法的提案日益增多。但立法议题何其多，国家层面形成认识共识和制度妥协尚需时日的情况下，有些地方便又继续“先行先试”。

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新四化”），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2015年7月4日，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2015年8月31日，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至此，此三文虽然不是立法，但有了国家顶层设计性质的“红头文件”，地方就可以“名正言顺”开启数据立法的序幕。^[6]2016年1月15日，贵州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此为全国首部大数据领域的地方法规；2018年12月14日，天津市第十七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天津市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2019年8月1日，贵州省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贵州省大数据安全保障条例》；2019年8月2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1号公布《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2019年9月27日，海南省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海南省大数据开发利用条例》。纵览国家文件和地方立法，从国家信息化和大数据产业规划、地方性信息化立法实践基础上而生的地方性数据立法，演进路径非常明显。而且，很多立法工作往复反复，之前的信息化基础是当前立法的宝贵素材。

表2 数据立法指导性文件与地方立法实践范例

类别	序号	文件名	时间	内容
国家顶层设计	1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十八大报告）	2012年11月8日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建设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推进信息网络技术广泛运用。
	2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	2015年7月4日	加强法律法规建设。针对互联网与各行业融合发展的新特点，加快“互联网+”相关立法工作，研究调整完善不适应“互联网+”发展和管理的现行法规及政策规定。落实加强网络信息保护和信息公开有关规定，加快推动制定网络安全、电子商务、个人信息保护、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等法律法规。完善反垄断法配套规则，进一步加大反垄断法执行力度，严格查处信息领域企业垄断行为，营造互联网公平竞争环境。
	3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2015〕50号）	2015年8月31日	加快法规制度建设。修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积极研究数据开放、保护等方面制度，实现对数据资源采集、传输、存储、利用、开放的规范管理，促进政府数据在风险可控原则下最大程度开放，明确政府统筹利用市场主体大数据的权限及范围。制定政府信息资源管理办法，建立政府部门数据资源统筹管理和共享复用制度。研究推动网上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工作，界定个人信息采集应用的范围和方式，明确相关主体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加强对数据滥用、侵犯个人隐私等行为的管理和惩戒。推动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基础信息网络和关键行业领域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保护，保障网络数据安全。研究推动数据资源权益相关立法工作。
	4	《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工信部规〔2016〕412号）	2016年12月18日	成立跨行业大数据推进组织。支持成立跨部门、跨行业、跨地域的大数据应用推进组织，联合开展政策、法律法规、技术和标准研究，加强跨行业大数据合作交流。
地方数据立法	5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	2016年1月15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发展应用 第三章 共享开放 第四章 安全管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6	《天津市促进大数据发展应用条例》	2018年12月14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政务数据 第三章 社会数据 第四章 开发应用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六章 数据安全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7	《贵州省大数据安全保障条例》	2019年8月1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安全责任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四章 支持与保障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续表

类别	序号	文件名	时间	内容
地方数据立法	8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	2019年8月29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开放机制 第三章 平台建设 第四章 数据利用 第五章 多元开放 第六章 监督保障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9	《海南省大数据开发利用条例》	2019年9月27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大数据开发与共享 第三章 大数据应用与产业促进 第四章 数据安全与保护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附则
地方信息化立法	10	《北京市信息化促进条例》	2007年9月14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信息化工程建设 第三章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第四章 信息技术推广应用 第五章 信息安全保障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11	《山东省信息化促进条例》	2007年11月23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信息化发展规划 第三章 信息产业促进 第四章 信息工程建设 第五章 信息技术推广应用 第六章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第七章 信息安全保障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12	《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	2010年7月30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信息化规划与建设管理 第三章 信息产业发展 第四章 信息技术推广应用 第五章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第六章 信息安全保障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13	《广东省信息化促进条例》	2014年5月29日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信息化规划与建设 第三章 信息资源开发利用 第四章 信息技术推广应用 第五章 信息产业发展 第六章 信息安全保障和监管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来源：作者根据互联网资料整理

（二）地方立法的依据与问题

除了现实的产业基础和发展压力，地方都深切感受到当前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在整体性全局性制度突破尚待时日之际，中央对地方局部的突破也是有所期待的。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对中央和地方的立法权作出规定，对中央的专属立法事项作出列举性规定，对地方的立法事项作出原则性规定。另一方面，中央给地方立法空间鼓励在特定领域和事项上的先行先试。如2019年8月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明确鼓励深圳特区：“用足用好经济特区立法权，在遵循宪法和法律、行政法规基本原则前提下，允许深圳立足改革创新实践需要，根据授权对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作变通规定。”再如，2019年10月国务院《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五十五条明确规定：“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鼓励创新的原则，对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等实行包容审慎监管，针对其性质、特点分类制定和实行相应的监管规则和标准，留足发展空间，同时确保质量和安全，不得简单化予以禁止或者不予监管。”

应当说，贵州等地立法机关近年来在国家支持下，充分行使用好地方立法权，对大数据促进和管理法规进行了有益有效的探索，为各类主体共同营造良好的大数据产业发展环境，构建新型数据交易等活动规则，激活释放数据价值做出了尝试和示范。首先，地方数据立法实践，多是在国家顶层设计和省市区大数据产业规划或指导意见的基础上，所以有浓郁的产业政策因子。以全国领先的贵州省数据立法为例，不论是《贵州省大数据发展应用促进条例》，还是《贵州省大数据安全保障条例》，都离不开《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若干政策的意见》《贵州省大数据产业发展应用规划纲要（2014—2020年）》等产业政策基础。其次，地方性立法都立足于地方经济发展需求，所以多以产业促进法为基本定位。不论是贵州，还是紧密跟进的天津、上海、海南等地的数据立法，侧重开发利用、发展应用、共享应用等成为共同特点。^⑦第三，与GDPR相比，我国地方性数据立法明显走的不是“数据主体权利”的路数。各

地立法表述多是“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得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不得侵犯个人合法权益”的原则性表述，而至于“合法权益”究竟是哪些权利，如果被侵犯有什么法律后果和后续救济，则语焉不详、讳莫如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地方立法权限所致，另一方面也有立法技术的原因，以及政策导向有意为之的因素。

四、数字经济对制度创新提出新要求

（一）新经济需要负责任的数字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新月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对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全球治理体系、人类文明进程影响深远。中国正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⑧数字经济时代，对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是法治化、规范化，就必须要有新的制度创新原则。2019年6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发展负责任的人工智能》，提出了“负责任”的概念。数据是人工智能的原材料，实际上这也视为数据的治理原则。^⑨数字经济涉及技术创新、产业发展、信息安全、社会责任等诸多内容，应当着眼于构建我国新时代经济竞争新优势，围绕人工智能设计数据治理和数字化发展原则。

当前，我国数据合规的规范体系已初步建立。首先，网络安全法、电子商务法、侵权责任法、知识产权法、消费者法、广告法等法律对于数据领域，实际上已经有了原则性的责任分配方案。其次，2017年12月29日，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式发布《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2018年5月1日实施。仅半年后，2019年2月1日修订版《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草案）》就发布征求意见，其中GDPR的影响不容忽视。^⑩2019年年中，网络安全审查办法、数据安全管理办、儿童个人信息网络保护规定、个人信息出境安全评估办法等一系列规定征求意见稿发布，有的很快正式出台。2019年9、10月份以来，爬虫

风波导致众多大数据公司涉案，公安、工信等部门“净网2019”等专项行动“收获”颇丰，数百款APP因数据合规问题遭下架。“数据合规”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企业和个人守法的重点。但需要提醒的是，数字经济范围极其广泛，包括核心板块ICT产业本身，以及拓展板块ICT技术和产业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应用。在这些广泛应用中，数据的采集、存储、处理、应用、交易、出境、消除等环节是保持数字经济高速运转的关键，如果尺度不当会造成阻碍甚至倒退。^[8]

（二）数据立法应当创新恰当务实

法律制度的实施效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和水平。法律并非越严苛越好，历史上法律目的在执行中被异化的例子很多，如：为保障劳工收入，劳动法保护劳工，但企业主为了不触犯最低工资标准只好解雇劳工；为保护妇女婚姻法加强男方责任，却让男性择偶时更谨慎导致女性更难迈入婚姻；为减少蛇的数量规定捕蛇者得奖励，结果大家都养蛇换钱使得蛇数量不降反升；等等。^[9]同理，个人信息保护过分追求立法上的求新求全和处罚严苛，企业普遍做不到或付不起合规成本，则可能选择放弃该项业务或者消极应对。前者会导致消费者直接失去享受信息服务的机会，后者会造成法律目的异化。如消费者向数据公司申请获取了与自己相关的数据包，表面上看消费者的权利得到保障，但数G大小且杂乱无章的数据包对于个人的用处何在值得思考。再如《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修订，与GDPR相呼应的是要继续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其中删除了“履行合同必要”的无须征得授权同意情形，该项修订看似增强了数据主体权利，实际上增加了不必要的社会成本。^[10]笔者认为，制度设计应当避免想当然耳，立法还是做审慎务实的选择为宜。

立法如何做到务实？通常应当在避免民粹的情况下，更多倾听产业界的声音。特别要注意中小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巩固市场经济基础须支持中小企业发展，这符合国际通行惯例，既体现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的法定要求。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和互联网企

业业务创新，都面临数据的处置和合规问题，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等法律的规定，向欧洲“走出去”企业当然还是要符合GDPR的要求。中小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属于弱势群体，必须有宽松适度的制度环境利于其生存和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谷歌等大企业可以在承受高额罚款的同时高歌猛进，但更多的中小企业却极有可能因此而破产。立法者应当意识到，如果立法客观上制造“马太效应”，不利于众多中小企业，最终也将不利于市场健康持续发展。

（三）坚持探索中国数据治理方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党的中央全会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进行表述尚属首次，也足见对于数据资产的价值已经形成共识。反观GDPR的逻辑，个人数据已经成为企业的基本生产资料，那么个人的数据权利就应该是一种自然权利；对个人数据的滥用和侵害，侵犯的就不仅仅是无形财产权，还涉及人格和尊严。但是企业的数据合规不是立法一规定就完事那么简单的，后续需要有一系列的配套举措。如企业若不遵守或做不到数据合规要求的风险是什么，如何做这一类的风险评估，如何设立企业数据合规的规范体系，通过什么程序和必要制度、措施进行合规的执行，如何监督企业数据合规并进行必要的审计、信息公开和惩戒等，都需要花费巨大精力和成本；当然，同时也需要在法律上构建新型的数据财产权利体系，体现经济内容与运行规则的互动。^{[9][10]}《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及其配套的《个人信息安全规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等规定，民事主体已经有访问权、更正权、知情权、删除权、注销权、撤回权、明示同意权等权利。我国权利体系与GDPR虽不一一对应，但也自成体系。特别是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二分法”^[11]，成为不同于西方法律话语体系的一大特色。我们不可缺乏战略定力、朝令夕改，而应在已有基础上坚持完善我国的数据权利体系，甚至在数据财产性、权利客体性等基础理论方面提出中国观点和方案。^[12]

五、结语

目前，数据不仅已经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而且正对社会组织形式变化产生深刻影响，数字经济成为有别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的新的经济形态。当然，同时对数据治理特别是数据立法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挑战，需要在技术创新、产业发展、技术治理等多个维度上加强理论研究。^[13]数据立法应当做好国外经验借鉴和民族特色弘扬的平衡，做好数据权利设计和数据利益分配的协调，做好个人数据权利保护和企业数据业务发展的兼顾。欧洲产生GDPR立法有其历史、政治、文化等深层次原因，但最终的指向必然是数字经济发展，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认识。中国立法一直比较关注借鉴，但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更面临着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转型，所以未来数据立法更需要的可能是数据治理整体思路的廓清、立法技术和治理模式的科学精选、治理对象和数据内容的深入沟通。期待“政产学研用”等各方主体形成真正的数据治理共同体，戮力推动中国数据立法——着眼于未来竞争力构建，符合5G/6G通信、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的数据治理方案早日出台。

注释

- ① 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英文缩写GDPR，很多文章都翻译为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这一翻译很直观，但笔者认为译为欧盟《数据保护通用条例》更合适；或者可参考民国时期法学家的翻译，译作欧盟《数据保护示范条例》更好。但为了行文方便，本文采用大多数人使用的翻译方式。
- ② 此类新闻近年“两会”常会见诸报端，如参见赵晨采访朱山委员《建议加快推进大数据立法进程》，载《中国电子报》2019年3月15日第4版。
- ③ 大陆法系本有复杂的权利体系，做到内部统一和协调已属不易，何况日益增加新的权利类型和内容。如参见高富平、王苑：《被遗忘权在我国移植的法律障碍》，载《法律适用·司法案例》2017年第16期，第40页。文
- 章提出应当在基本权利层面讨论要不要移植“被遗忘权”，如“被遗忘权”已经被确立为公民的基本权利，那么它也不宜直接进入人格权法，而应采取一般人格权来保护被“被遗忘”法益。
- ④ 参见《现在全球排名前20强的互联网企业都是中美企业，这说明了什么？》，载科技奇视界公众号；《世界前20强互联网企业被中美垄断？为什么日本没有互联网巨头？》，载世界听平说公众号；张涛：《欧盟AI发展不起来的原因》，载搜狐网；何芊樾、周源：《欧洲为什么会被AI时代边缘化？》，载《财经》杂志。
- ⑤ 如国家层面上，交通运输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三部门联合发布《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规范（试行）》是在2018年4月12日。但地方显然等不及，所以在国家规定之前，2017年12月18日《北京市自动驾驶车辆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发布，2018年2月28日《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办法（试行）》发布，2018年3月11日《重庆市自动驾驶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发布，2018年4月13日《长沙市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管理实施细则（试行）》发布等。
- ⑥ 当然，地方数据立法的基础还包括之前信息化以及两化融合的众多基础。如2013年9月29日《信息化规划》（工信部规〔2013〕362号），2013年8月1日国务院《“宽带中国”战略及实施方案》，2012年5月4日《互联网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2011年4月6日《关于加快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的若干意见》（工信部联信〔2011〕160号）等。
- ⑦ 另外，如2019年10月《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立法起草项目正式立项，作者参与了前期论证讨论，特区数据立法的基本定位亦包括促进和规范两个方面，但显然促进法的意味更浓。
- ⑧ 参见2019年10月11日，《习近平向2019中国国际数字经济博览会致贺信》，载新华网。
- ⑨ 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原则，明确人工智能治理应该秉持八项基本原则：和谐友好、公平公正、包容共享、尊重隐私、安全可控、共担责任、开放协作、敏捷治理。
- ⑩ 修订版《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草案）》主要改动之处：区分基本业务功能和扩展业务功能，保障个人信息主体选择同意权；明确平台商对于接入的第三方产品或服务收集个人信息的管理义务；新增个性化展示及退出机制；细化个人信息安全事件报告制度；细化个人信息

- 控制者的组织管理要求；个人信息的汇聚融合。2020年版《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GB/T 35273-2020)于2020年3月6日公布，将于2020年10月1日正式实施。
- ⑪ 还有禁酒令的例子，苏联的禁酒令加速了解体，美国的禁酒令带动了黑帮产业壮大，印度禁酒令导致贩私酒、造假酒的人数量增多。所以，法律不是越严苛越好，而是应当符合经济文化需要。GDPR为大企业带来更多的竞争优势，这实际上背离了立法者的初衷。
- ⑫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句法谚的意义之一在于强调法律必须被执行，所有人的共同遵循才能维系法律实施下去，否则法律规定将毫无意义。GDPR的执行特别是域外执行，更是给无边界的互联网执法带来持久命题。参见李汶龙：《欧美网络法2019年度书评之一：长臂GDPR——域外执行与理念传播》，载DataLaws微信公众号，2020年1月11日。
- [3] 吴沈括.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与中国应对[J]. 信息安全与通信保密, 2018(6):13-16.
- [4] 程啸. 论大数据时代的个人数据权利[J]. 中国社会科学, 2018(3):102-122.
- [5] 许可. 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的周年回顾与反思[J]. 电子知识产权, 2019(6):4-15.
- [6] 王融等. 迷雾中的新航向——2018年数据保护政策年度观察[R/OL]. http://www.sohu.com/a/285519767_455313.
- [7] 姜奇平. 反对唯GDPR论[J]. 互联网周刊, 2019(6):70-71.
- [8] 栾群, 张浩. 新时代新经济需要负责任的数字化[J]. 可持续发展经济导刊, 2019(9):60-62.
- [9] 龙卫球. 数据新型财产权构建及其体系研究[J]. 政法论坛, 2017(4):63-77.
- [10] 龙卫球. 再论企业数据保护的财产权化路径[J]. 东方法学, 2018(3):50-63.
- [11] 李永军. 论《民法总则》中个人隐私与信息的“二元制”保护及请求权基础[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17(3):10-21.
- [12] 梅夏英. 数据的法律属性及其民法定位[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9):164-183.
- [13] 刘永谋. 构建审度的技术治理理论[J]. 民主与科学, 2019(5):52-57.

参考文献

- [1] 张敏, 李倩. 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风险及法律防控[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108-115.
- [2] 胡宝刚. 欧洲共同体内部统一大市场的基本目标及影响[J]. 安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4(4):57-59.

Inspiration of GDPR on China's Data Legislation ——Reflection on European Data Governance Model

Luan Qun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ata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data governance has become an urgent task at present. Legislation is the highest form of institution building, and data legislation is thus receiv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European data legislation GDPR has become the model of our country at present, but the negative effects since its implementation cannot be ignored, so we should take a comprehensive view on Europe's model of basic rights-based data governance. China takes the practice of local data legislation as the first trial and develops subdivision legislation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informationization and big data industry development policy. We should hold an innovative and pragmatic attitude and promote data governance and related legisla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rrent industrial development of China.

Key words: GDPR; data governance; big data industry

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研究

田庆锋 苗朵朵 张 硕 张 添 万海东

摘要: 在创新主体与创新要素的交互作用下,如何提高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整体效益,需要建立起规范化的评价标准体系。首先,从要素、主体和效益的视角出发,运用扎根理论方法探索出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理,并构建科技军民融合评价指标初始模型。其次,通过问卷调查法对收集到的样本数据进行信效度分析,判断指标构建的可靠性与合理性。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将因子载荷系数较小、成分结构出现偏差的指标予以删除,对初始模型进行修正与完善。再次,综合运用因子分析与层次分析法,对三级指标之间的权重进行逐级赋值,从而形成一套具备科学性、完整性与可行性的科技军民融合评价指标体系。最后结合研究结论,为我国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提出对策建议,以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经济建设需求和社会保障需求。

关键词: 科技军民融合; 评价指标; 影响因素; 作用机理; 扎根理论

中图分类号: E25;C9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447 (2020) 01-0109-11

一、引言

面对新时代下国家战略安全的需要,世界各国就创新引领军事科技革命开展新一轮的全球竞争。加强国防领域重大科技创新,扩展民用技术的军事应用前景,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效益提供支撑力量,已成为我国军民深度融合的重要战略目标。科技军民融合作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综合交汇点,决定着我国军民融合发展的规模、质量与效益,也代表着我国在基础科技领域与关键技术领域的综合实力。结合我国《“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专项规划》内容,本文认为科技军民融合指的是科技领域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汇聚各方创新主体力量促使科技要素充分流动和有机融合,从而支撑体制机制改革与能

力体系建设,以达到军事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军民融合重点领域。而如何有效发挥科技创新对军民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探寻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内在机理,提高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整体效益,亟须建立一套科学合理的科技军民融合评价体系。

从科学角度来看,军民融合的一切活动蕴含在评估体系和评估结果中。美国是较早推动军民融合的国家,并在实践过程中将构建军民融合评价机制作为一项重点工作。早在1994年,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即发表了《军民融合潜力评估》的研究报告,对美国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和民用科技工业基础结合的阻碍因素进行了分析。^[1]就国内而言,杜人淮^[2]、朱煜明^[3]等学者分别从不同视角对国防工业军民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系统分析。针对同一评估对象,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项目“新兴领域军民融合产业发展的机制和政策研究”(71841049); 西北工业大学创新种子基金项目(ZZ2019247、ZZ2019241); 西北工业大学发展战略研究基金“军民融合发展战略下高校协同创新的激励机制及对策研究”(2019FZY17)

作者简介: 田庆锋,男,山东成武人,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战略管理、军民融合; 苗朵朵,女,陕西榆林人,西北工业大学管理学院硕士生,研究方向为军民融合评价研究。

评估方法及工具的选择会对评估结果产生重要影响。^[4]就评价指标构建的研究方法而言,国内外学者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扎根理论法、案例研究法和模糊评价法^[5-8]等定性研究方法,以及DEA数据包络分析、ANP网络层次分析和主成分分析^[9-13]等实证研究方法等。总体来看,军民融合领域相关理论研究大多局限于基本内涵、构成要素、运行机理、对策分析^[14, 15]等方面,还未形成科学完善、整体协调的科技军民融合理论范畴与体系。并且,以文本资料为主的质性分析、以统计数据为主的数理分析还较为薄弱,未能对我国科技军民深度融合发展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因此,为了从整体层面对我国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水平做出评价,需要运用质性研究方法寻找并挖掘新的指标,并以大量调查数据和统计分析为支撑,不断完善评价指标体系。

二、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机理与影响因素研究

(一) 研究方法与设计

扎根理论方法是从原始资料中逐步提取出标签、概念、范畴,最终形成理论模型的质性研究方法,适用于现有研究不足或缺乏理论解释的情况。^[16]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是一项多主体协同下的综合性、复杂性工作,对其融合水平、融合深度以及融合效

果进行系统化的评价研究,不仅可以把握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基本态势,更能厘清科技军民融合的发展规律。并且,本文在四川省和西安市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过程中,掌握了大量关于军民融合发展和科技资源统筹的一手调研资料,这为研究问题的开展与扎根理论方法的应用奠定了良好基础。

考虑到研究样本需要具备典型性与代表性原则,本文主要通过参与会议论坛、梳理文献资料、实地调研访谈等几种方式进行数据获取与收集,资料类型涵盖规划纲要、总结报告、调研资料、访谈记录、媒体报道等。样本数据获取渠道的多元化决定了资料来源的可靠性,有利于对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水平进行全面分析与综合考量。

(二) 资料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阶段,需要对原始资料进行初步解读,并用贴标签的形式反映资料核心内容,同时将内容相似的标签进行概念化与范畴化。通过这种逐级分解的方式将资料抽象聚敛,形成初始范畴。基于上述原则,本研究最终得到349个标签、132个概念及40个初始范畴。

在开放式编码的基础上,主轴编码旨在通过聚类分析对范畴进一步总结概括,并建立起初始范畴之间的关联。在将原始资料逐步层次化的过程中,本研究将40个初始范畴归纳为13个副范畴与3个主范畴,如表1所示。

表1 主轴编码分析结果

初始范畴(40)	副范畴(13)	主范畴(3)
组织管理体系的完备性、内部机制改革的完整性、工作推进机制的有效性、成果转化体系的专业性	体制机制	融合基础
政策宣传与引导力度、政策普惠与保障水平、制度建设与完善程度	政策制度	
多方协同主体合作水平、新兴领域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合作	
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化、人才引进政策制度化	人才队伍	
市场导向的原则性、市场主体的能动性、供需市场的平衡性、国内外市场的兼容性	市场环境	
科技基础设施的开放化、创新示范平台的协同化、技术交易平台的服务化	平台建设	
专项基金支持的规模化、企业融资渠道的多元化、知识产权管理的制度化	金融服务	
军工保密机制的协调性、企业文化内涵的兼容性、管理运行机制的前沿性	军转民能力	
军品生产资质受理情况、军工项目研发生产能力、军方需求信息获取能力、军工配套产业协作水平	民参军能力	
技术标准的通用化程度、军地交流的信息化程度、科技资源的共享化程度	军民两用程度	
地方产业发展能力、区域科技创新能力、重大项目建设能力	经济效益	融合效益
军地思想统一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军队保障社会化、国防动员一体化	军事效益	
民生保障体系专业化、科技生态环境人文化	社会效益	

在选择性编码阶段,本研究通过“将融合基础中的要素条件应用于多主体,使融合深度纵向拓展,最终达到高效益的目的”这一逻辑思路,将核心范畴定义为“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机理”,并构建了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机理的概念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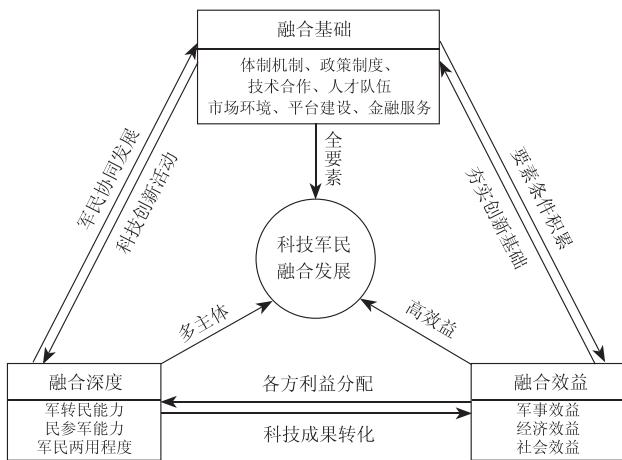


图1 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机理模型

(三) 模型阐释

1. 基于要素层面的融合基础

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是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保障要素,决定着各组织机构的管理权限,也决定了创新主体工作开展及推进的方向。军民融合战略涉及到国家各个区域的发展和军地双方的利益,需要做好管理层面的顶层设计。对组织外部而言,通过建立领导机构深化体制改革,可以在宏观调控下做好各项改革任务的统筹协调工作,发挥其引领作用。对组织内部而言,体制改革不仅是其适应市场发展速度、落实政策任务的前提条件,更是国有军工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然要求。科技军民融合是一项政策引导下的战略任务,对政策文件的解读是开展相关任务的前提。同时,政策制度也是各个主体组织相关活动的外部驱动和基础保障,发挥着引领示范作用。因此,提高政策扶持力度,完善政策法规制度,规范市场准入机制,才能形成动态有序的政策制度创新环境。

技术合作和人才队伍是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创新要素。一直以来,技术创新作为科技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是企业、科研院所等创新主体可持续发展能力的重要体现。特别在科技军民融合领域,重

大颠覆性技术创新、军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都为基础研究提出新的要求,技术发展已不仅仅局限于服务经济发展,更要面向我国未来战争形态,面向世界先进技术前沿。人才要素对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主要体现在人才培养模式与人才引进制度两个方面。在人才培养方面,目前我国现有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激励机制与国家发展需求不相匹配,军民两用人才培养效果较不明显,成为影响科技军民融合发展进程的关键问题。在人才引进方面,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地方政府开始加强对重大人才工程的建设。在我国人才结构不平衡、人才流失严重等现象的驱使下,跨区域人才引进与国内外人才合作显得尤为重要。并且,根据对高层次人才进行分类评定,制定相应的人员奖励机制,可有效推动人才引进政策的有效实施。

市场环境、平台建设和金融服务是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条件要素。对于军民两用市场而言,我国军工企业在装备生产制造领域积累的数年经验,向民用市场转移的力量雄厚;而代表着先进技术水平的民营企业等社会力量,朝军品市场转移的前景广阔。可见,军民两用市场的潜力巨大,成为驱动军民融合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因素。科技军民融合产业链上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平台的支撑与利用。科技基础设施是重大项目建设、科研成果产出的必要基础条件,决定了创新主体在自主研发过程中的硬件环境建设。“十三五”科技军民融合规划中将统筹基础设施布局建设列为重点任务,整合并共享仪器设备资源、组织并建设科研基础平台,是基础设施开放化、自主化、集群化的有效措施。金融支持科技军民融合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的动能,首先体现在金融在资源配置功能中发挥的作用。军民融合发展涉及政府、企业、市场、金融机构等多方资源与力量,科技与金融的结合为跨行业资源重配提供了条件。汇集社会各方资本与政府支持资金,设置军民融合重大项目专项基金、设立军民融合重点领域产业发展基金,可不断形成实力雄厚的科技军民融合金融支持体系。

2. 基于主体层面的融合深度

武器装备生产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先进技术水平的重要因素,军工单位作为武器装备研制的重

要创新主体，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军队内部的创新水平。随着现代企业在市场中的活跃性逐渐增强，国有军工企业要想在市场竞争中获取一席之地，必须要进行转型升级。利用其剩余生产资源与潜在生产能力，进攻民用市场，提升企业自身的竞争力。因此，军转民能力是科技军民融合内部创新水平的重要体现。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积极引导民营企业与社会资源参与到科技领域军民融合发展中来，不仅可以降低民参军的准入门槛，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技术领域的优势，还可以激发军民两用市场活力，促进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之间展开良性竞争。从需求侧的角度来看，鼓励民营企业从被动接受需求到主动创造需求，将具有前瞻性的高端技术利用于军事需求，可较好地解决军方需求牵引下的信息不对称、沟通不顺畅等问题。随着军品市场对外开放竞争，武器装备采购趋势与科技创新趋势逐渐形成一致，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参与到武器装备制造与配套零部件生产中来。而民营企业对核心技术的掌握程度、对创新能力的具备程度，则决定了其能否承接并完成军工项目研发与配套生产任务。因此，民参军能力是科技军民融合外部创新水平的重要体现。军民两用程度主要体现在两用技术标准、军地信息沟通、军民资源流动方面，是军工单位与民营企业在军民两用市场中有效对接、正常运转的重要体现，也是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衡量标准。

3. 基于结果导向的融合效益

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地方产业发展、区域科技创新以及重大项目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上。随着军民两用技术和产品不断迭代更新，科技军民融合产业链逐渐延伸，在促进行业现有产业转型升级的基础上催生出新的产业。地方产业集聚效应会不断辐射周边，扩大影响范围，吸引产业发展所需的要素条件和能动主体，产出新的经济效益。将科技创新优势转化为重大项目规划、建设能力，可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过程中发挥带动和牵引作用，从而有效拉动地方经济增长。对军事效益的衡量首先是军地统一思想的认知程度，包括社会公众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军民融合战略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的深刻解读、企业家对参与军民融合发展的国防情怀、军地人才对完成强军使命的坚定

信念。在武器装备生产与采购方面，从高校院所到社会企业、从传统国防工业到新兴行业和学科专业领域、从线下沟通到线上对接项目需求、从单一垄断到开放竞争、从填补领域空白到能打胜仗，武器装备采购现状已逐渐呈现出一种创新主体、创新领域、创新方式多元化的趋势。在军队保障社会化方面，盘活军方的闲置资源，特别是将基础设施规划为军地两用，并投入社会化经营与使用，可将存量资源转化为实际效益。在国防动员应急应战方面，对国防动员体系进行一体化建设，可有效整合军地资源，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应急应战水平，进一步保障国防效益。军民融合的高质量发展促使了传统生产方式的转变，提升了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增进了国民社会物质福利，使得民生保障体系不断趋于完善。生态环境与民生保障都为科创环境的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尤其是随着军民融合小镇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开展建设任务，平台建设已经不仅以打造军民融合产业集群为主要目标，更要结合人文生态，将生活、教育、娱乐等空间资源进行合理分配、优化布局，形成良好的生产与生活环境。

三、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的模型构建

(一) 研究方法与设计

对理论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军民融合领域专家进行问卷调查，可较好地反映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实际情况。上文已经利用扎根理论对相关资料进行了三级编码处理，并得出影响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机理模型。因此，本部分研究的重点不在于结构模型的构建，而旨在通过因子分析对初始模型进行验证，删除载荷系数较小的变量和不隶属于同一公因子的变量，从而达到修正并完善模型的效果。

(二) 数据收集与获取

本研究所采用的测量问卷是基于前期研究结论、根据研究目的设计而成，包括被调查者的基础信息、要素融合基础、主体融合深度、综合融合效益四个部分。考虑到科技军民融合研究领域的特殊性，本文在进行问卷发放时，对被调查者的个人条件进行了明确

限定: 首先, 被调查者必须是从事或研究军民融合领域的专家、学者、政府工作人员及企业管理者; 其次, 被调查者必须对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有深刻的理解, 并在该领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本研究共计发放问卷150份, 回收问卷136份, 有效问卷为115份。问卷有效率为84.6%, 处于良好水平。

(三) 实证分析

1.信度分析

经过SPSS软件计算, 得出问卷整体与各个子变量的Cronbach α 系数, 如表2所示。一般而言, Cronbach $\alpha \geq 0.9$ 时, 表示问卷的可信度很高; Cronbach $\alpha \geq 0.7$ 时, 表示问卷的可信度较高。结合表

表2 信度分析结果

	Cronbach α 系数	信度等级
融合基础	0.904	很高
融合深度	0.819	较高
融合效益	0.817	较高
整体问卷	0.932	很高

2中的分析结果, 可看出整体问卷的信度非常好, 各个变量的测量项一致性较高, 可用于进一步分析。

2.效度分析

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对问卷的效度进行检验, 在做因子分析之前, 需要先利用SPSS软件进

行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其中, KMO值越接近于1, 表示变量间的相关性越强, 原有变量适合进一步作探索性因子分析。效度分析结果显示, 调查问卷的KMO值为0.789, 显著性概率为0.000, 支持因子分析。

表3 效度分析结果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789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2394.397
	自由度	780
	显著性	.000

3.探索性因子分析

为了检验在扎根理论过程中提取出的主范畴和副范畴之间的关联, 本文利用主成分分析和正交旋转法提取出各个变量的主因子, 因子载荷系数如下列表所示。其中, 表4是融合基础变量下的成分矩阵, 可以看出体制机制和政策制度变量(A1~A3、A5~A7)、技术合作和人才队伍变量(A8~A9、A10~A11)、市场环境变量(A12~A15)、平台建设变量(A16~A18)、金融服务变量(A19~A21)均隶属于同一公因子, 而“成果转化体系的专业性”题项(A4)则单独成为一个因子。表5是融合深度变量下的成分矩阵, 可以看出军转民能力变量(A1~A3)、民参军能力变量(A4~A7)、军民两用程度变量(A8、A10)

分别组成3个因子, 而“军地交流的信息化程度”题项(A9)则与军转民能力变量下的测量题项共同成为一个公因子, 且因子载荷系数较低。表6是融合效益变量下的成分矩阵, 可以看出经济效益变量(C1~C3)、军事效益变量(C4~C7)和社会效益变量(C8~C9)分别组成3个公因子, 与初始模型保持一致。

基于以上分析结果, 考虑到本研究主要利用因子分析来判断指标模型构建的合理性, 故将因子载荷系数低于0.5、成分结构出现偏差的A4和B9题项予以删除^[17], 将修正后的问卷数据进行重新计算。

经过对问卷个别题项进行删除后, 得到改良后的因子分析结果(限于篇幅原因, 本文将不再进行展示)。结果发现, A1题项“组织管理体系的完备

性”的因子载荷系数为0.477(低于0.5), 经过与相关专家进行深入探讨, 并结合陕西省、四川省等地军民融合发展特征, 本文认为组织管理体系是衡量

科技军民融合体制机制的必要因素, 故将此项指标予以保留。至此, 所有变量维度均满足初始指标设置, 表示问卷效度良好, 模型构建具备合理性。

表4 融合基础变量的因子分析

融合基础A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a						题项筛选结果
	1	2	3	4	5	6	
A1	.570	.224	-.007	.219	.370	.052	保留
A2	.729	-.031	.204	.209	.232	-.026	保留
A3	.780	-.070	.135	.309	.054	.175	保留
A5	.593	.464	.067	-.062	-.043	.222	保留
A6	.500	.396	.360	-.062	-.083	.328	保留
A7	.556	.302	.240	.030	.426	.129	保留
A8	.361	.589	.102	.417	.005	.202	保留
A9	.044	.594	.140	-.049	.220	.397	保留
A10	.039	.781	.121	.191	.155	.009	保留
A11	.093	.697	.229	.316	.302	-.108	保留
A12	.253	-.103	.648	.107	.082	.440	保留
A13	.137	.113	.760	.075	-.043	.423	保留
A14	.085	.277	.769	.206	.031	-.064	保留
A15	.131	.205	.714	.199	.190	-.187	保留
A16	.121	.013	.333	.678	.187	-.028	保留
A17	.270	.259	.089	.719	.116	.089	保留
A18	.092	.180	.111	.704	.118	.284	保留
A19	.117	.046	.070	.088	.792	-.068	保留
A20	.151	.382	.102	.145	.646	.148	保留
A21	.139	.135	-.034	.243	.621	.442	保留
A4	.203	.141	.070	.247	.106	.707	删除

表5 融合深度因子分析

融合效益B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 ^a			筛选结果
	1	2	3	
B1	.679	.427	-.202	保留
B2	.851	.092	.176	保留
B3	.806	.066	.325	保留
B9	.471	.204	.440	删除
B4	.062	.627	.154	保留
B5	.218	.799	.014	保留
B6	.041	.673	.290	保留
B7	.235	.618	.287	保留
B8	.201	.243	.804	保留
B10	.089	.185	.819	保留

表6 融合效益因子分析

融合效益C	旋转后的成分矩阵a			筛选结果
	1	2	3	
C1	.708	.126	.359	保留
C2	.782	.200	.131	保留
C3	.693	.269	.182	保留
C4	-.182	.579	.554	保留
C5	.397	.575	-.059	保留
C6	.165	.803	.185	保留
C7	.364	.700	.083	保留
C8	.282	.236	.765	保留
C9	.294	-.044	.783	保留

四、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水平评估指标体系的权重确定

本文构建的科技军民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共包含3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和38个三级指标。考虑到各层级的指标数量差别较大，故采用因子分析法确定三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上的权重，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二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上的权重。

(一) 三级指标权重确定

因子分析由于其样本量大、客观性强、结构性好的特点，可较好地解决指标数量过多造成的权重偏差问题。因此，在前期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因子分析法对三级指标进行权重判断。上文

已经将融合基础、融合深度和融合效益三个变量下的指标进行了因子分析，将各指标的因子赋值进行归一化处理，可得出三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上的权重值，如表8所示。

(二) 二级指标权重确定

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时，由于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通常以少量指标为宜($8 \leq n \leq 15$, n 为矩阵阶数)。^[18]因此，本研究在对二级指标在一级指标上的权重进行分析时，邀请了10位军民融合领域内的专家对指标的相对重要性进行排序，从而构建出判断矩阵。利用层次分析法的专业软件对判断矩阵进行综合分析，得出指标权重计算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指标权重值与一致性检验结果

项	特征向量	权重值	最大特征值	CI值	RI值	CR值	一致性检验结果
融合基础测量项							
体制机制	2.77	39.572%	7.512	0.085 (n=7)	1.36 (n=7)	0.063	通过
政策制度	0.897	12.811%					
技术合作	1.014	14.489%					
人才队伍	0.646	9.226%					
市场环境	0.697	9.953%					
平台建设	0.724	10.342%					
金融服务	0.253	3.607%					
融合深度测量项							
军转民能力	0.652	21.720%	3.044	0.022	0.52 (n=3)	0.042	通过
民参军能力	0.556	18.520%					
军民两用程度	1.793	59.759%					

续表

项	特征向量	权重值	最大特征值	CI值	RI值	CR值	一致性检验结果
融合效益测量项							
经济效益	1.375	45.826%	3.015	0.008	0.52 (n=3)	0.014	通过
军事效益	1.272	42.404%					
社会效益	0.353	11.770%					

通过因子分析法和层次分析法对指标权重进行确定, 得到最终的科技军民融合评价指标, 如表8所示。

表8 科技军民融合发展评价指标及权重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相对于一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	相对于二级指标权重
融合基础	体制机制	0.396	组织管理体系的完备性	0.263
			内部机制改革的完整性	0.325
			工作推进机制的有效性	0.412
	政策制度	0.128	政策宣传与引导力度	0.361
			政策普惠与保障水平	0.345
			制度建设与完善程度	0.294
	技术合作	0.145	多方主体协同合作水平	0.469
			重点领域技术创新能力	0.531
	人才队伍	0.092	人才培养模式的专业化	0.535
			人才引进政策的制度化	0.465
	市场环境	0.100	市场导向的原则性	0.229
			市场主体的能动性	0.267
			供需市场的平衡性	0.262
			国内外市场的兼容性	0.242
	平台建设	0.103	科技基础设施的开放化	0.379
			创新示范平台的协同化	0.316
			技术交易平台的服务化	0.305
	金融服务	0.036	专项基金支持的规模化	0.318
			企业融资渠道的多元化	0.352
			知识产权管理的制度化	0.330
融合深度	军转民能力	0.217	军工保密机制的协调性	0.278
			企业文化内涵的兼容性	0.370
			管理运行机制的前沿性	0.352
	民参军能力	0.185	军品生产资质受理情况	0.230
			军工项目研发生产能力	0.292
			军方需求信息获取能力	0.251
			军品配套产业协作水平	0.227
融合效益	经济效益	0.458	技术标准的通用化程度	0.493
			科技资源的共享化程度	0.507
			地方产业发展能力	0.324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	0.358
			重大项目生产能力	0.318

续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相对于一级指标权重	三级指标	相对于二级指标权重
融合效益	军事效益	0.424	军地思想统一化	0.218
			武器装备现代化	0.217
			军队保障社会化	0.302
			国防动员一体化	0.263
	社会效益	0.118	民生保障体系专业化 科技生态环境人文化	0.493 0.506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首先利用扎根理论方法对收集到的大量原始资料进行逐级编码，根据所形成的初始范畴、副范畴与主范畴之间的联系，厘清了科技军民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构建了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机理模型。其次，利用调查问卷方法对初始指标测量项进行信效度检验与因子分析，删除了个别计算结果不理想的题项。最后，结合因子分析结果与层次分析法对各级指标的权重进行赋值，最终形成完整的科技军民融合评价指标体系。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 加快创新要素流动，从横向拓宽科技军民融合涉及范围

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是在政府和市场的主导下，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与政策制度保障，集技术、人才、平台、金融等科技资源于一体的创新活动。不同资源要素在创新主体之间按照市场运行机制相互流动，可促进军民两用技术加快转移，进而推动科技军民融合高质量发展。首先，应该做好军民融合任务开展前的体制机制改革工作。对管理部门来说，建立完整的组织领导体系，形成高效的工作推进机制，可聚焦改革难题并提供解决方案。对组织单位来说，加强企业内部股权结构、管理机制的改革力度，是打破信息不对称、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的重要举措。其次，协调好政府和市场在科技军民融合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对政府部门而言，做好国家层面的战略设计、产业层面的政策扶持、企业层面的制度管理，可逐渐形成规范有序的政策环境，建立健全相关政策制度体系。对市场环境而言，通过扩大市场潜力调整高端制造品的供给，不断形成良

好的市场经济规律，在职能发挥上与政府做到相辅相成。再次，加强创新要素之间的统筹、流动、共享程度。借助平台、渠道等载体，创新人才培养、评价和激励机制，优化创新活动的资金投入，加快高尖端技术的研发与转化。同时，利用大数据、网络安全等方法，加强信息技术交流的质量与效率。

(二) 增强创新主体活力，从纵向延伸科技军民融合发展深度

军工单位、民营企业与高校院所作为科技军民融合的重要主体，通过资源优势从事军民两用技术研发，并为军民两用市场提供技术、产品和服务，在提高军民融合发展水平中担当着关键角色。增强创新主体的活力，包括要加大国有军工企业的对外开放程度，激发民营企业对具有市场前景的技术开发潜能，如美国DAPPA、Diux等国防创新机构。无论是国防体系内部创新，还是市场导向下的外部创新，都需要创新主体在开放竞争的环境下，以军民两用为方向开展技术研发。在此过程中，创新主体除军民融合企业之外，还包括政府在机制政策方面的支持、中介机构在需求对接方面的服务。各个主体之间的相互协同与合作衔接起了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使价值创造到价值获取的过程透明化、公开化，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军民融合产业生态系统。加强创新主体的能动性，也为军民两用标准制定、军民信息互通共享带来新的行动力。特别要鼓励民营企业抢占专业领域的领先位置，凭借自身科研优势参与标准制定；调动军方联合地方力量共同参与军品项目研制生产的积极性，有效盘活现有资源，加强科技成果交流。

(三) 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 提升科技军民融合整体发展水平

科技军民融合效益需要站在国家战略需求的高度, 实现产业快速发展, 提升企业可持续竞争能力。军事效益的提高, 首先要从根本上解决军地思想统一的问题, 把军民融合思想纳入基础教育, 将军民融合管理列为专业学科, 逐步树立对科技军民融合发展观念的公众认知。在武器装备现代化建设方面, 需要从技术领域加强武器装备生产能力, 从渠道领域转变武器装备采购方式, 为国防应急动员做好硬件基础保障。经济效益的提高得益于科技创新推动下的产业发展, 因此, 聚焦产业链关键环节, 形成重点领域的产业集群, 完善从技术需求端到产品落地端的创新链, 可促使军民融合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在此基础上, 引导并鼓励军民融合企业和高校院所参与到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研制、军品配套生产任务中来, 可为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能。在军事效益和经济效益同步增长的同时, 从住房、教育等方面为军民两用人员提供物质福利, 从生态建设的角度优化科技创新环境, 可切实提高科技军民融合的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 [1] 郑波. 用数据评估支撑军民深度融合[J]. 国防科技工业, 2015(2):43-44.
- [2] 杜人淮, 马宇飞. 国防工业军民融合水平测度与对策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6(9):108-116.
- [3] 朱煜明, 闫文琪, 郭鹏. 基于实证方法的航空产业升级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 运筹与管理, 2018(2):94-105.
- [4] 彭张林, 张强, 杨善林. 综合评价理论与方法研究综述[J]. 中国管理科学, 2015(S1):245-256.
- [5] 姜梁, 张庆普. 微观视角下无人机产业军民融合水平评价研究[J]. 科研管理, 2018(8):110-119.
- [6] Saaty T L.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analytic network process: decision making with benefits, opportunities, costs, and risks[M]. Pittsburgh:RWS publications, 2005.
- [7] Celotto A, Loia V, Senatore S. Fuzzy linguistic approach to quality assessment model for electricity network infrastructure[J]. Information Sciences, 2015(5):1-15.
- [8] Torfi F, Farahani R Z, Rezapour S. Fuzzy AHP to determine the relative weights of evaluation criteria and Fuzzy TOPSIS to rank the alternatives[J]. Applied Soft Computing, 2010(2): 520-528.
- [9] 李宏宽, 何海燕, 蔡静静, 等. 考虑评估指标关联性的我国军民融合发展水平评估研究——基于DEMATEL-ANP模型与灰色关联分析法[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8(9):113-122.
- [10] Charnes A, Cooper W W, Rhodes E. Evaluating program and managerial efficiency: an application of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to program follow through[J]. Management Science, 1981(6):668-697.
- [11] Atici K B, Podinovski V V. Using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for the assessment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of units with different specialisations: An application to agriculture[J]. Omega, 2015(7):72-83.
- [12] 刘思峰, 蔡华, 杨英杰, 等. 灰色关联分析模型研究进展[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3(8):2041-2046.
- [13] 朱煜明, 闫文琪, 郭鹏. 基于实证方法的航空产业升级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 运筹与管理, 2018(2):94-105.
- [14] 方炜, 校利敏, 杨步, 等. 民参军知识转移影响因素实证研究——基于军民融合协同创新视角[J]. 科学学研究, 2019(4):664-678.
- [15] 王梦洽, 方卫华. 军民深度融合创新发展:历史逻辑与作用机制[J]. 科技进步与对策, 2018(1):136-141.
- [16] 田庆锋, 张硕, 苗朵朵, 等. 军民融合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路径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J]. 软科学, 2019(2):81-85+92.
- [17] 徐汉明, 周箴. 基于环境效度影响因素分析下的创意产业园区评估指标体系研究[J]. 中国软科学, 2017(3):164-177.
- [18] 全海威. 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评价体系与机理分析研究[D]. 北京:北京邮电大学, 2012.

Research on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ian Qingfeng Miao Duoduo Zhang Shuo
Zhang Tian Wan Haidong**

Abstract: Under the interaction of innovation subject and element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tandardized evaluation standard system to improve the overall benefit of the technological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Start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novative elements, subjects and benefit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action mechanism of the technological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s the initial evaluation index model of the technological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Secondly, th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of the collected sample data are analyzed through questionnaire survey to judg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indicator construction. Then the indexes with small factor load coefficient and deviation of component structure are deleted by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method. Thirdly, a set of scientific, complete and feasibl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technological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is formed by determining the weights of the three indexes with the comprehensive use of factor analysis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Finally,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conclusi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technological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so as to meet the national strategic needs, economic construction needs and social security needs.

Key words: military-civilian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valuation index; influencing factor; mechanism of action; grounded theory

征稿启事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由西北工业大学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的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学术期刊。本刊主要栏目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高等教育研究、“一带一路”跨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新思潮、法律与经济前沿论坛、军民融合研究、区域发展研究、名家访谈等。

本刊为季刊，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热忱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惠赐佳作。关于投稿，具体事项如下：

一、来稿要求

1. 来稿须为学术论文，结构完整，包括题名、作者信息、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英文题名、英文摘要和英文关键词。
2. 作者信息包括：姓名、性别、籍贯（**省**市）、职称、所在单位及职务、主要研究方向等。
3. 获得基金资助的稿件，请注明立项单位、项目名称、时间、编号。
4. 参考文献格式请参考本刊已刊发文章。
5. 请勿一稿多投，来稿文责自负，本刊对采用稿件有权作文字删改，如不愿改动，请事先声明。
6. 本刊对稿件的审理实行同行专家匿名审理办法，将在1个月内回复初审结果。不向作者收取任何费用。
7. 优稿优酬，嘉奖名篇。

二、投稿事宜

1. 来稿请发至shekexuebao@nwpu.edu.cn。
2. 本刊地址：西北工业大学老图书馆217室 邮编：710072，电话：029-88493140。

三、版权声明

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超星域出版平台”“万方数据知识服务平台”等数据库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支付的稿酬包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将被视为同意上述声明。不同意网络传播者，请在来稿中注明。